

济公信仰研究报告

王明德

(作者单位：浙江·台州天台山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

【作者简介】与800多年前的济公谓同邑乡亲，沐浴着天台山的阳光雨露长大。初中毕业“知青”下乡，1978年招为建筑工人。刻苦自学，考取律师资格，后服务行政部门，曾任天台县赤城路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兼指挥部“济公故居重建工程领导小组”组长）、济公故居建设指挥部指挥。2015年晋升副处级，2017年退休。现受聘担任浙江·台州天台山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澳门·国际济公文化协会名誉顾问、德教泰国紫真阁理事会荣誉顾问。出版著作有《简明土地执法教程》《明德济公研究》《济公与济公故居志》《雪泥鸿迹》《济公禅师度世妙法经释义》等。

【内容提要】当今大陆内地、台港澳地区与东南亚国家，乃至世界各地的“济公”，或供奉于佛教寺庙、道教宫观，或作为梵天极乐宗、一贯道、德教、理教、天德教、轩辕教、天帝教、康济会、圆玄学院、东井圆佛会等教派的重要神祇顶礼膜拜。但自2005年始，内地将民间信仰这一学术名词升格为行政制度，并于国家宗教管理局成立业务四司予以监管，济公亦被人为地作了“一佛两性”瓜分，即佛教寺庙与道教宫观的济公供奉被定性为宗教信仰，佛道二教以外的济公崇拜被定性为“民间信仰”，给济公信仰的发展蒙上了严重的阴影。境外、国外济公寺庙、宫观、堂坛、阁社、团体的质疑声不断，内地济公庙庵的传法弟子、信徒信众也是颇有怨言，因之引发了济公信仰属性的喋喋不休的学术争论，导致根生土长天台山的“济公”，不能以其完整、明确、永固的形象身份，统领世界济公信仰大势，抑制了济公精神、佛学思想在新时代的广泛传播与发扬光大，并为中国特色之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历史贡献。

笔者通过长期的济公文化研究，从信仰的本质属性，即无神论信仰与有神论信仰之分类立基，依据济公信仰产生的社会因素、文化因素，归纳、提炼济公信仰的精髓在于“慈悲济世、无我利他、彰善瘅恶、扬弃创新”的济公精神，与“禅非坐禅，心明性见；颠狂顽世，真乃禅本；无欲以刚，民生为怀；以德劝善，正法诛恶；混俗同尘，酒不醉性；般若性空，随缘任运”的济公佛学思想，继之联系济公的“题墨隽永，访遗览胜；河北传法，僧众建塔；业识忙忙，风流则剧；横说竖说，耸动王侯；建寺垒桥，关注生态；以人为本，怜悯众生；瘳恶不阿，击扫奸相；精诗善文，出口珠玉”的感人事迹功德，及其知民心、拯民命、解民困、排民忧、保民安、娱民乐，感谢恩人、原谅仇人、帮助苦人、救济穷人、调伏狂人、启迪愚人、感化恶人、鼓励善人、警策懒人、醒觉迷人，既出世又入世的“人间佛教”理念，与超人类、超自然、超社会的灵异神通发挥，提出济公信仰的当代价值在于，它既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又为儒释道三教圆融同修的经典范例，既是社会道德、人格品质的引领、指向，又为是非曲直、善恶美丑的考量标尺，甚为现代宗教的发展方向。同时，结合历史上、近现代济公信仰于大陆内地、台港澳地区，东南亚国家，乃至世界各地的广泛传播与巨大影响，力主济公信仰是乃历史镌刻，民心所向的圆融

儒释道三教的一种宗教形态，而非所谓的“民间信仰”。旨在确立济公的宗教地位，调动济公的传奇影响力、亲民凝聚力、慈善和谐力、认祖促统力，于济公信仰、济公文化的交流实践中，率先实现两岸“济公”的和谐统一，进而助推祖国的和平统一；引申提出在浙江天台济公故里打造济公信仰圣地，创建济公信仰祖庭，领军世界济公信仰发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同时，也以潜在方式对民国时期出现，至今尚未绝迹的否定济公真有其人，及“释宝志”谓济公原型的奇谈怪论，作一彻底的“否定之否定”。并藉此疾呼：世界宗教在发展，中国宗教要发展，不能没有济公信仰；对待济公信仰，只能鞭策促进使其弘扬光大，不能暗拉设障致其萎缩倒退。

【关键词】济公、济公信仰、济公圣地、济公祖庭。

【中图分类号】B9

【文献标识码】A

一、信仰的形态概述

信仰是人的心灵与信念的集中体现，是人的情感因素与价值目标的指向追求，也是一种对自然、事物，人物、鬼神，宗教、民俗，科学、迷信，或者政治（主义）、观点（主张）等的尊崇景仰与崇拜皈依，并从内心把它确定为精神支柱、学习榜样、行动指南、行为准则的社会意识形态与文化现象。信仰与人的生存、生活，生产、发展密不可分，支撑、支配着一个人或者一个家庭，甚至一个群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状态。因之，信仰具有思想的神圣性、行动的统一性。所谓思想的神圣性，是指信仰可以激发、渲染人的坚定不移之意志，可以促使信仰者发自内心，自觉按信仰的要求严以自律；所谓行动的统一性，是指相同信仰的人，往往感情亲近，关系融洽，并以某神、某人为领袖，自觉接受、服从其感召，使得整个群体有统一的精神归属与皈依依靠，共同按信仰的要求，努力实施某种行为，或者放弃实施，坚决不实施某种行为，使得整个群体的意识、行动和谐有序。

诚然，由于各人所处的时空环境，与生产生活、思维方式等的不同，信仰的表现形态多种多样，既可将其划分为自然信仰、鬼魂信仰、生殖信仰、图腾信仰、祖先信仰、生存信仰，也可将其列项为原始信仰（创世信仰、复活信仰、英雄信仰、巫术信仰、禁忌信仰等）、宗教信仰、政治（主义）信仰，与迷信等等；不过，就信仰的本质而言，只能将其分为有神论信仰，与有神论信仰二类。无论是无神论信仰，还是有神论信仰，都能撒播正信的种子，感召助缘成熟果现。

（一）无神论信仰

无神论信仰，相信科学，相信人的主观能动性，相信眼见为实，相信进化论，相信生死偶然，为人一生，既无前世，也无来世，更无因果报应，死了也就永远地“安息”了，什么都不复存在。所以，无神论信仰无后顾之忧，敢想敢为，不怕天、不怕地，以毕生精力为自己，或为家庭（族），或为他人的尊卑贵贱、功名利禄，包括国家、民族、政治（主义）之荣辱胜败而努力奋斗。在中国，先秦时期有以后圣荀子，及其弟子韩非等为代表的杰出无神论者。东汉王充在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基础上批判天人感应的谶纬神学，否定人死为鬼等迷信意识，建立起中国古代的无神论体系。南北朝的范缜深入细致地论证了形神相即、形质神用的唯物主义神灭论，认为形体是精神赖以产生的物质实体，精神是形体的属性和作用，不可能离开形体而存在，对宗教、迷信学说宣称，并得统治阶级普遍支持的神不灭论，

进行了深刻有力地批判。宋代的张载、明代的王廷相，清代的王夫之、熊伯龙、王清任等也对宗教、迷信展开抨击，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了无神论思想。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派，吸收西方的启蒙思想和自然科学，把反对宗教有神论和传统天命神学的斗争，与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民主革命联系起来，提出只有先破宗教、迷信才能使众生平等的革命思想，表现了无神论信仰的大无畏的战斗传统，把中国的无神论学说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在西方，产生于古希腊的唯物主义哲学，启蒙思想家反对传统宗教，提出了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无神论学说，把自然界万事万物的生灭还原为物质本原的分合，从自然本身说明自然，用人的意识思维代替神的意志。不少思想家更是摆脱传统宗教的迷信，对神灵的本质、起源和作用，进行了理性的探讨。从古希腊到古罗马，出现了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卢克莱修、琉善等无神论思想家，其中伊壁鸠鲁则被学术界公认为西方的“无神论之父”。

德国（后为无国籍人）的马克思创立马克思主义，本质是建立在辩证唯物论（主义）、历史唯物论（主义），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基础上的科学无神论，认为一切崇信的各种形式的超人类、超自然、超社会力量与境界，不过是人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受各种主客观因素影响而产生的幻想而已，是根本不存在的。毛泽东承继马克思主义，一再强调指出，我们要信奉科学，不相信神学，要用唯物论代替唯心论，用无神论代替有神论。

从上可见，无论是古代、近现代中国，还是西方的无神论思想，都具启发人们探索自然、认识自然，理解人生道路的重要意义，开示人们要理性地相信自己，追求真理，要让自己的一生过得充实，过得有价值、有意义，对特别现象要保持非常的怀疑态度。不要寄希望于不确定的来世，不要迷信有超人类、超自然、超社会的外来力量存在，更不要崇拜权威。

不过，从实事求是的角度认识无神论，由于该学说目前还不能对所有自然、社会与人类之思维现象，包括天性、天命，命运、机遇等，作出科学的理论说明与解释。诸如，自英国达尔文 1859 年的《物种起源》、1871 年的《人类的起源与性的选择》问世，及 1876 年德国恩格斯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刊行，创立生物进化论后，很多人相信人类是生物进化的产物，起源于森林古猿，并经漫长的进化过程发展而来。诚然，森林古猿起源于什么？尽管有科学家推测，森林古猿是 3 亿多年前漫游在海洋中的史前鲨鱼进化而来，但理论说明与实物证据尚需添补，即便史前鲨鱼进化森林古猿的学说成立，那么史前鲨鱼又是从什么进化而来？凡此等等，一连串问题必然接踵而来，有待科学家一步一步研究作出回答。再如，人的一生，为何自己的“付出”与“所得”不能相称、不能相等、不能平衡？就像一些人，所作的努力不多，却能风生水起，集荣华富贵、显赫尊隆于一身，有些人虽努力不断，为善不在人后，才智不在人下，勤奋出类拔萃，却是一生坎坷，命途多舛，屡受挫折，穷困潦倒，甚至郁郁离世等，可能光凭无神论学说，似乎也很难作出完整全面的理论解释。诚如马克思《资本论·跋》论述辩证法时所说的一样，它“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

（二）有神论信仰

比较无神论，有神论信仰比较谦卑，相信宇宙中的超人类、超自然、超社会的神秘力量存在，亦即自然界有科学无法见到、无法证实、无法解释的现象存在，相信不可知的一切都是神灵所创造或者掌控，相信因果循环，“顶上三尺有神明”，从而依靠内心的善恶、道德约束自己，不敢逆神明而自行其是。当今大陆内地，习惯将有神论信仰分为宗教信仰、民

间信仰与迷信三大子项，并以国家力量予以强制监管之。

1. 宗教信仰。所谓之宗教信仰，是为人类社会发展有一定历史阶段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属社会意识形态范畴。特点表现为，相信现实世界之外有超人类、超自然、超社会的神秘力量存在，并具统摄万物的绝对权威，可以主宰自然进化、决定人类命运，从而使人类对这种神秘力量产生敬畏与崇拜，并由此引申出的哲理认知与仪式活动。目前世界性的宗教主要有佛教、基督宗教、伊斯兰教等，内地基本是以“垄断”方式匡限宗教为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新教，习惯称“耶稣教”）、伊斯兰教五种。

佛教系古印度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王子乔达摩·悉达多所创，传入我国的确切年代尚无定论，较为普遍的说法是东汉永平十年（67），汉明帝刘庄遣使至西域广求佛像、经典，并迎请迦叶摩腾、竺法兰等僧至洛阳，创立了第一所官办寺庙——白马寺，从而成为中华佛教的发脉源头。佛教以成佛信仰为核心内容，主要经典有《般若经》《大方广佛华严经》《妙法莲华经》《涅槃经》《楞严经》《四阿含经》《方等多部》（般若、华严、法华、涅槃以外的大乘诸经），及三大咒——《金刚萨埵心咒》《莲师心咒》《观音心咒》，十小咒——《如意宝轮王陀罗尼》《消灾吉祥神咒》《功德宝山神咒》《准提神咒》《圣无量寿决定光明王陀罗尼》《药师灌顶真言》《观音灵感真言》《七佛灭罪真言》《往生咒》《大吉祥天女咒》等；哲学倾向出世，强调命运掌握自己手中，为人应运用智慧，发现生命、宇宙真相，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遵守十戒、心灵安定、慈爱众生、通体大悲、无私奉献，促进心灵、道德进步与觉悟，主张相由心生，世界在心，断尽一切烦恼，从而超越生死痛苦，得到最终解脱。不同的佛教门派，又有不同的侧重，诸如天台宗倡导“一念三千，三谛圆融”，三论宗倡导“缘起性空，破邪显正”，唯识宗倡导“万法唯识，转染成净”，华严宗倡导“圆融无碍，相互成就”，禅宗倡导“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净土宗倡导“净化人心，和谐社会”，律宗倡导“防非止恶，众善奉行”，密宗倡导“提升能量，护国佑民”等。成立于1953年的中国佛教协会，为大陆内地的全国性教务组织。

传统佛教寺庙的济公信仰情况不一，尊济公为“佛”的，一般都辟专殿供奉，如杭州灵隐寺、净慈寺、天台明岩寺等；尊济公为“菩萨”的，大多与其它菩萨一起供奉，如四川成都宝光寺，济公与文殊菩萨、观音菩萨的位置并列；尊济公为“罗汉”的，一般与其它罗汉一起，于罗汉堂供奉，如天台山国清寺、山东济南长清灵岩寺等。此外，还有依据济公外出救苦济难，“迟到没位置”“殿门已关”等神奇传说，或于梁、于柱，或于屋顶、檐脊等处供奉济公，如河北石家庄鹿泉城西的“抱犊寨”塑雕济公于柱，姑苏寒山寺则立济公于“性空世界”圆洞门之檐脊等。

道教以“道”为最高信仰，以黄帝、老子思想为理论根据，以丹道法术为修炼途径，以得道成仙为终极目标，在古代鬼神崇拜的基础上，承袭战国以来的神仙方术而逐渐衍变发展立教，主要经典有《道德经》《南华经》《文始真经》《冲虚真经》《通玄真经》《度人妙经》《阴符经》《清静经》《西升经》《心印经》《黄庭经》《玉皇经》《玉枢经》《三官经》《北斗经》《周易参同契》《悟真篇》《太上老君内观经》《洞玄灵宝定观经》《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阴骘文》《坐忘论》《化书》《重阳立教十五论》《龙门心法》等；哲学倾向无为，强调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仙道贵生、慈悲济世、无量度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阴阳协调、形神共养、统筹兼顾，丹道修真、服药炼气、积德行善，通达心胸、敬天法祖、尊道贵德，清静寡欲、上善若水、柔弱不争，天人感

应、天道承负、与道合真，教义提倡为人应领悟道、修养德、顺自然、守本分、淡名利，性命双修、自我完善、返璞归真，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天人合一境界。成立于 1957 年的中国道教协会，为大陆内地的全国性教务组织。

道教的济公崇拜，既有尊济公为天尊的，如《诸真宝诰》称济公为“大慈大悲，至仁至德，妙法度世，古佛天尊”；也有称济公为一般仙真的，如北京龙庆峡神仙院素以济公为“下八洞神仙”奉祀。

诚然，比较而言，禅门寺庙、道家宫观的济公供奉仅是少数，远不及以外教派，诸如境外、国外的一贯道、德教、理教、天德教、轩辕教、天帝教、康济会、圆玄学院、东井圆佛会等教派，及其衍生的寺庙、宫观、堂坛、阁社、团体供奉济公的数量之多，地位显赫，影响广泛。

基督宗教是信仰一神和天国的宗教，公元 1 世纪上半叶发源于中东以色列地区，在人类发展史上，尤其是在 476~1453 年的欧洲，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近代以来，虽然经历了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冲击，影响仍然很大，为欧美地区的带普遍性的宗教信仰。基督宗教以耶稣信仰为核心，以《圣经》《信经》为教义，基本内容为“三位一体”上帝说，主张上帝是宇宙中的独一无二，无所不能，创造有形、无形万物的神，具有圣父（又称天父，至高无上，主宰一切）、圣子（即耶稣，受圣父派遣人间，以自己在十字架上的流血牺牲拯救人类苦难）、圣灵（上帝与人的媒介，启迪人的智慧，使人弃恶从善）三个位格；认为天地万物与人类皆上帝创造，任何人天生就有原罪，惟有依靠上帝才能拯救，为人行善死后升入天堂享福，行恶死后打入地狱受苦，号召人类要忍耐、顺从。天主教、基督教（新教）与东正教，为基督宗教的三大门派。成立于 1958 年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与成立 1982 年的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合称“一会一团”，为大陆内地的全国性教务组织；成立于 1954 年的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为大陆内地基督教(新教)的全国性教务组织。内地的东正教，自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前夕停止活动，目前在哈尔滨等区域已有恢复，教徒绝大部分为俄罗斯族，但尚未得宗教职能部门的正式认可。

伊斯兰教系公元 7 世纪沙特阿拉伯麦加的穆罕默德，在阿拉伯半岛创始兴起，以“安拉”为唯一真神。穆斯林是“伊斯兰”的派生名词，意即安拉旨意的“顺从者”。穆斯林深信穆罕默德是“先知”，是“安拉的使者”“正道的复兴者”。伊斯兰教以《古兰经》为基本教义，由理论和实践两个部分构成。理论部分的主要内容为信安拉、信天使、信经典、信先知、信后世、信前定，实践部分的主要内容为念“清真言”，与礼拜、斋戒、天课（抽取家庭年收入的 2.5 %用于赈济、救助）、朝觐，简称“念、礼、斋、课、朝”。成立于 1953 年的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为大陆内地的全国性教务组织。

至于大成至圣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是否属于宗教？历史上曾有三次大的争鸣。第一次在明末，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为传教方便，力辩儒教不是宗教。第二次在 20 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著名思想家、语言学家，中国共产党首任总书记陈独秀等，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彻底否定儒教是宗教。第三次发端于 1978 年底，即著名哲学家、历史学家任继愈先生在中国无神论学会成立大会上，提出“儒教是宗教”的学术观点，随之质疑、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争论的主要焦点有二：

一是宗教的标准方面，如儒教有没有自己的组织？

二是儒教的实际方面，如儒家信不信鬼神？孔子是人还是神？

不过,无论你是承认也好,否定也罢,儒教在历史上确实有一个宗教化过程,及在中华文化中所起的作用,确实类同于西方的传统宗教,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儒教以礼乐文明为代表,以大成至圣孔子为先师,以超凡入圣为终极目标,“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倡导王道德治、尊王攘夷和上下秩序,以《诗经》《尚书》《周易》《论语》《孝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尔雅》《孟子》十三经为典章,哲学倾向进取,强调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五伦(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君臣有义、朋友有信)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教义提倡为人应积极奋发,展现才华,建功立业,创造物质财富,实现自我价值。正由于此,著名国学大师、北京大学哲学系东方哲学教研室主任楼宇烈教授,在他的《宗教研究方法讲记》中,作了如是中肯、恰当的阐述,即“儒教有一个宗教化的过程,它发生于汉代,主要在西汉。”“儒家确实起到了像欧洲古代宗教的社会作用,它管起了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有各种各样的规范。”“即便说它是宗教,它也体现了中国宗教的特殊情况,儒教虽然起的作用与西方古代宗教相同,但它的整个理念和表现形式却是很不相同,这里面有许多问题需要进行梳理。我们不能因为它起着与西方古代宗教相同的社会作用,就忽视了其作为中国宗教的特殊性,而恰恰要重视由其特殊性所反映出来的中国宗教与西方宗教的差异,从而弄清楚中国宗教观念的特点,以及中国人独有的宗教观念。”

2. 民间信仰。所谓之民间信仰,原本为学术名词,又称民俗宗教、民间宗教等,2005年以来,大陆内地将其升格为一种行政制度,并于国家宗教管理局成立业务四司予以监管。而就这一制度的产生背景以言之,宗旨在于抑制新兴宗教形态发展,缓冲国家垄断匡限的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新教)、伊斯兰教免受“竞争”、冲击,且随时适地可以以政策或者官员意志掌控、调整的一种笼统模糊的信仰形态概念表述,大略指称存在于民间,由民众百姓发起的对某种超人类、超自然、超社会精神力量的景仰、尊奉、崇拜,或是对原始信仰、宗教信仰的神灵进行筛选、组合,增益圣贤、祖先、鬼魂、灵物、祭祀、礼仪、法术、禁忌,以及算命掌相、风水术数、占挂问卜、风俗习惯等,内容既有原始信仰、宗教信仰的传承渗透,也有民俗、习惯、迷信等的表示展现,而形成的一种对象纷繁的“大杂烩”信仰体系。民间信仰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与官方的意识形态既有冲突又有互补,对民众百姓思维方式、生产生活、关系处理的影响深远。

正是由于民间信仰,不列宪法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公民基本权利范围,诸多信仰形态的实际处境非常尴尬。如传统佛道二教以外的济公信仰,其存在完全需以政策或者官员的意志为根据,信仰自由的保障性大大削弱。同时,这一制度的实施,也对境外、国外信仰济公的一贯道、德教、理教、天德教、轩辕教、天帝教、康济会、圆玄学院、东井圆佛会等教派的信仰地位,作了带普遍性的贬谪、降格,其衍生的寺庙、宫观、堂坛、阁社、团体的传法弟子、信徒信众来大陆朝觐济公,纷纷提出质疑?内地济公庙庵也是颇有怨言,从而引发了济公信仰属性的长期以来的喋喋争论不休。

3. 迷信。所谓迷信,是指对人或者事物的一种不知究竟的盲目信仰、盲目崇拜;换言之,就是对超人类、超自然、超社会神秘力量的一种完全非理性的痴迷信任、迷惘相信,是对客观世界的一种虚幻、歪曲反映,表现为一种极端落后、愚昧无知的信仰现象。

宗教与迷信,既有一定的联系,又有严格的区别。所谓一定的联系,表现为迷信是完全

没有理性、没有科学基础的信仰，而宗教则是对超人类、超自然、超社会神秘力量，特别是对具人格化，标榜为有意识、有智慧，能够掌控人类命运的神灵崇拜。尽管这种崇拜较迷信相对理性，是迷信在理论上的系统化和抽象化，但也不可否定其内在本质仍是没有科学基础之信仰，并非只要挂上宗教招牌，就可忽略其所包含的迷信因子的存在，再荒诞的说法也就不成为迷信了；同时，又要肯定宗教经典、教仪与其所追求的目标，确实体现了诸多的哲理内容、合理成分，诸如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善恶观等，是为科学对自然、社会与人类的思维现象，包括天命、天性，命运、机遇等，尚无法作出全面完整说明、解释的情况下，从另一角度探索大千世界本质真理的一种特殊的方式、方法。所谓严格的区别，亦即宗教一般都有自己的修持目标、教规典仪和相对固定的活动场所，有既定的崇拜偶像，诸如佛教的释迦牟尼，道教的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基督宗教的上帝，伊斯兰教的真主安拉等；迷信则很难说有什么共同的崇拜，有什么统一的宗旨、仪轨，更没有共同的活动场所，对象可能是神仙鬼怪、魑魅魍魉，比较宗教显得更为原始、落后，且活动多在局部地区或者家庭范围进行。

此外，在有神论信仰的分类上，还应严格区分宗教信仰、迷信与邪教的界限。所谓之邪教，通常是指打着拯救人类的幌子，试图渗入公共权力，或以敛取钱财等为目的，采取蒙骗、利诱、施压等手段，对信徒信众实行精神控制，强迫其脱离正常社会生活，扰乱社会秩序，侵犯信徒信众的人身权利（主要为女性、儿童）、民主权利、财产权利，并且大多是以秘密结社形式存在的一种冒名宗教信仰的组织体系。其中，反社会性是邪教的本质特征，往往在其积聚一定势力后，就与统治阶级分庭抗礼。所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政治社会区域，统治阶级对邪教都有不同的认定标准。改革开放后，内地的邪教组织既有自身发展，也有境外渗透，当前官方较为明确性的主要有法轮功、全能神、徒弟会、全范围教会、灵灵教、新约教会、观音法门、主神教、被立王、统一教、三班仆人派、灵仙真佛宗、天父的儿女、达米宣教会、世界伊莱贾福音宣教会等。

现代社会，法制民主，对个人、家庭或者小规模的一般迷信活动，只要不妨碍国家安全，民族团结，公民教育，社会秩序，不侵犯他人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财产权利的，统治阶级一般是以舆论教育，宣传引导，而不作强制干预；反之，对那些触及统治阶级利益底线，严重违背宪法、法律，破坏国家教育制度、民族团结、主权安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财产权利，妨碍社会管理秩序，或者装神弄鬼、骗财害命的邪教、迷信组织，则必须以国家机器、政权力量介入，依法予以取缔，并视情节轻重予以打击、惩办。

二、济公信仰之产生

从明万历举人吴之鲸的《武林梵志》载，济公“坐化说偈之碑……俱存本寺”，与清释际祥《净慈寺志》收录的“嘉定辛巳余逢辰刊”“嘉定丁巳朱文藻摹”“乾隆戊寅钱塘金若水重修”的“济颠禅师石刻像”反映，嘉定十四年（1221，农历辛巳）杭州净慈寺已经供奉了余逢辰所刊的济公石刻画像，且在明代以前就以碑文形式，刻植了嘉定二年（1209）五月济公临终所作的“六十年来狼藉，东壁打到西壁；如今收拾归来（不同版本有‘如今收拾归真、如今收拾归去、如今掷笔归来’等），依旧水连天碧（也有版本作‘依然水连天碧’）”的《辞世偈言》，及入编《天台山济公院志》，李东方、王士文的《重建济公院碑记》载：“嘉

定二年济公圆寂后，有上清宫道士陆大伦道号玄机者，曾于赤城山立济公祠”，与陈日贵的《济佛院》谓：“在济公圆寂 30 多年后（约 1247），天台山上清宫道士陆大伦（籍贯杭州，道号玄机），于赤城山腰济公读书处的瑞霞洞建济公祠，后改名济佛洞”，表明济公信仰在南宋中期已经源头发端。^[1]

济公信仰之所以在这一时期诞生，是乃社会因素与文化因素的聚合脉动促成。

（一）社会因素

社会因素，是为济公信仰产生的时代原因与环境条件。北宋靖康年间（1126~1127），帝国政治黑暗、腐朽，立国仅十余的女真金朝，驱兵犯境，首都东京（今河南开封）沦陷，山河破碎，济公父亲通直郎李景述（江西南城上塘《水坑尾堡李氏族谱》所载官衔、姓名，为济公小说「传说」之李茂春、李赞善、李善人、李华的原型人物）含泪辞别祖茔、家庙、故地，随宋室南迁，流寓高祖李遵勖、高祖母万寿长公主之封邑天台，栖居永宁……。^[2]

法雷震响，罗汉应真，菩萨化身，活佛降诞。本与大宋王朝同命运、同兴衰的李氏贵族裔孙李修缘（字巨川，为济公之俗名，另作修元、元修、心远等），目睹山河破碎、家道中落，看破红尘，立下“利锁名缰全解去，欲把贪官恶霸除，一点禅灯云雾里，三更孤影读诗书”的宏伟壮志，决计抛弃仕途、超然物外、出家为僧，慈悲济世、匡扶正法、普度众生，走上漫漫般若之路。诚然，由于封建专制体制的原因，其时的佛教寺庙与僧尼，大多抱着一种脱俗出世的姿态，以摆脱朝廷与衙门的控制，谋求思想与行动的自由，因之不可避免地酿成了出世与入世的严重脱节，诸多积弊凸现明显。此等佛教生态环境，冲击、历练、造就了一代高僧道济（济公法号），成为改良佛教入世的具里程碑意义之伟大先行者。

宋代佛门的积弊，主要表现于：

1. **封建宗法，全局教化欠缺。**随中央集权制的强化，宋代朝廷对宗教的管控日益严格，佛教活动被拘限于寺庙的狭小圈子里，僧尼枯居梵宫，打坐参禅，诵唱经文，超度“死人”，脱离社会。寺庙经济日趋世俗，始于南朝梁武帝时代的“无尽藏”，扩变为商业性质的“长生库（典当库）”，众多寺庙还开设碾碓、店铺、仓库等商业经营，牟取高额利润。与此相应，寺庙的职事分工日益精细，上下等级更为分明，染上了浓厚的封建宗法色彩，创立了剃派、法派，成为变相家庭，远离了佛祖释迦牟尼为僧团奠定的民主精神，即便是在农禅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寺庙，也日益显示出庄园经济功能，田产租佃盛行，僧尼坐食租米，成为与农民相对立的阶层，贵族私建（侵占）的功德寺，也拥有相当数量的田园、山林，并享豁免赋税、徭役之权利；至神宗时期（1067~1085），因年荒、河决等灾害频繁，国家急需赈款，开始发牒征费，又使得寺庙经济与国家财政的矛盾加剧，再至 1100~1126 年在位的徽宗帝笃信道教，强令佛道合流，改寺庙为道观，虽时间不长即已恢复，但也给佛教以沉重的打击。凡此等等，导致佛门的法脉心印传承，在很大程度上演变为寺庙的资产继承，加之寺庙与寺庙间、僧尼与僧尼间，山头林立，派系重重，大家皆将目光凝聚于经济效益、自家弟子，殊少关心社会发展的全局，则不可避免地反映出僧尼的整体教化缺位。

2. **规模失控，整体素质衰颓。**佛祖释迦牟尼虽倡导出家，但并非许可任何人都可为僧为尼，剃度弟子拣择颇严，旨在保证僧团质量。历朝统治者，多对僧尼出家实行名额配给，试经发牒，以不致僧团恶性膨胀危及国家财政，兼收保证僧尼素质之效。宋政权初立，停止了寺庙的毁废，并给佛教以适当的保护来加强国内统治。建隆元年（960），度童八千；乾德

四年（966），令沙门行勤等 157 人去印度求法；太平兴国五年（980），印度僧法天、天息灾、施护等先后来京（今河南开封），使中断已久的佛经翻译工程得以恢复；开宝四年（971），使内官张从信至益州（今四川成都）雕刻大藏经版。相关措施之推行、落实，促使了佛教的急剧传播和膨胀发展。清徐松的《宋会要辑稿·蕃夷道释》载，宋立国初期（960 年），境内仅有僧尼 67403 人，天禧五年（1021），全国就有僧 397615 人、尼 61239 人，合计 458854 人，及至北宋末年（1127），进士许翰记曰：“窃料今天下僧与在籍而未受度牒者，又有田园力役之隶，合集不减百万”，规模又较天禧年间大大增加。小朝南宋，领域内也有僧尼 20 来万，区区行在临安（今浙江杭州）就有寺庙 480 所，比例明显超重。大批信仰欠缺、不通佛法的流民涌入僧尼队伍，以致佛教戒纲不振，僧风颓废，由此带来整个佛门的社会形象与地位的急剧下降。

3. 畸重民俗，文化品位肤浅。传统佛教强调出世，虽主旨难以深入民众百姓，传播多限厌世、逃避阶层，名士未到老年、英雄不到末路不学佛的现象普遍，但就总体而言，僧尼的文化层次相对较高。而随整个社会潮流的日益世俗化，真正虔信佛法、真诚修行的厌世、逃避阶层的范围渐趋缩小，佛门自身又无与时俱进的文化内涵吸引士大夫、理学家的关注，逐渐丧失了活泼的生机。所谓之佛学，实际只剩下一句“南无阿弥陀佛”的六字名号，而成为一种烧香磕头、吃素念经的简单仪式，即便是禅宗推举的融通出世与世间的“心性之学”，也因其内容主要关乎人之所以为人，理念强调觉悟，侧重出世，与具体操作之难度，亦无法取得整个社会的认同，故而受到站在儒家立场的士大夫的非议。庆历二年（1042），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致仁宗帝《本论》，认为佛教为患，乃是“王政缺”“礼义废”的结果，强调“王政修明”，礼义之教充于天下，则“世虽有佛，无由而入”；及至理学兴起，排佛又成为该学派的重要内容之一，著名哲学家、教育家、诗人、理学奠基人程颢抨击佛教：“其术大概且是绝伦类，世间不容有此理。又其言待要出世，出哪里去？又其迹须要出家，然则家者，不过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处此等事，皆以为寄寓，故其为忠孝仁义者，皆以为不得尔，又要得脱世网，至愚迷者也。”批评僧尼，“今之学禅者，平居高谈性命之际，至于世事，往往直有都不晓者，此只是实无所得也。”在此等社会潮流的冲击下，迎合底层民众百姓口味的世俗佛教，逐渐成为主流，低层次的神像崇祀，庸俗的教义诠释，遮掩了佛祖释迦牟尼依智慧自净其心而获解脱的主旨，文化品位大大降低，一些农村和边远地区的僧侣，甚至娶妻生子，结果更加受到士大夫和理学家的鄙视和攻讦，甚至被扣上“无君无父”“入家破家”“入国破国”之罪名。

南宋时期，曹洞宗第十三世佛祖、日本曹洞宗始祖之一的天童（浙江宁波）长翁如净禅师，对佛门之消极积弊现象，就有明确的揭露：

某甲当时挂锡径山，光佛照其时有粥饭头，上堂云，佛道禅法一定不可求之他人言句，只各自理会。如此说，僧堂里都不管，云水兄弟也都不管，只管与官客相见追寻已耳。佛照殊非佛法机关，一心只贪名爱利，佛法若各自理会，何有寻师访道之老古锥哉！真个是光佛照不曾参禅也。今诸方长老无道心，只光佛照个儿子也。佛法那得他手里有，可惜！可惜！如此说佛照子孙恁么，多半不见有名者。

长翁如净禅师高足、天台山万年寺元熏禅师爱徒，日本佛教思想家、曹洞宗创始人道元禅师亦感叹云：

大宋国之僧家内，有不具参学眼之辈，多留长爪，或留爪一寸、二寸，或留三、四寸……

或蓄长发……先师古佛常就天下僧家长发长爪之辈提出警诫云：不会净发，不是俗人，不是僧家，便是畜生。古来佛祖，谁是不净发者？如今不会净发，真个是畜生……来二三百年，因祖师道废，如此之辈甚多。由如此之辈担当寺院主人，署以师号，为众之相，人天无福。今天下诸山道心浑无，得道个久绝，只管破落党也。

而其时的南宋社会，深深刺痛大汉民族心身的“靖康耻，犹未雪”，徽、钦二帝为金军所虏，囚禁五国头城（今黑龙江依兰县城北门外），未满六十，皆客死异邦。金先后于北册立张邦昌、刘豫为帝，改国号为“大楚”“大齐”，充作傀儡。康王赵构虽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皇帝位，改元建炎，但内心畏惧金军，一味南逃，最后偏隅行在临安。但当赵氏小朝有了苟且偷生的一席立足之地后，居然不顾北国依然蹂躏金人的铁蹄之下，消极北伐，却又不惜劳民伤财，于行在临安大兴土木，筑禁城、外城，建行宫、花园……，纵情声色，寻欢作乐。“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南宋林升《题临安邸》）。加之小朝政治昏聩、奸佞当道，公正失衡、黑白颠倒，“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抗金名将、军事天才岳飞，在绍兴十一年除夕前夜（1142年1月27日），被扣以“莫须有”之罪名，随行在临安的凛冽寒风和飘落雪花，化作一缕冤魂升上九天。济公祖父，一介知县，为抗金兵，家资犒军，沙场血战，马革裹尸，壮烈殉国，也曾被上官诬为“逃遁”，一度含恨九泉。经纶贤达、民众百姓，遥望中原，痛心疾首、扼腕长叹！当政的丧权辱国与百姓的生活艰辛，促使济公从一个没落的豪门阔少，领悟到“世人所急，最是饥寒，性命所关，无非衣食”（济公《化盐菜疏》）。出家后，看到佛门又非想象中的“清静”“庄严”之地，与自己弘扬佛法，普度众生，拯救生民于苦难的宏伟壮志相距甚远，因之愤然疾呼：“人心有佛，不碍真修；俗眼无珠，必须见像”（济公《重建净慈寺疏》）。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交织中，禅机促使他作出出走山门、信脚天下，浮沉市井、“疯颠”济世的抉择，主动、自觉承担起祈望呐喊、匡扶正义，打抱不平、抑浊扬清，慈悲济世、普度众生的社会责任，实现了在畸形的世道，用特独、曲折的行为方式，叛逆抗争社会公正失衡、佛门消极积弊的一种心灵超越，多角度地激发了不同社会阶层将意识投向济公，并以济公为心性自由、愿望表达的偶像，救苦救难的罗汉、菩萨（仙真）、活佛（天尊）。各个方面的力量聚合，终使它升华为一种信仰，水到渠成地在南宋时期得以诞生。

济公的“疯颠”济世影响很大，南宋以来的史志、辞书、灯录（道影、仙谱）、传记（笔记）、语录（诗偈）、小说（传说）等，多有记载描述，其形态突出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疯狂游戏。济公“非俗非僧，非凡非仙”“浮沉市井，或与群儿呼洞猿、翻筋斗”，这与通常僧人总是身披袈裟，梵宫打坐，诵经礼佛，道貌悍然，俨然就是菩萨、佛的化身，相距甚远。

二是嗜酒啖肉。济公“疯狂不饬细行”“饮酒食肉”“暑寒无完衣，予之，寻付酒家保。”这与僧人须终身恪守“不杀生、不饮酒”的戒律相悖。

三是露阴自视。济公“不着裈，形媿露人，姍笑自视。”这与人类自亚当、夏娃，偷食了知善知恶树之禁果，被逐出伊甸园后，即为自己的赤身露体感到羞耻，先是用树叶、兽皮之类掩盖私处，后演变为用文明的衣裤，把纯洁的肉身作了包装。除了不懂事的孩童，在公众场合、他人面前露出“要害”，往往就被认为是“颠”的表现。

不过，把济公之“颠”，与南宋的时代背景联系起来分析，显然又是他的一种无可奈何

何之举，更是一曲心灵伤感的悲歌。

1. 游戏人生。三国魏人李康的《运命论》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众，人必毁之。”考济公龙子凤孙，世系显赫，门弟高贵，靖康之难，宋室南迁，家道中落。作为李氏贵族的裔孙，回想祖上是何等荣耀，如今却寄寓他乡，不免悲愤苦恼、心酸落魄。而其时的僧尼，大多或为衣食，或为逃避，这与济公为僧，旨在承担道义，匡扶正法，普度众生，明显有天壤之别。故在当时，济公应该属于僧团中的另类，惟以不露真相的玩世不恭、放荡不羁之态，自我解脱，致给后世留下诸多难解之谜。

2. 隐掩神通。佛教传入中国后，对随修行成就伴随而来的神通，历来都持肯定态度，但佛祖释迦牟尼素不允许弟子于世间使用神通，如宾头卢罗汉曾显神通于世，即受佛祖的斥责，令其至西瞿耶尼洲施化，后虽听还，仍不许其入于涅槃，而为末法之人作福田。因之，佛门高僧对神通感应，在正式、正规场合一般都是不提。若以神通济世，要么在神通展示后立刻寂灭，要么就以疯颠形态示现。明尧、明洁合编的《禅宗大德悟道因缘》载，唐元和年间（806~820），隐峰禅师拟登五台，路出淮西，逢官兵与叛军吴元济交锋，未决胜负，曰：“吾当去解其患。”于是掷锡空中，展“神足通”飞身而过，两军将士仰观，斗心顿息。禅师既显神通，至五台后即于金刚窟前倒立而化。这就是近现代净土宗十三世佛祖印光大师《文钞》所说的，“凡佛、菩萨现身，若示同凡夫，唯以道德教化人，绝不显神通；若显神通，便不能在世间住，唯现作颠狂者则显无妨。”济公济世，志行高远、神功叵测，故只能撷取后者，以“疯颠”示行。

3. 张扬个性。《妙法莲华经·常不轻菩萨品》云，菩萨常行礼拜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四众，并不时讲，我深敬汝等不敢轻慢，皆因汝等行菩萨道，当得作佛。由于菩萨的行为不为四众所接受，反遭辱骂捶打，但历经多年，菩萨仍不改其礼拜赞叹之行，因而被人视为怪异。清邵长蘅的《八大山人传》也载，明末清初八大山人朱耷，意忽忽，不自得，忽大笑，忽痛哭；一夕裂其浮屠服焚之，走还会城（今江西南昌），市中儿随观哗笑，人莫识之。济公狂而疎、介而洁，抱负宏大，个性张扬，心胸坦荡，不拘小节，凡事坚持原则，品性高洁，不同流俗，走自己的路，“疯颠”济世，矢志不渝，上承常不轻菩萨之禅风，下为八大山人所继承。故从个性特征分析，济公即便为当时的僧团所容，也绝不会是个唯唯诺诺之辈，他翻筋斗暴露下体，乃是其明心见性，自然顿悟的表现，而非不知俗礼之所为也。

4. 叛逆抗争。济公生活的南宋时代，行在杭州因逃过战争的破坏，相对繁荣，市民意识觉醒，挣脱封建礼教束缚，追求自由生活方式，实现人性解放已成为一种思潮萌芽。济公为僧，不忘自己生在凡间，接触红尘世事、善恶美丑，高扬佛祖释迦牟尼的“人间佛教”大旗，积极入世，弘法布道，把民众百姓的渴望变成自己的行动。他浮沉市井，不守清规，饮酒食肉，呵佛骂祖，我行我素，来去自由。凡事以先满足人欲，填饱肚子再理会禅机。有意无意都对朝廷推崇的“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封建理教，进行了有力的讽刺和反叛，自觉利用“疯颠”实现自己的济世抱负。民众百姓正是从济公的叛逆行为上看到了人性的解放，这不乏也是济公信仰得以广泛流传的重要因素之一。

承上所述，济公为僧，虽其以佛法救国济世的理想，在黑暗的封建社会中注定不可能实现，但他矢志不忘初心，经四时寒暑之变，受霜雪风雨之苦，“东壁打到西壁”，以自己的出世入世、“疯颠”济世行为，率先垂范倡导、疾呼佛教应当适应社会的发展，应当利益民众百姓的需求，使得民众百姓从济公的事迹功德上，感悟了佛的智慧，明白了菩萨的慈悲，

出于对济公的尊崇、缅怀之情，他的貌似颠狂，反道成为神佛的韬晦可敬。

诚然，无论何种信仰形态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特定的生态环境造就。济公生于天台、长于天台。天台山者，紧靠神秘、奇特的北纬 30° 线，顶对三辰，上应台宿，自东晋玄言诗人孙兴公一曲掷地有声的《天台山赋》唱响而名扬天下，素与江西庐山、广东罗浮山，一起列名与“五岳”并称的“陆上三山”，对应“蓬莱、方丈、瀛洲”海上三山。漫漫历史长河中，神奇的天台山孕育了无数的辉煌。早于唐宋时期，是山的儒释道三教已经趋向融合，素以“东土佛国，仙景桃源”“东方的耶鲁撒冷”（现代美国南加州大学李建军教授语）称著于世。隐居天台寒石山寒岩的寒山子，虽传统都将其归属“释”之行列，但他自己却诗云：“欲得安居处，寒山可长保；微风吹幽松，近听声愈好。下有斑白人，喃喃诵黄老，十年归不得，忘却来时道。”济公年少功读于儒敬圣、释尊佛、道修仙的赤城山，三教圣地的共生共荣生态环境，及其所表现出来的和合张力，不无可能与济公的认知、适应没有联系，及对后来道济的亦庸亦圣、亦凡亦佛、亦俗亦仙的秉性特征，与三教圆融同修之范式产生影响。也正是李修缘于赤城山这一别有韵味的顿悟，造就了一位不耐坐禅诵经，喜好饮酒吃肉、徜徉山水，浮沉市井，在戏谑谈笑间扶危济困、惩贪罚恶，解民众于倒悬、救百姓于水火的人间活佛，并以落拓佯狂的外表、诙谐幽默之谈吐、慈悲济世的功德，传遍神州大地，迈出国门，走向世界……。

（二）文化因素

文化因素，是为济公信仰产生的意识形态反映，包括济公的济世功德、修持果位、灵异神通，及相关之显赫世系、晶莹舍利、传说催化等，与社会因素相辅相成，共同促成了济公信仰在南宋时代的诞生。

1. 济公的济世功德。综合明仁和沈孟祥（杭州古为钱塘、仁和二县，也有称沈为宋代人氏）叙述的《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又名《钱塘渔隐济颠禅师语录》《济颠语录》），明末清初徐人瑞、程瑶初稿，徐道、程毓奇续成的《历代神仙通鉴》（又名《三教同原录》），晚清秀才留学日本的天台名贤陈钟祺的《天台山文化史》，现代丁天魁主编的《国清寺志》、许尚枢的《天台山济公活佛》、明德的《济公与济公故居志》等著之记载，济公是在父母归西守孝服满，舅父王安世（士）为其操办婚礼之时，跑到国清寺，跪求住持收他为徒，因沙弥智清难容，众亲劝婚不断，再至杭州灵隐寺拜投瞎堂慧远禅师，受俱足大戒，从而成为瞎堂的法嗣弟子。但是，济公为僧，住灵隐寺未达六年，即自南宋乾道六年（1170）二月拜瞎堂慧远为师（该寺济公殿简介济公，“南宋淳熙三年出家于灵隐寺”明显有误），赐名道济，至淳熙三年（1176）正月瞎堂往生，失去庇护，在办结慧远丧事后出居灵隐，弘法布道足迹遍及浙江雁荡（温州·台州）、东阳、西溪（杭州），与江西、安徽、朱泾（上海）、河南、河北，新疆、陕西、四川、宁夏（甘肃）、山西等地，及相应的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也有可能到过福建，至嘉泰初年（1201）德辉禅师住净慈寺并主丈席，且其贤亦如瞎堂慧远，方才前去投奔，任西序书记僧（虚职），至嘉定二年（1209）五月十四（另说五月十六）圆寂，阇维舍利奉敕塔葬杭州虎跑（“奉敕”塔葬是乃《历代神仙通鉴》所记载）。

考相关文献史料，济公的济世事迹主要有八：

①题墨隼永，访遗览胜。南宋释居简的《湖隐方圆叟舍利铭·济颠》载，济公“天台、雁荡、康庐、潜皖题墨尤隼永。”铭文之“雁荡”，主体位浙江温州东北部海滨，小部坐

台州温岭南境，开山凿胜于南北朝，兴于唐，盛于宋；其中，观音洞嵌于合掌峰中，为唐代高僧善牧之居所。清康熙年间，温州江心寺住持释元奇的《江心志》，专门辑录了“巨川”即济公的《酹江月·游江心》词：“海天秋晚，正千树低黄，香垂橙橘。买个扁舟凌银浪，闲坐中川片石。练绕长江，翠围群岫，别是神仙窟。参差楼阁，半从烟雨中出。好是鳌背花宫，狮踞莲座，对浮金涌碧。试问重来缘底事，沙雁沙鸥犹识。两岸笙簧，半空钟梵，咫尺分喧寂。倦摩双眼，细寻灵运遗迹。”《舍利铭》之“康庐”，乃宋时江西庐山的别称，东晋太元九年(384)，“笛圣”桓伊任江州刺史，于是山为慧远大师建东林寺，开创汉传佛教净土宗。铭文之“皖”，即旧时安徽安庆境西的古国名，今为安徽之通用简称，地藏菩萨道场九华山位皖之池州青阳县境，称著中国佛教名山。《游江心》词所称之“灵运”，即谢灵运，为南北朝时期杰出的诗人、文学家、旅行家。

明释明河的《补续高僧传·二颠师传》、清别庵性统的《续灯正统》等著亦谓，一日，济颠与明颠（华亭普照寺「今上海松江」僧，名惠明，号晦庵，善诗，狂放潦倒，俗称“颠僧”）偶识于朱泾。明颠目之曰：咦；济颠赠明颠诗：“青箬笠前天地阔，碧蓑衣底水云宽；不言不语知何事，只把人心不自瞒。”清朱栋的《朱泾志·遗事》，亦有相同之记载。朱泾以河“朱泾”得名，高僧兼著名词人船子禅师曾居此弘法，后人纪念建法忍寺。唐宋以来，高僧、墨客至朱泾寻访船子和尚遗迹的，络绎不绝，无疑济公当是其中之一。

近年，在福建漳浦梁山下的宋代石刻林中，发现一幅明智山和尚描摹镌刻的《心经》摩崖（末页附件一），经诸多书法家考证，认定是南宋济公的手迹。至于是幅摩崖的“墨宝”底本，到底是济公在福建所书，还是在其它地方所写，尚待考？

②河北传法，僧众建塔。本世纪初，河北古城正定荣国府西民居出土“济公和尚塔铭”（末页附件二），石碑宽45厘米，高60厘米，上书行楷“济公和尚塔铭”六字，落款为“资圣院试经具戒比丘门人讲法华经沙门明泰明谏明坚建”，与“明昌二年二月十五鹿泉张旺刊”七竖行小字。“明昌”者，金章宗完颜璟之年号也，明昌二年即南宋绍熙二年（1191）。正定当时为金国腹地，建塔勒石用其年号亦属自然，且时间也在济公1176年出居灵隐至1201年往依净慈期间。进而联系，温州江心寺住持全大同长老（道全禅师），于济公治丧时所作的《送净慈济书记入龕文》，载济公“参透远老葛藤，吞尽赵州荆棘”一语，其中之“远老”，即济公师父瞎堂慧远，所谓之“赵州”，为今之河北石家庄赵县，与塔铭出土的正定相距不过50~60公里，誉称华夏第一塔的“陀罗尼经幢”，及著名的“柏林禅寺”皆位于此，六祖慧能之第四代传人从谏大师，曾于唐大中十一年（857）行脚至此，驻锡观音院传法四十年；近邻正定的石家庄鹿泉市城西，有山名“抱犊寨”，五百罗汉堂塑蹲柱济公像，与正定隔了道太行山的山西榆次，亦有济公于此讲经的故事相传。塔铭的出土，《入龕文》的记载，“抱犊寨”蹲柱佛像的存在，榆次讲经的传说，点线连接，相互吻合，足证济公当年在河北正定一带弘法的事迹不虚，且所居时间也是不短；否则，不大可能发生当地僧人为其请建生基（寿塔）之事，及周边有济公“讲经”的传说流布。

③业识忙忙，风流则剧。运庵普岩禅师赞济公诗谒曰：“毁不得，赞不得，天台出得个般僧，一似青天轰霹雳。走京城，无处觅，业识忙忙，风流则剧。”鉴于普岩为宋代人氏，而时人所称“京城”者，一般应为当代之“国都”。而宋代国都者何谓？一曰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汉传佛教十大名寺之一的大相国寺位于此，且又为济公祖上的府居之地；二曰西京洛阳（今河南洛阳），中国佛教发源地白马寺位于此，禅宗祖庭少林寺与之隔山相望；

三曰南京商丘（今河南商丘），建炎元年（1127），宋高宗赵构在此即位，千年古刹清凉寺、灵台寺、圣寿寺、白云寺、蒙墙寺皆位于此；四曰北京大名（今河北邯郸大名），宋仁宗为抵抗契丹南侵，于庆历二年（1042）定陪都于此；五曰江苏南京（古称建康、金陵，又谓江宁、石头城、天京、应天等），宋室南迁，群臣皆议于建康立都，以匡显光复中原之图，是因高宗消极北伐，没有准许，后又迫于舆论，定金陵为行都，不久改称留都；六曰浙江绍兴（古称会稽、山阴、越州、吴会等），建炎三年（1129），宋高宗驻蹕越州，颁《行在越州条具时政》，绍兴元年（1131）升越州为行都绍兴，自称“绍兴天子”；七曰浙江杭州（古称临安、仁和、钱塘、武林，别谓杭城等），绍兴八年（1138），宋高宗从绍兴迁居临安，钦定临安为“行在”。但在济公文化研究中，至今尚无济公信脚河北邯郸大名、江苏南京与绍兴弘法的事迹发现（不排除往返路过等），故对普岩的“走京城”，只能作济公信脚河南解；诗之“风流则剧”，表明济公的弘法布道影响很大，受到当地僧尼、民众百姓的普遍拥护与好评。

④横说竖说，耸动王侯。济公圆寂，杭州灵隐寺铁牛印禅师作《送净慈济书记起龕文》以祭，文谓济公，“世居东浙，祝发西州；逆行顺行，凡圣莫测；横说竖说，耸动王侯。”祝发者，其固有含义即削发为僧、为尼，同时也指称中原以外的少数民族地区的装束、习俗也。所谓之“东浙”，即浙江天台也。“西州”者，考字典、辞书，一曰汉晋时的鲋烟西州，古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为中原，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华夏民族更视中原为天下之中心；鲋烟西州者，即中原以西之区域。二曰陕西地区，今之省会西安（古称长安、镐京等）。三曰巴蜀地区，即今之四川、重庆。四曰新疆吐鲁番一带，唐贞观十四年（640）灭高昌氏王朝，以其地设西昌州，不久改称西州。由此联系济公的“幼年曾到雁门关，老去分明醉眼看。忆昔面前当一箭，至今犹自骨毛寒。”与“一从暂出玉门关，万里胡尘过眼看；谁道东风怨杨柳，至今沙暖水无寒；单于冒顿平相识，不枉生还又此番”之诗文，并明盛时泰《元犊记》辑录元“无竞斋”的《湖隐上人赞》，谓济公“有时结茅晏坐荒山巅，有时长安市上酒家眠。”足以说明，铁牛印禅师《起龕文》所称的“西州”，是乃今之新疆、陕西、四川、宁夏（甘肃）、山西一带，及相应的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这与久美却吉多杰编著，曲甘·完玛多杰翻译的《藏传佛教神明大全》，载济公为观音菩萨化身，及宁夏泾源历有济公修行老龙潭南延龄寺的传说，亦相印证。显见当年济公是以西部少数民族的装束、习俗，信脚“西州”等地弘法布道，并在“横说竖说”的弘法过程中，“耸动”了“单于冒顿”等王侯，或参加听经，或召见济公，方才成为“相识”。

⑤建寺垒桥，关注生态。南宋浙江兰溪徐畸1185年辑撰的《重游禹山会大智院新修记》载，大智院（今东阳横店大智禅寺前身）“其库庖斋房廊庑庖，自堂殿以下，大抵出于宣和（1119~1125年）兵火之后。后稍葺治，而摧剥倾驰者，尚十三四也。所阅主僧凡几人而莫有终始以其事为己任。于是，道济者有志焉。余于是时，方行禹山，思穷其寻访大智院。虽僂焉，少休止，未知其终果何如。他日再过之，则既灿然有可观，而后知济之所为，终以不愆于素。其营彻整治之功，用竹木瓦石丹雘之饰，为钱盖六十万有奇。济所自力不足，而取之檀施。盖自淳熙壬寅（1182）迄淳熙乙巳（1185）是役也，终始四年，于今而粗克有成。……济之一切功用，其在大智院。……不可使无传也。济方有请，故书之，盖作记之本末具焉。淳熙十二年十一月十四日记。”

再有，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官江西布政司参议黄汝亨的《永兴寺碑记》谓，

杭州“西溪名刹，曰永兴寺，……济颠复垒石为安乐桥。不数武，而当水啮处，嵌埒欲堕，乃夏涨秋灌，势甚冲决，而岿然独存，真圣迹也。”清吴本泰的《西溪梵隐志·纪刹》亦云，永兴寺“济颠垒石为桥。尝至秋，百谷之所啮，而圣迹岿然。”这与明沈孟祥《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载济公的《安乐山桥疏》，即“伏以山藏古寺，水接平陂。西溪市北，安乐山桥，坍塌年深，往来不便。欲建连云之势，全凭驾石之功。资金浩大，独力难成。辄持短疏，遍扣大檀；诚哉劝资，慨然乐助。迭石横空，杜预建时从固有；跨溪通道，相如题后岂今无。不惭风漱石，还爱月盈河。水流碧草环中过，人在苍龙背上行。桥梁万代，福禄无穷。”可谓前后相承，足证济公募疏、建造永兴寺安乐山桥的事迹真实。

以济公修葺大智寺、建造安乐山桥的事迹作为铺垫，进而联系济公的《重建净慈寺疏》^[9]，与明沈孟祥的《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释大壑的《南屏净慈寺志》，清释际祥的《净慈寺志》、天花藏主人的《济颠大师醉菩提全传》等著的净慈寺复建过程介绍，及南宋程秘的《嘉定十三年〈重建净慈报恩光孝禅寺碑记〉》载，净慈寺“嘉泰之四，埃于郁攸（火气、火焰）。退谷义云载：吼龙虬，杰阁层空天，画云浮河沙，真谛辍赐龙楼。惟是罗汉之林、大雄之殿，费大莫兴。星霜几换，嘉定庚午起禅老崧，一顾慨然，就振祖风，尔议择材，尔谦程工，规置坚定，一朝屹立，都人骇叹，谓出神力。”与潜说友的《咸淳临安志》谓，净慈寺“嘉泰四年又毁，朝廷仍给钱重建，嘉定十三年始成”予以综合分析、前后理顺，从中便可证得一个比较衔接的大体定论，即南宋嘉泰四年（1204）净慈寺火毁，济公在德辉长老随火往生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安抚僧众、募疏行化，启动复建工程，因之感动朝廷，得到资金支持，并实际主持了除大雄宝殿、罗汉堂以外的阶段性工程建设。无奈天命有限，壮志未酬，大业未竟，于嘉定二年（1209）五月圆寂，再至妙崧长老接力，于嘉定十三年（1220）“始克竣事”。为感恩济公的建寺功德，嘉定十四年（1221），净慈寺就供奉了“济颠禅师”之石刻画像，嗣后又刻植了济公的《辞世偈言》碑，以示缅怀。

明释大壑的《南屏净慈寺志》还载，杭州南屏临湖（西湖）一带，夹路多长松，落落荫人……宋时有临安赵府尹，将伐他用，寺僧道济给府尹写了一首情真意切的“乔松百尺接天高，曾与山僧作故交；几望枝柯千载茂，独怜刀斧一齐抛。窗中不见龙蛇影，耳畔无闻风雨号；最苦凌晨飞去鹤，晚归已失旧楼巢。”（明沈孟祥《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与清释际祥《净慈寺志》版本，个别文字略异）之诗，终于感动府赵尹放弃采伐，保护了西湖的生态环境。

⑥以人为本，怜悯众生。南宋释居简的《湖隐方圆叟舍利铭·济颠》载，济公“勇为老病僧办药石。”明清诸多文献也描述，济公怀里总是携有丹药，随时取出可以给人治病消灾，曾使双目失明的郑雄之母重见光明，治愈临安知府赵凤山婢娘之疾，药敷小酒店掌柜腰痛，医好王忠的病象。此外，明释大壑的《南屏净慈寺志》还谓，濒湖居民将食螺蛳，已断其尾，济公乞以放之，遂活。清沈镛彪的《续修云林寺志》亦云，灵隐寺前涧水中，有螺无尾，有鱼半焦，相传也是济公，见人釜中煎鱼，乞求予以放生。2016年，明德编著《济公与济公故居志》，曾专访杭州永兴寺，寺僧介绍，济公当年放生的无尾螺，至今确实存活于杭州西溪一带，看来此事果真不虚。

⑦瘴恶不阿，击扫奸相。元代伊始，就有“疯僧扫秦”的故事流传与戏剧献演，大略是讲疯僧“叶守一”（也作“叶守益”）于杭州灵隐冷泉亭，揭露奸相秦桧与其妻王氏密谋东窗，陷害岳武穆，并以地帚“疯僧扫秦”。事经清广西、江苏巡抚梁章钜的《浪迹续谈》，

江阴知县陆次云的《湖壖杂记》，与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释巨赞的《灵隐小志》、浙江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徐宏图的《济公戏曲贯古今》等著考证，该历史事件真实存在。其中，梁章钜的《浪迹续谈》明确载：“扫秦之疯僧，即济颠。”徐宏图的《济公戏曲贯古今》亦结论，“秦桧与妻王氏谋于东窗，事将发，桧赴灵隐寺烧香，途遇颠僧济公，为其点明隐情，并用扫帚击之。”

⑧精诗善文，出口珠玉。济公精诗词、善文翰，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明沈孟祥的《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入编其《自供》云：“幼生宦室，长习儒风。……暗通三藏法，背记十车经；善绎五天竺书，能番六国梵语。”马愉、曹鼎等官修国藏的《文渊阁书目》，与晁璠的《宝文堂书目》，分别有“《济颠语录》一部一册（卷十七·寒字号第一厨书目·佛书）”“《红倩难济颠》（子杂类）”之载，无奈二书的传本目前尚未发现，因而无法判定到底是他人述写济公，还是济公自著？清释际祥的《净慈寺志》亦谓，济公著有《镌峰语录》十卷、《法舟语录》二卷（勿与《明嘉兴大藏经》的山铎真在、明道济的《天宁法舟济禅师语录》混淆）；天台名贤陈钟祺的《天台山文化史》，亦称济公著有《镌峰语录》二卷、《法舟语录》二卷、《法舟和尚剩语》一卷。甚为遗憾的是，这几部书的传本目前也无踪迹可考。现代新版《全宋文》，收录济公文章十六篇；明德编著的《济公与济公故居志》，收录济公文翰四十七篇、诗作八十三首。拜读济公的文翰、诗作，给人发自内心的感悟就是说理周密、主旨鲜明、对仗工整、内涵丰厚，字字珠玑、句句玉律、掷地有声。从济公的文翰、诗作中，能够接收到他主张众生平等，关注伦理道德，冀求净化人心、祥和社会的强烈愿望，能够感受济公贴近民众百姓、信徒信众，亲切平和、芬芳浓郁的生活气息；能够使人折腰信服，杭州净慈寺之所以能够灾毁复建，劫后重光，与他的绝妙疏文所起的作用也是不能分开。无怪乎，现代国学大师南怀瑾，把济公与南宋文史学家、爱国诗人陆游相提并论；清时，杭州灵隐寺法席晦山戒显的《济颠本传序》，更是评价济公，“尽大地儒释，皆让一头地”。所以，济公历有“圣僧”“儒僧”之誉称。

而自济公信仰产生，后人普遍称济公遗下的介绍、阐述儒释道三教思想、道德、行谊的文翰、诗作为“经”，历代先圣、先贤又据济公的言语（著述）、认识（观念）、思维（逻辑）、心理（直觉），及其慈悲济世、无我利他的事迹功德，与成圣成佛成仙之心路历程，演绎辑撰了大量的济公经文，诸如《济公禅师度世妙法经》《济公活佛醒世真经》《西湖灵隐道济古佛玉琐真经》《慈悲济公宝忏》等都是，还有“济公”降笔所作的乩谕、乩文等，数量更是洋洋大观，目前大多散落于历史上、近现代的梵天极乐宗、理教、义和团、皈一道、一贯道、同善社、天德教、中国济生会、德教、轩辕教、天帝教、康济会、圆玄学院、东井圆佛会等教派，及其衍生的寺庙、宫观、堂坛、阁社、团体的档案与典籍之中，亟需予以系统整理、辑纂汇编。

上列八个方面的济公事迹，是乃根据文物、史料、文献的记载整理，不过是济公事迹的吉光片羽而已，大量小说、传说的济公事迹介绍，尚需继续考证。诚然，由于正史、信史对济公的事迹记载本来匮乏，且自济公信仰产生以来，明清时期的济公文化领域又出现了史传一体的格局，史为传引，传为史载，以及后来的济公小说、传说，济公绘画、雕塑，济公戏曲、影视的高潮迭起，精彩纷呈，虚实颇难区分，因之必须通过不懈的深入研究，以期逐步完善。

2. 济公的修持果位。修持果位，即证悟之境界也。如儒家以道德才智的高超程度，及对

社会发展的贡献大小，分为圣人、贤人、君子、庸人等。圣人者，德高望重也，有大智，在社会发展中作出重大贡献，是为人类的完美之人；贤人者，好恶、取舍与民众同情同统，行中矩绳而不伤本，言足以法天下而不害，躬为匹夫而愿百姓富贵之人；君子者，才德出众之人；庸人者，见识浅陋、碌碌无为之人。佛门有佛、菩萨、罗汉、缘觉、声闻等，其中：佛是自觉觉他、觉行圆满，为境界之最高；菩萨为自觉、觉他，一面修持佛果自度，一面普度众生到极乐彼岸的修行者；罗汉即修持已达除去一切烦恼，接受人天供养的修行者；缘觉是独自修行，观“十二因缘”（说明有情生死流转过程，包括无明、行、识、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生、老死等内容）之理，觉悟无常，断除烦恼，证悟真理，从缘得觉的修行者；声闻谓依教修行，证悟“苦（知苦）、集（断集）、灭（慕灭）、道（修道）”四谛，断除“见思（见惑与思惑）烦恼”，达到自我解脱的修行者。道家有天尊、仙真等，前者一般谓先天得道之天神，亦包括世间修炼得道，功德无量、地位高贵之神明；后者是指通过修炼得道，洞悉宇宙、人生本原，真正觉醒、觉悟，且已飞升不死，但地位逊于天尊的仙人，又称神仙、真人。

济公为僧，出世入世，人间修持，成就卓著，儒释道三教对其修持果位之界定，尊隆有加，谓“大慈大悲 大仁大慧 紫金罗汉 阿那尊者 神功广济先师 南屏正宗启教弘化佛祖 龙华会上大圆通妙如来 三元赞化天尊”，长达四十八字，简称“大慈大悲 大仁大慧 紫金罗汉 阿那尊者 神功广济先师 三元赞化天尊”。

①在儒，济公称圣称贤。济公圆寂往生，禅宗五十二世佛祖夔州（今重庆奉节）卧龙破庵祖先禅师，率先谓济公：“是圣是凡莫测，掣颠掣狂稀有；一拳拳碎虚空，惊得须弥倒走。”须弥者，印度之神话山名也，后为佛教采用，位于一日月所照范围的世界中心，四方分别为东胜神州、南瞻部洲（地球）、西牛贺洲、北俱庐洲。明清徐人瑞、程瑶初稿，徐道、程毓奇续成的《历代神仙通鉴》也载，济公阇维舍利，是乃奉敕归葬虎跑^[4]。清郭小亭的《评演济公传》亦谓，南宋皇帝曾敕封济公为“护国散禅师”“天台大衍华藏无遮正觉大师”，钦赐济公“疯颠劝善，以酒度人，普度群迷，教化众生”十六字；宣统二年（1910）夏，傅宗黻、张之鼎的《创建紫金罗汉阿那尊者宋敕护国圣僧藏殿佛楼记》，标题就称济公为“宋敕护国圣僧”。入录民国十年（1921）《虎跑佛祖藏殿志》的《南屏宗统系表》《虎跑扫塔祭文》《祭文一道》《神功广济先师之乐歌》，也称济公为救命“护国圣僧”。故济公历有“圣僧”“儒僧”之誉。

另在济公信仰、济公文化传承中，因杭州上天竺寺宁棘庵长老于济公治丧时所作的《送净慈济书记起骨文》，有“天台散圣无人识，卧柳眠花恣飘逸”一语，故也有学者，将济公归列于寒山、拾得、蚬子、布袋和尚等高僧，称其为禅门“散圣”。然而，散圣者，犹散仙也。一是指未授仙职的仙人；二是比喻放旷不羁、自由闲散的人。由此联系南宋释居简禅师《湖隐方圆叟舍利铭·济颠》，描绘济公的“狂而疎，介而洁，着语不刊削，要未尽合准绳，往往超诣，有晋宋名缙逸韵。信脚半天下，落魄四十年。……暑寒无完衣，予之，寻付酒家保。寝食无定，勇为老病僧办药石。游族姓家，无故强之不往”之形象特征，显是指称济公为“放旷不羁、自由闲散”之散圣也。

②在释，济公尊罗汉、菩萨、佛。佛门对济公的修持果位界定，经历了从罗汉到菩萨、佛的两阶段晋升。

罗汉果位。佛教的罗汉信仰始于宾头卢罗汉，及后发展为十六、十八、五百、五百十六、

五百十八等身数。东晋兴宁年间（323~365），天台山佛国的开拓奠基者，敦煌高僧昙猷在石桥山“石梁”坐禅虔修。一日，忽然“横石洞开，梁道平正”。他度过石梁而入洞门，来到一处殿宇宏伟、宝塔瑰奇的地方，见香霭飘逸，法音清丽，金鸟回翔于林间、石上，五百梵僧或坐、或卧、或住、或行，游戏习定。他们款待昙猷用过午斋后，送回桥东，并告昙猷，再过十年，你也会来这里。瞬间，眼前景象消失，桥头巨石，横堵如初。不久，昙猷去万年山建庵栖居，亦见五百罗汉流连于八峰双涧之间。随之，天台山就不断有“罗汉显圣”“罗汉化身”和“罗汉转世”的传说流布。诸如，南朝陈隋之际，佛教天台宗实际创始人智顓（538~598，俗姓陈，字德安，世称“智者大师”）进山有罗汉指点，唐代寒山子与赵州从谏禅师对话，也涉“五百罗汉游山”之说。东晋隆安三年至义熙八年（399~412），我国首位赴“西天取经”的法显大师所撰的《佛国记》也谓：“佛言震旦天台方广圣寺，五百罗汉居焉。”唐贞观十九年（645），三藏法师玄奘西天取经返还长安，奉太宗皇帝李世民敕命口述，辩机撰著的《大唐西域记》（又称《西域记》），亦有相同的记载。天台山亦因《佛国记》《西域记》之说，成为佛教五百罗汉文化的发祥地。唐末五代，净土宗六祖、法眼宗三祖永明延寿大师，有诗纪天台山五百罗汉信仰之盛：

幡花宝盖满青川，祈祷迎来圣半千；
莫道性缘无影响，须知嘉会有因缘。
空中长似闻天乐，岩畔常疑有地仙；
何必更寻兜率去，重重灵应事照然。

吴越王钱鏐统治江南，专造五百铜罗汉供奉方广寺，开设香会。显德元年（954），杭州净慈寺开山祖师道潜，得钱弘俶的准许，迁雷峰塔下的十六大士像于净慈寺，创建五百罗汉堂。雍熙二年（985），宋太宗赵炅敕令造罗汉像五百十六身，奉安于天台山寿昌寺（今万年寺）；景佑四年（1037）十一月二十七，宋仁宗赵祯颁发《敕谕》，内谓：“雅闻天台之石梁，近接四明之雪窦，知觉之遗风具存，应真之灵迹俨在。”元《天台山志》引《五百应真居方广寺感应异记》亦云：“永嘉长史全亿，画半千罗汉形像”。日江户时代（1603年3月~1867年11月）以降，五百罗汉文化传播东瀛。甚为奇特的是，在五百罗汉文化传承发展中，竟然也有碧眼金发的“洋人”和封建帝王前来“插队落户”，如前广州西关华林寺的一尊罗汉，身穿西服、足登革履、头戴泥帽，传为元代的马可·波罗，昆明筇竹寺有基督教的耶稣罗汉，四川成都宝光寺罗汉堂供奉的阎夜多尊者、直福德尊者，则为清代的康熙、乾隆。

继天台山五百罗汉文化的广泛影响，传法弟子、信徒信众每每于是山迎请罗汉，都要在石桥方广寺夜宿，开设香会，及济公生于天台，长于天台，为僧桀骜不羁、嗜酒食肉，衣衫褴褛、形骸放浪，浮沉市井、疯颠劝善，弘法建寺、药石济世，精诗善文、题墨隽永，古道热肠、乐于助人之声名斐然，与其续佛慧命，践行“人间佛教”，秉树天地正气，打抱人间不平之事迹感人。济公寂后，天童如净禅师就赋诗赞济公曰：

天台山里五百牛，跳出颠狂者一头；
赛尽烟花瞞尽眼，尾巴狼藉转风流。

何以为“牛”？佛门素以牛为大力、生死自在和具圆融佛心之象征也。《法华经·火宅喻》称羊、鹿、牛三车分别喻声闻、缘觉、菩萨（罗汉）三乘，以大白牛车为佛乘。元魏（即北魏）天竺三藏菩提流支译，清通理辑集的《金刚般若经偈会本》亦谓：“言佛乘者，依

万行因华，严一乘道果，如大白牛车。”宋代廓庵师远改清居禅师八牛图而成的《禅宗十牛图》，所表现的就是禅者由寻牛、见迹、见牛、得牛、牧牛、骑牛归家、忘牛存人、人牛俱忘、返本还源、入廛垂手，终至见性的心路历程。进而理解如净禅师的“牛”诗前句，是乃禅师依据五百罗汉文化诞生天台山，指称济公为佛门“罗汉”；“牛”诗之后句，是为禅师步济公之《辞世偈言》，讲济公生前异于常人的“颠狂”表现，瞒尽了世人的眼睛，以致声名“狼藉”，但最终还是成为千古风流人物。明释大壑的《南屏净慈寺志》，与是代佛教天台宗中兴之祖释传灯的《天台山方外志》，也称济公为“天台五百应真之流也。”至清，杭州灵隐寺法席晦山戒显的《济颠本传序》再次肯定：“济颠，本天台罗汉，示迹尘中，出家灵隐，继迁净慈，踪迹最为奇特。”并赋诗赞曰：

怪而真罗汉，纵横魔佛间；
师尊一瞎老，颠尽两名山。
诗本天然韵，神通半杂顽；
金身披破衲，顶礼欲开颜。

自诸高僧大德对济公修持证悟的罗汉果位界定，自然而然也就衍生了济公乃“金身罗汉”降生，“紫脚罗汉”应真，“紫磨金色的紫脚罗汉”显化，亦有称罗汉堂东偏第一百八十八尊“揭波那光梵尊者”转世的传说创制、传播，从而成为济公信仰赖以产生的佛教基础所在。

菩萨、佛果位。明沈孟样之《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与释大壑的《南屏净慈寺志》皆载，济公圆寂往生，全大同长老（道全禅师）的《送净慈济书记入龕文》，就以五代梁时契此和尚的《辞世偈》褒扬济公，“弥勒真弥勒，化身千百亿；时时识世人，世人俱不识。”宁棘庵长老的《送净慈济书记挂真文》亦谓济公，“上人身赴龙华会，遗下神容记玉楼。……休笑这个规模，真乃僧家之首。”所谓之龙华会，典故乃佛陀入灭五十六亿七千万年后，弥勒菩萨自兜率天下生人间，出家学道，于翅头城华林园龙华树下成正等觉，分三次说法，昔时于释迦牟尼教法下未曾得道者，至此盛会，以上中下根之别，悉可得道，明显也是指称济公乃菩萨、佛应世，普度众生。进而联系前已述说的雪域高原的藏民族，素视济公为观音菩萨化身，奉为藏传佛教的神明之一，及清戒显禅师的《济颠本传序》，在对济公的罗汉果位介绍后，接着又从佛理高度作出说明，即菩萨住于生死，不为污行，而济颠竟为污行者何耶？良以既证果人，欲度执相凡夫，不得不隐圣现劣故也，明确肯定济公的修持，已达自觉、觉他之境界，当为佛门之菩萨。同时，禅师也对当时名学济公，实则败坏僧仪的行为作了严厉的批评、谴责，谓曰：

因中、果地二种行事，迥不相同。果地中人，示为污行，便显神通，貌混嶙夫，旋彰灵异，决不与痴暗愚夫同一颠倒而迷惑也。今以因中人冒果地相，不过狮虫狐种，败坏僧仪而已，何足为正人所齿录哉！近世有等魔禅，口说宗教，妄餐酒肉，以为吾学济颠也。此虽可学，而济颠来踪去迹，种种奇特能学否耶？济颠示梦太后，口吐金佛，乃至触境逢缘，现种种神通三昧，能学否耶？济颠锦绣蟠胸，出口珠玉，尽大地儒释，皆让一头地，能学否耶？此不能学，而徒学其餐酒食肉一种，真泥蛇学龙，必至全身败露，识法者惧矣。

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十月十八，翰林院侍讲梁同书的《宋道济和尚塔复向碣》，从佛具“菩提身、愿身、化身、住持身、庄严身、势力身、如意身、福德身、智身、法身”的理论高度，品评济公“常住不坏，是谓法身；五通十力，是谓报身；石塔无缝，藏此色身；后

事因缘，莫非化身；常寂光中，无相无身；游戏三昧，现自在身。颠师颠师，圆满十身。”亦认为济公的修持已是自觉、觉他、觉行圆满，无愧当为禅门一佛。释守一的《佛祖正宗道影》，列济公为“土圣僧”。近现代著名佛教大师虚云和尚、西传先驱宣化上人的《增订佛祖道影》《再增订佛祖道影》，考道济之法嗣记载，尊济公为禅宗第五十世佛祖，具体序列为：

释迦佛欲涅槃时传佛心印，西方初祖摩诃迦叶尊者→西方二祖阿难陀尊者→西方三祖商那和修尊者→西方四祖优婆鞠多尊者→西方五祖提多迦尊者→西方六祖弥遮迦尊者→西方七祖婆须蜜尊者→西方八祖佛陀难提尊者→西方九祖伏驮蜜多尊者→西方十祖胁尊者→西方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西方十二祖马鸣大士尊者→西方十三祖迦毗摩罗尊者→西方十四祖龙树菩萨→西方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西方十六祖罗喉罗多尊者→西方十七祖僧伽难提尊者→西方十八祖伽耶舍多尊者→西方十九祖鸠摩罗多尊者→西方二十祖闍夜多尊者→西方二十一祖婆修盘头尊者→西方二十二祖摩拏罗尊者→西方二十三祖鹤勒那尊者→西方二十四祖师子尊者→西方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尊者→西方二十六祖不如密多尊者→西方二十七祖般若多罗尊者→**西方二十八祖（东土初祖）** 菩提达摩祖师→西方二十九祖慧可大师（东土二祖）→西方三十祖僧璨大师（东土三祖）→西方三十一祖道信大师（东土四祖）→西方三十二祖弘忍大师（东土五祖）→西方三十三祖慧能大师（东土六祖）→西方三十四祖南岳怀让禅师（东土七祖）→西方三十五祖江西道一禅师（东土八祖）→西方三十六祖（东土九祖）南泉普愿禅师、百丈怀海禅师、大珠慧海禅师、鼓山灵峤禅师、鹤湖大义禅师→西方三十七祖（东土十祖）黄蘗希运禅师、赵州从念禅师、汾山灵佑禅师→西方三十八祖（东土十一祖）睦州道明禅师、临济义玄禅师、仰山慧寂禅师、灵树如敏禅师→西方三十九祖（东土十二祖）兴化存奖禅师、西塔光穆禅师→西方四十祖（东土十三祖）南院慧颙禅师、资福如宝禅师→西方四十一祖（东土十四祖）风穴延沼禅师、报慈德韶禅师→西方四十二祖（东土十五祖）首山省念禅师、三角志谦禅师→西方四十三祖（东土十六祖）汾阳善昭禅师、兴阳词锋禅师→西方四十四祖石霜楚圆禅师（东土十七祖）→西方四十五祖（东土十八祖）黄龙慧南禅师、杨岐方会禅师、龙湖普闻禅师→西方四十六祖白云守端禅师（东土十九祖）→西方四十七祖五祖法演禅师（东土二十祖）→西方四十八祖圆悟克勤禅师（东土二十一祖）→西方四十九祖（东土二十二祖）大慧宗杲禅师、虎丘绍隆禅师→西方五十祖（东土二十三祖）应庵昙华禅师、**济颠道济禅师**→西方五十一祖（东土二十四祖）蜜庵咸杰禅师→西方五十二祖（东土二十五祖）破庵祖先禅师……。

另考禅宗临济杨岐派法嗣，济公又为是派的第六世祖：

第一世杨岐方会禅师→第二世白云守端禅师→第三世五祖法演禅师→第四世昭觉克勤（圆悟克勤）禅师→第五世瞎堂慧远禅师→第六世**湖隐道济禅师**……。

1934年，西藏近代史上杰出的反帝爱国领袖，藏传佛教格鲁派大活佛，九世班禅额尔德尼·曲吉尼玛，明确佛教南岳世系为：

一世马祖道一禅师→二世百丈怀海禅师→三世黄蘗希运禅师→四世临济义玄禅师→五世兴化存奖禅师→六世南院慧颙禅师→七世风穴延沼禅师→八世首山省念禅师→九世汾阳善昭禅师→十世石霜楚圆禅师→十一世杨岐方会禅师→十二世白云守端禅师→十三世五祖法演禅师→十四世昭觉克勤（圆悟克勤）禅师→十五世灵隐慧远禅师→十六世**神功道济禅师**。

近现代印光大师之《文钞》也品评界定，“道济禅师乃大神通圣人，欲令一切人生正信

心，……凡佛、菩萨现身，若示同凡夫，唯以道德教化人，绝不显神通；若显神通，便不能在世间住，唯现作颠狂者，则显无妨。”再次肯定济公的佛门修持果位为佛、菩萨，且认为济公的修持功德已达“令一切人生正信心”的自觉觉他、觉行圆满的最高境界。

诚然，由于南宋释居简禅师的《湖隐方圆叟舍利铭·济颠》，在对济公的品评界定上，采用了实褒形贬的“春秋笔法”，与宋元时期释正受的《嘉泰普灯录》（1204）、释普济的《五灯会元》（1252）、释元敬的《武林西湖高僧事略》（1256）、释志磐的《佛祖统纪》（1271）、释念常的《佛祖历代通载》（1341），未曾入编济公及其相关事迹，与五祖弘忍付法衣于六祖慧能时有言：“衣为争端，止汝勿传”，及济公在办结师父瞎堂慧远丧事后，即出居灵隐，也有文献称“逐”“逐之”“唾骂笞逐”“寺不容住”等，以致一些学者在济公文化研究中，对六祖之后的禅门法嗣地位抱有疑问？进而提出所谓的济公为僧先前未被禅门认可，而是在其圆寂往生，并得修持果位界定后，方才回归禅门承续法嗣的“回归”之说，这一观点非常值得商榷。

因为，所谓之法嗣，指的是承继师祖（师父）的衣钵（袈裟、钵盂等法器），主持一方丛林，或者传承师祖思想、学问的高僧。考禅门法嗣建立之基本条件：一是为僧得官方（管理机构）的认可，请得度牒；二是相关寺院接纳，并剃度受戒；三是接续师祖衣钵，传承师祖思想、学问。禅门自六祖慧能之后“花开五叶”，发展为沩仰、临济、曹洞、云门、法眼五宗，具有“传佛心印”资格的弟子人数相对增多，不能再以师祖的法衣、钵盂等法器来作传承证明，并非六祖之后可以不再进行师祖的思想、学问的传承弘扬，及相关之“辈份”排序。而据明沈孟祥的《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清天花藏主人的《济颠大师醉菩提全传》，济公出家，既有官府发给度牒，又系高僧瞎堂慧远为师，巨刹剃度受戒，可谓申请审批、仪式议程一应俱全合规，且瞎堂圆寂往生，亦曾特别嘱托衣钵传予道济，下火也是济公亲为。再者，济公“参透远老葛藤，吞尽赵州荆棘”（全大同长老《入龕文》），“得灵隐寺远瞎堂之禅”（宣石桥长老《秉火文》），“冷泉参透瞎堂禅”（宁棘庵长老《入塔文》）。由此足见，济公作为禅宗第五十世佛祖、临济杨岐派第六世祖，南岳世系第十六祖，并为慧远的法嗣弟子，乃是历史镌刻，当之无愧，不可否定。所谓的“回归”之说，理由牵强，很难成立。否则，也就无法解释为何济公当世就得到佛教界和民众百姓的接纳、认可？为何圆寂能享受“奉敕”归葬，与“太尉朝官俱赴净慈，诸山宿德毕集会，送者千万人”（清释自融、性磊《南送元明禅林僧宝传》）的如此隆重的禅门礼仪？也无法解释济公寂后的修持果位界定，及禅门师祖排序。

至于宋元时期的《嘉泰普灯录》《五灯会元》《武林西湖高僧事略》《佛祖统纪》《佛祖历代通载》，没有入编济公及其相关事迹，析其原因，主要有三：

一是编纂避嫌。济公为僧，状类颠狂，喜酒忤戒。破庵祖先禅师称其，“出处行藏，一向漏逗。”运庵普岩禅师谓其，“狭路相逢捻鼻头，也是普州人送贼。”释居简禅师称其，“暑寒无完衣，予之，寻付酒家保。”天目文礼禅师也谓：“逻供得钱何处去，堂堂直上酒家楼。”元“无竞斋”亦称：“有时结茅晏坐荒山巅，有时长安市上酒家眠。”济公的颠狂忤戒行状无法为当时的佛门僧众所能普遍接受。作为济公师侄辈且同为杭州净慈寺僧的居简禅师，他撰写的《湖隐方圆叟舍利铭·济颠》，虽用心良苦，但也回避禅门通常的“师”“寂”之称，而以俗家的直呼，称济公为“叟”，谓其圆寂为“死”，称其“祝发受具”为“受辞”，足为一个明证。

二是事迹不详。济公为僧，二十五年在外徜徉山水，浮沉市井，信脚弘法，真正住灵隐寺未达六年，居净慈寺不足九年。由于济公居无定所，秉性又不喜推介自己，更无“树碑立传”之意念，故在当时的信息传递条件下，其具体的事迹功德，无法为灯录或者史传的编纂作者所能掌握、了解。诸如，释居简禅师曾住持台州般若院、报恩光孝寺（今临海龙兴寺），且又于济公圆寂前的嘉定二年（1209）春，到达天台，游赤城山时，见一岩石形状酷似济公面容，将其入录自己辑撰的《释签岩记》，称之为“书记岩”，应该对济公的情况比较了解，但他专门为济公所作的《湖隐方圆叟舍利铭·济颠》，也没有济公的出生、出家年份记载；再如，前述济公的“巨川”俗名，及其所作的《酹江月·游江心》一词，虽在清康熙年间已被发现，入录释元奇的《江心志》，但也没有广泛流传，而为后期的济公僧传创作、编撰所采用。

三是僧职低下。大凡佛教寺院，住持和尚之下，都有东西两序职事之设。其中，东序职事为实职（列职），按次分为都监、监院、副寺、维那、增值、知客、衣钵、汤药、悦众、寮元、管堂、库头、钟头、殿主、夜巡、门头、香灯、司水等职；西序职事为虚职（序职），按次分为座元、首座、西堂、后堂、堂主、书记、藏主、知藏、参头、烧香、记录等职。考济公为僧，仅在1201年往依净慈寺德辉长老后任西序“书记”，卑微的僧职地位，在潜意识上很难使济公入住，或者挂单、驻锡寺院主动向编纂作者推荐、介绍，并使其产生视觉、听觉的冲击，进而予以主动深入的考究调研，并进行相关的素材收集，予以辑撰入录。

不过，济公没有入编上述僧传、灯录，丝毫无损其形象光辉。除前已列举的以外，自宋及明，还有南宋天台籍宰相贾似道的《促织经》，释法宏、道谦的《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又名《禅宗杂毒海》），祝穆的《古今事文类聚》、林洪的《山家清供》，释法应、释普会的《禅宗颂古联珠通集》；元释熙仲的《历朝释氏资鉴》、释行端的《跋名公贴》、孟宗宝的《洞宵诗集》，明顾清的《正德松江府志》，聂心汤、虞淳熙的《万历钱塘县志》，释居顶的《续传灯录》、南石文琇的《五灯会元补遗》，释道忞、吴侗的《禅灯世谱》，冯梦龙的《济颠罗汉净慈显圣记》、沈周的《石田翁客座新闻》、郎瑛的《七修类稿》、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余》、徐象梅的《两浙名贤录》、释明河的《补续高僧传》、陈仁锡的《无梦园初集》、张岱的《西湖梦寻》等著，皆有济公的济世事迹、灵异神通记载，或有济公的诗作、文输入录。随济公信仰的影响陡增，相关的济公僧传，不但国内流布频繁，而且还被国外收藏，或被翻译成外文传播。诸如，日本的相关文库、文化研究所、图书馆（寮）等，就收藏了明《济颠语录》、清《醉菩提》《济公传》系列；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收藏了《足本济公全传》（二百八十回，清王梦吉撰，世界书局）、《绣像绘图通俗小说·济公活佛》（二百八十回，香港长兴书局）。且自南宋至元及明，在陈德武的《马头调·醉打山门》中，就有颂唱济公的曲词入戏，又有孔学诗、无名氏以济公“疯僧扫秦”为内容的《东窗事犯》《东窗记》剧目问世，还有姚牧良（也有称系“无名氏”所为）在《东窗事犯》《东窗记》基础上改编的《精忠记》献演，剧本的思想性更为加强。济公于民众百姓间的影响，诚如民国时期再版《足本济公全传》的《济公传考》所谓：“这济公……成为一个中心人物，各处都设有济公坛，供奉得甚是虔诚。不论在哪个社会中，提起这济公的大名，真是谁人不知，哪个不晓，连上海大世界四楼共和台也有济公坛。”上世纪80年代，浙江桐乡乌镇敬元潘恒的《济公全传·原版序言》亦云：“至今江南太湖流域一带，尤其是杭县附近，一提起济公活佛和雷鸣、陈亮，正像三国里的诸葛，水浒里的宋江……津津乐道。”

③在道，济天尊、仙真。元“无竞斋”的《湖隐上人赞》谓济公：“非俗非僧，非凡非仙，打破荆棘林，透过金刚圈。……赞叹不尽，而说偈言。呜乎！此其所以为济颠者耶。”所谓之“非俗非僧，非凡非仙”，意即亦俗亦僧，亦凡亦仙。“打破荆棘林”，讲的是佛道两家皆认为，人生在世时时刻刻都像处于荆棘丛林之中，处处暗藏危险或者诱惑，痛苦绕身；只有不动妄心，不存妄想，才能将其“打破”，从而使自己的行动无偏无颇，有效地规避风险，抵制诱惑。金刚圈者，又名金刚琢，是为佛道二教之法器也。禅宗讲顿悟，对手机锋无答，就用金刚圈敲击其脑袋，故而素有“秉拂、上堂，铁酸馅、金刚圈，塞断咽喉，拽脱鼻孔”之说；道家称金钢圈是太上老君的随身法器之一，也是老君化身老子西出函谷关所带的防身之物，可以变化，水火不侵，能击万物，套取各种法宝，妙用无穷。“无竞斋”以“非俗非僧，非凡非仙，打破荆棘林，透过金刚圈”作比喻，潜在是指济公已心如止水，敌胜惊群，大彻大悟。《诸真宝诰》亦谓济公，“功高东土，果证西天，灵由罗汉而进菩提。修空五蕴，断尽六根僧中称圣；玄功绝伦，道自先天而传后世。弃李门之富贵，卫宋室之江山。道伏天魔外道，禅参玉版金刚。百衲袈裟清风满袖，双拖草履道气盈身。抱慈悲而济困，行方便而扶危，神州大地留圣迹，天台山上话禅机。挥鸾阐教，普度群灵，法轮常转，广布慈云。大悲大愿，至仁至德，妙法度世，古佛天尊。”江苏如皋灵威观、句容茅山道观、苏州玄妙观等历以济公为“度世天尊”奉祀。明代及清的《历代神仙通鉴》，亦将济公与道教南宗五祖白玉蟾同节合传，前述龙庆峡神仙院则素祀济公为“下八洞神仙”。

3. 济公的灵异神通。灵异，是人类对未知神秘现象的一种统称，亦即某种现象的确存在或者事实发生了，但现有的科学知识尚不能说明，或者解释不通的情况。“神通”本为道家用语，《庄子·人间世》曰：“夫耳目内通，而外于心知，鬼神将来舍，而况人乎？”传至西域、印度后，为佛家所采用。《华严大疏三》谓：“作用自在无碍，谓之通。佛、神仙、菩萨、外道之所得者也，即通力、神通等是也。”佛门素有“六神通”之说，即天眼通，是指修得与色界天人同等的眼根，有了天眼通的人，不论远近内外、白昼黑夜，都能看得见；天耳通，是指修得与色界天人同等的耳根，有了天耳通的人，一切声音都可听到；他心通，是指能够知道他人的一切心想，有了他心通的人，便不愁遭受他人的暗算；宿命通，是指能够知道自己或者其它众生在六道（三善道——天道、人道、罗汉道，三恶道——畜生道、饿鬼道、地狱道）之中的过去生死，有了宿命通的人，过去前生之事，都能回忆，了若指掌；如意通（又名神境通、神足通），有了如意通的人，凡事都能随心所欲；漏尽通，是指断尽见思惑（见惑与思惑的并称，前者迷于推度三世道理之烦恼，后者迷于现在事理之烦恼），不受三界生死，而得漏尽神通之力。

道家也有六神通、十智神通之说。六神通者，一谓目通，能彻视洞达，坐见十方，天上地下，无有障蔽，六合（东、西、南、北与上、下）内外，鬼神人物，幽显大小，莫不了然分明，如视掌中；二曰耳通，能洞听天上地下，四面八方，一切音声，无不悉闻，人天禽兽，喧飞蠢动，一切众声晓了分明；三谓鼻通，能晓百和宝香，分辨气数浓薄差失、纤毫必记，四方上下，异域绝境，香臭之气，闻如面前；四曰舌通，万品众物，合为一食，经舌悉知种类，分别其味；五谓身通，能飞行上下，履冰涉水，经山触石，无望碍，分形散体，千变万化，形长充于八极，短入于毫微；六曰心通，迥一切法，皆悉空净。十智神通者，一谓善知他心智神通，二曰无碍清净天眼智神通，三谓宿住随念智神通，四曰知尽未来际劫智神通，五谓无碍清净天耳智神通，六曰无体性智神通，七谓善分离一切众生言音智神通，八

曰诞生无量色身智神通，九谓一切法智神通，十曰入所有法灭尽智神通。

佛教传入中国后，佛祖与诸大声闻弟子的神通行为，在禅门经典中也是屡见不鲜。《高僧传》神异科类，收录了佛图澄等二十神僧之传；宋《太平广记》，也有神行、分身、预鉴、尸解、驻颜、死而不亡、解梦、神力、祈雨、灭火、送子、治病和念咒等的佛门灵异神通记载；明成祖御制的《神僧传》，收录了竺摩腾、竺法、佛图澄等二百零八人的神通感应事迹。当代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色达喇荣寺五明佛学院，大堪布索达吉的《佛教科学论》（1999）也谓，佛教的说法尽管与现代科学不太相同，但它同样可以解释诸如日蚀、月蚀、地动、潮汐、寒暑、昼夜等现象，佛经所讲的须弥山有些众生不一定能看到，但有很多高僧大德，如无垢光尊者（1308~1363，藏传佛教大师）就曾亲眼见到过。不过，佛祖素来不允许弟子于世间使用神通，前已述说的宾头卢罗汉因显神通于世，佛祖不许其入于涅槃，而为末法之人作福田，及唐隐峰禅师显神通后，虑成惑众，即于金刚窟前倒立而化就是列证。

济公才智超群，尊隆佛祖，崇敬天尊，以“疯颠”隐掩盖世神功，一石二鸟，既合理规避了佛祖的法旨规定，又达到弘扬正法，普度众生之目的。相关文献史料对济公灵异神通的记载，大略有八：

①寂后上偈、募疏。元释熙仲的《历朝释氏资鉴》，明释大壑的《南屏净慈寺志》、释传灯的《天台山方外志》、陈仁锡的《无梦园初集》、沈孟样的《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与清释际祥的《净慈寺志》、聂先的《续指月录》、天花藏主人的《济颠大师醉菩提全传》，释自融、性磊的《南宋元明禅林僧宝传》，及近现代丁福保的《佛学大辞典》、喻长霖的《民国台州府志》等著谓，济公寂后，有二行脚僧遇济公于杭州六和塔，公授书一封，鞋一双，倩寄净慈寺妙崧长老；崧启之大骇，济终时无鞋，此老僧与济鞋，茶毗矣，而独不坏耶？数日后，复有钱塘邑役自天台回，济公又寄诗妙崧长老。又后五十年，有范村人送木料于净慈寺，言称是济公近为寺庙修葺所化。

②火化蟋蟀现青衣童子。南宋贾似道的《促织经》、明释大壑的《南屏净慈寺志》，与清释际祥的《净慈寺志》等著谓，济公火化蟋蟀毕，把灰向湖中一丢，一阵清风过处，现出一个青衣童子，向济公合掌当胸，曰：“感谢我师点化，弟子已得超升。”言讫，风息不见。

③重新藏殿，梦感太后。明释大壑的《南屏净慈寺志》，与清李卫、嵇曾筠的《浙江通志》，释际祥的《净慈寺志》等著谓，净慈寺尝欲重新藏殿，济公梦感皇太后，临赐帑金。

④募化建寺、古井运木。明吴之鲸的《武林梵志》、释大壑的《南屏净慈寺志》，清释际祥的《净慈寺志》，释自融、性磊的《南宋元明禅林僧宝传》，及近现代臧励和的《中国人名大辞典》、丁福保的《佛学大辞典》，释慈怡、释星云的《佛光大辞典》等著谓，嘉泰四年（1204），净慈寺火毁，济公自为募疏，行化严陵（今浙江桐庐一带），以袈裟笼罩诸山，木自拔，浮江而出，归报寺众曰：木至江头矣。寺将集众搬运，公曰：无庸也。见香积井中，六丈夫勾之而出。监寺欲酬之钱，辞曰：我六甲神，岂受汝酬乎？遂御风而去。故事中的袈裟罩山、古井运木，是乃佛家神通的表现，而六甲神，即甲子神王文卿、甲戌神展子江、甲申神扈文长、甲午神伟玉卿，甲辰神孟非卿、甲寅神明文章搬运却是道家之事。

⑤无尾螺、半焦鱼放生。明黄汝亨的《永兴寺碑记》、释大壑的《南屏净慈寺志》，与清李卫、嵇曾筠的《浙江通志》，释际祥的《净慈寺志》、沈镕彪的《续修云林寺志》，及近现代臧励和的《中国人名大辞典》，释慈怡、释星云的《佛光大辞典》等著谓，济公放生无尾螺、半焦鱼，皆活。

⑥救护黄生、挪移死尸。明释大壑的《南屏净慈寺志》、清释际祥的《净慈寺志》等著谓，一日骤雨忽至，邑人黄生者，趋避寺中，济公预知其当击死。呼匿坐下，衣履之。雷绕坐下不得，遂击道旁古松而已；杭州九里松酒肆之门，有死人，主人大惧，济公以咒驱其尸，忽奔至岭下而毙。

⑦醉酒贴金、死鸽复生。明沈孟祥的《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清天花藏主人的《济颠大师醉菩提全传》等著谓，济公酒醉呕吐能替佛像装金，又能将食后的熟鸽吐出，展翅飞翔离去。

⑧化钟预言。明沈周的《石田翁客座新闻》、冯梦龙辑编的《济颠罗汉净慈寺显圣记》等著谓，尼僧化钟，请济公作疏云：“师姑铸钟，有铁无铜；若要铸钟，连耸世松。”逾年果有木商王连耸、张世松随喜到尼庵，见钟破，问尼何不重铸？并索济公之疏观之，乐施以成。

从上可见，济公的灵异神通，自古受高僧大德、圣贤仙道的尊隆敬信，在济公信仰的起源、发展、巩固、弘扬上，作用不可小觑。吾辈凡夫，当生敬信，端不可无乱揣度，诋毁活佛。近现代印光大师的《济公禅师像赞》，亦称颂济公神通曰：

为启众生真正信，故显种种大神通；
不藉疯颠掩众目，何能常住振聩聋。

所以说，南宋时代特殊的社会因素、文化因素，培育造就了济公这一特殊的人物。而自济公信仰的诞生，走出天台山的李修缘，终于闻名于世，功德圆满，成为民众的希冀期盼，百姓的崇拜偶像，一介颠僧道济也终于由人变神，登极寺庙、宫观、堂坛、阁社，受祭香火，二者合一的济公终于成圣成佛成仙，受到儒释道三教的共同景仰和民众百姓、传法弟子、信徒信众的顶礼膜拜。

诚然，济公信仰的产生，与济公的显赫世系、晶莹舍利，传说催化等的铺垫映衬，亦是不能分开。

1. 济公的显赫世系。考江西南城上唐李氏族谱，有清道光十四年（1834）“**爰照旧本刊刷**”，朱翰林孔阳公辑撰的《李氏族谱旧序》，载曰：“江西诸李，大约多滕王苗裔，简牒可稽。夫李氏之先，或曰理官，或曰聃，其世次不可得，而系唐兴滕王元婴迁洪州都督，坐谪置滁州、寿州刺史，再徙隆州，武后时进开府仪同三司、梁州都督；薨，修琦嗣，世分族盱江（古称“汝水”，位江西第二大河抚河之上游）江右，始有陇西李氏。”清钦赐进士，前任浙江舶市司提举，擢按察使佾事，转提督浙江学校花润生所撰的《李氏族谱源流序》，亦谓“滕王元婴者，唐高祖幼子也，出镇南昌洪州都督，建阁洪都西城漳江门外，李姓蕃于江右，自兹始。”并《李嘉猷公支谱》《水坑尾堡李氏族谱》之所载，唐宋以来济公李氏世系显赫，历代人物大略如下：

一世祖李渊（566~635），字叔德，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人，祖籍邢州尧山（今河北邢台）。出身北周贵族，七岁袭封唐国公；隋大业十一年（615），任山西河东慰抚大使；十三年（617），任太原留守。隋末天下大乱，乘势从太原起兵，攻占长安（今陕西西安）。义宁二年（618），接受其所立的隋恭帝的“禅让”，称帝建唐，定都长安，逐步消灭各地割据势力，统一全国。武德九年（626）玄武门之变（太子建成和元吉等企图杀秦王世民，秦王先下手在玄武门除掉两人）后，禅位世民（唐太宗），退位称太上皇。驾崩，葬陕西三原徐木之献陵，谥“太武皇帝”，庙号“高祖”。皇后窦氏，妃嫔柳保林等，子二十

二，保林生第二十二子元婴。

二世祖李元婴（630~684），唐太宗贞观十三年（639）封滕王，工书画，妙音律，喜蝴蝶，艺术造诣颇深，聪颖过人，在兄建成、世民的皇位争夺漩涡中采“韬晦之计”，先后驻滕州（今山东滕州）、洪州（今江西南昌）、隆州（今四川阆中），并于三处建滕王阁。永淳二年、弘道元年，即公元683年，调任梁州都督，未及赴任告病，次年薨，陪葬献陵。子十八（其中六个被武则天害死），第十一子修斑。

三世祖李修斑，生于唐高宗显庆五年（660），字崇礼，夫人吴氏、王氏，子九，吴氏生次子怀义。

四世祖李怀义，生于唐高宗宏道元年（683），官浑州（今陕西安塞王窑一带）刺史、朝议大夫，赘抚州东隅（今江西抚州）谏议大夫毛家，夫人毛氏，子八，第八子环。

五世祖李环（750~837），字玉甫，官通议大夫，赘宜黄（今江西宜黄）潘尚书家，夫人潘慈政，子四，武、威、成、戚。

六世祖李威，生于唐代宗大历八年（774），字绪烈，诰赠工部尚书、太子少师，赘建昌南城（今江西南城）傅家，夫人傅贞静，子四，信、习、适、逸。卒，“葬本里上堡老山岭下右垧上坤山艮向西边”，贞静夫人“葬二十五都锄源汉王庙对岸戴家窠□（左“土”右“回”）上兑山卯向，狮子抱球形。”至于缘何夫妻分葬？详待考。

七世祖李适，字寄亭，官深州真定（今河北正定）知府，调守潞州（今山西长治），占籍上党，自麻畚分居，遂世为上党李氏。卒，“葬二十二都下塘源”。夫人吴氏，子三，仁让、仁允、仁顺。

八世祖李仁让，生于唐宣宗大中四年（850），夫人吴氏，子二，守心、守性。

九世祖李守心，生于唐僖宗光启二年（886），字守则，因祖仕潞州遂居，诰赠右丞相、太子太师，夫人王氏（另说章氏），子二，仲耘（云）、处耘（仲雷）。

十世祖李仲耘，官潞州、真定知府，诰赠右丞相、太子太师，夫人吴氏（另说黄氏），子三，昭、昉、映，次侄女为宋太宗赵昫明德皇后。^[5]

十一世李映（924~988），又名崇矩，字明矩，又守则，初仕后汉、后周，北宋新立，随太祖赵匡胤讨伐李筠、李重进有功，乾德二年（964），拜枢密使。开宝年间（968~976），出为镇国军节度，入为左卫大将军。太平兴国二年（977），出为邕、贵、浔、宾、横、钦六州都巡检使，移琼、崖、儋、万四州都巡检使，还京拜右千牛卫上将军。雍熙三年（986），擢判右金吾街仗兼六军司事。赠太尉，尚书令兼中书令，敕封“陇西元靖王”^[6]。薨，葬山西长治荫城李坊村，谥“元靖”。《宋史》列传，子继昌。

十二世李继昌（948~1019），字世长，年轻时宋太祖赵匡胤欲招其为驸马，为他与父亲李崇矩所婉拒，历都巡检使、左神武军大将军、判右金吾街仗，赠太师，封“楚国公”^[7]。《宋史》列传，子三，遵勛、存勛、文旦。

十三世李遵勛（988~1038，另说名遵勉）^[8]，字公武，进士及第，尚宋太宗赵昫七女万寿长公主^[9]。历官龙武将军、驸马都尉等，赐第汴京（今河南开封）景龙门北“永宁里”，封邑浙江天台、临海；赠尚书令兼中书令。卒，葬河南开封祥符土柏岗乡岗西村之神岗，谥“文和”。《宋史》列传，子四，盛、荣、华、茂。

十四世李茂（？~1092），又名端恣，字守道，历任左藏库使，知邢、冀、卫三州，蔡州观察使、安德军留后、资州刺史等，仁宗帝独赐珠花、飞白字（一种特殊的书法笔法，笔

划呈枯丝平行，产生“飞白”，转折处笔划突出，枯笔与浓墨、涨墨产生对比，增强了作品的韵律与节奏感），宠顾特异；元丰年间（1078~1085）以策论上呈，神宗帝誉“近世之贤戚也”，卒赠昭德军节度使，谥“恭敏”。《宋史》列传，子四，鼎、升、显、景。

十五世李升（梓），字帮，承议郎，赠通议大夫，子二，涓、傅。

十六世李涓（1074~1126），字浩然，知鄂州崇阳县（今湖北崇阳），靖康元年勤王抗金，沙场殉国，谥“忠节”。子三，景逖、景迈、景通。

《宋史·李涓传》载：^[10]

李涓，字浩然，驸马都尉遵勳曾孙也。以荫为殿直，召试中书，易文阶，至通直郎，知鄂州崇阳县。靖康元年，京城被围，羽檄召天下兵。鄂部县七，当发二千九百人，皆未集，涓独以所募六百，锐然请行。或谓：“盍徐之，以须他邑。”涓曰：“事急矣，当持一信报天子，为东南倡。”而募士多市人，不能军，涓出家钱买牛酒激犒之。令曰：“吾固知无益，然世受国恩，唯直死耳。若曹知法乎，失将者死，钧之一死，死国留名，男儿不朽事也。”众皆泣。即日，引而东，北过淮，蒲圻、嘉鱼二县之兵始至，合而前。至蔡，天大雪，蔡人忽噪而奔，曰：“敌至矣”，即结阵以待。少焉，游骑果集，涓驰马先犯其锋，下皆步卒，蒙鹵盾径进，颇杀其骑，且走。涓乘胜追北十余里，大与敌遇，飞矢猬集，二县兵亟舍去。涓创甚，犹血战，大呼叱左右负己，遂死焉，年五十三。士卒死者六七。上官有忌涓者，劾亡卒诬已遁。明年，金兵去，蔡人以其尸归。朝廷录其忠，赠朝奉郎，官其三子。

十七世李景逖，荫封通直郎，品秩正八品^[11]，随宋室南迁，后辞官隐居天台城北永宁村，夫人王氏封号孺人，子修缘。

十八世李修缘，即济公，字巨川，出家天台山国清寺，剃度杭州灵隐寺，师父瞎堂慧远赐名“道济”，时人谓之湖隐（渔隐）、方圆叟、济颠、颠僧、狂僧、月引流光等。1201年住锡净慈寺，1209年圆寂是寺，阇维舍利敕葬虎跑。

在济公李氏世系人物中，先祖李渊，为人崇道，逝后追封神尧皇帝（上元元年〔674〕八月）、神尧大圣大光孝皇帝（天宝十三年〔754〕二月）。太祖李崇矩崇尚佛教，同时“又喜黄白术，自远迎其人，馆于家以师之，虽知其诈，犹以为神仙，试已终无悔恨。”天祖李遵勳精通佛学，曾与和尚楚园共撰《偈颂》，并撰《天圣广灯录》，献于仁宗帝赵祯，今存《中华大藏经》。父亲李景逖府居天台后，崇佛敬道，家设佛堂，虔诚礼拜，每逢岁末必举行“祭天”典仪，而无一事隐瞒上苍。祖上的崇敬佛道家风，与济公的成长，及济公年少居三教圣地赤城山自学攻读，受佛光洗礼、仙风熏染，出家为僧后，定型为既崇佛又弘道，两者圆融发展，于佛于道皆成正果，也是具有内在的联系、影响。

2. 济公的晶莹舍利。舍利是梵语的音译，是印度人死后身体的总称。在佛教，通常以僧人圆寂后遗留的头发、骨骼、骨灰等，称之舍利，以火化后产生的结晶体，称舍利子或坚固子。明镛绩的《霏雪录》以佛之遗骨通名舍利。郎瑛的《七修类稿》引《福田大论》谓，碎骨是生身舍利，经卷是法身舍利，又曰白色者骨舍利，黑色者发舍利，赤色者肉舍利，菩萨、罗汉皆有，佛舍利锤击不碎，弟子舍利锤即碎也；引《龙舒心经》云，舍利乃以佛弟子舍利弗出生时眼似舍利鸟而名之，是为释家修真炼摄的心精气所结，如石中之水晶，水中之膏液，仙家之圣胎尔，与生前的修持功德密切相关，非佛、菩萨、罗汉、高僧大德不能有之，故视舍利子为神圣之物，十分稀有、珍贵。北凉县无谶所译的佛陀最后遗教《大般涅槃经》谓：“若见如来舍利，即是见佛”“供养舍利即是佛宝，见佛即见法身”。唐义净法师所译的《金

光明最胜王经》云，舍利是戒定慧所熏修，甚难得也。民间则流传，人久离淫欲，禁用荤辛，则精髓充满，寂后焚化就会有坚固的舍利子出现。近现代印光大师认为，舍利子是修行人的戒定慧道力所成，是心和佛相合的表相；印顺法师也称，舍利子是血肉精髓骨脂火化凝结，佛弟子尊重舍利子，是尊重高僧大德的慈悲、智慧，善行、功德。舍利崇拜，佛教史来已久，东晋高僧法显，唐代玄奘、义净法师等，都留下大量的有关印度佛舍利信仰的资料。其中，法显的《佛国记》，还详尽地记载了那竭国佛顶骨舍利的朝拜盛况，道荣、惠生、玄奘等也先后瞻仰此舍利。

南宋释居简禅师的《湖隐方圆叟舍利铭·济颠》开篇载：“舍利凡一善有常者咸有焉。……都人以湖隐方圆叟舍利晶莹而耸观听。”是处的“湖隐方圆叟”，为“湖隐”“方圆叟”的连称，即济公；所谓的“一善有常者”，唐玄奘法师所译的《大乘百法明门论》云：“一信、二精进、三惭、四愧、五无贪、六无嗔、七无痴、八轻安、九不放逸、十行舍、十一不害。”济公的“舍利晶莹而耸观听”，自然与其平生的显著事迹、聪慧才华、显赫世系等扯上联系，进而也就在一般的尊敬、崇拜的基础上，升华为一种信仰。

3. 济公传说的催化。济公传说是乃民众百姓出于对济公的济世功德、修持果位、灵异神通，及其显赫世系、晶莹舍利等的景仰、崇拜，进而创作的一种藉以表达价值理想、反映评价的言语叙述，内容有的是真实的济公人物、故事，有的是以济公人物、故事为原型、基础，经嫁接拼凑，放大神化，有的情节虽属虚构，但通过塑造的济公人物、故事，反映了民众百姓的精神渴望，为济公文化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济公传说在流传发展过程中，有的演变为话本、小说、书画、雕塑（镌刻）等的素材、题材，从而有了文字、纸质、实体等的形态，有的仍然是传统朴素，原生态的口耳相传。比较济公信仰，济公传说的创作修改、完善发展，灵活随机，情节更为突兀绚丽，戏谑浪漫，与济公信仰相辅相成，交替绽放不息。1957年4月27日，周恩来总理陪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元帅，瞻仰杭州虎跑济公灵塔时，对伏老如是说：“这里埋着济公的骨灰。人民很喜欢济公，他关心人，为不公平的事打抱不平，在民间流传着许多关于济公的美丽传说。”

而从可考的文献史料看，济公传说在宋元时期就有文字记载。如前已述说的南宋贾似道《促织经》的济公火化促织后的青衣童子示现，与元释熙仲《历朝释氏资鉴》的济公寂后上偈云：“脚绷高打兴无穷，拄杖挑云入乱峰；有问山僧何处去，天台南岳旧家风。”释行端《跋名公贴》称济公的“灵迹甚异”，及明郎瑛《七修类稿》的“济颠乃圣僧，宋时累显圣于吾杭湖山间，至今相传之事甚众，有传记一本流于世。”足以说明，这一时期济公传说已经基本确立，影响逐步扩大。

明末及清，济公传说大盛，主要有：徐人瑞、程瑶初稿，徐道、程毓奇续成的《历代神仙通鉴》，香婴居士王梦吉的《新镌绣像龛头陀济颠全传》，天花藏主人的《济颠大师醉菩提全传》，季春金陵旅寓枫亭王宣、西湖渔樵主人的《济公传》，古吴墨浪子的《西湖佳话·南屏醉迹》、陈树基的《西湖拾遗·南屏山道济装疯》、张岱的《西湖梦寻》、郭小亭的《评演济公传》，葛啸侬、坑余生的《续济公传》等。显见，这一时期的济公传说已经广为传播，深入人心。

民国至新中国成立前后，济公传说故事不断在书场、舞台演出，根据不同底本石印或者铅印的济公话本、小说到处流传；及后，大陆内地的济公信仰一度中止，基本没有再版济公话本、小说，济公故事也不可能再在书场、舞台演出。直至“文革”结束，随宗教信仰

自由政策的贯彻、落实，与济公信仰的逐步恢复，据各种旧版重新排印的济公僧传系列，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济公传说塑造的济公，人物真实、本土原生，三教圆融、形象鲜明，神奇浪漫、想象奇特，情节曲折、感情直露，诗文并举、妙语如珠，流布广泛、影响深远，在民间文学中风貌独具，自成一格。通过济公传说的传颂，济公的慈悲仁慈、抑恶扬善形象更加丰满、完美，成功地推及道济成为“流民队伍中的理想的英俊士，是中国佛教里面的智慧化身——和尚中的阿凡提，也是时至今日同情流民遭受苦难的人们所敬佩的豪杰”（现代陈伟君《济公外传·后记》）。

至于目前辞书、史志、灯录（道影、仙谱）、传记（笔记）、语录（诗偈）、小说（传说）、绘画、雕塑（镌刻）等到底记载了多少济公传说？仅从曹志天、赵达枢搜集于济公故里天台山的《济公传说·济公童年少年故事》，就有济公出世、济公对课、拜师羞学台、无石岙、三眼塘、巧治怪病、泼水救古寺、三个铜钲、三难吹牛大王、饺饼筒的来历、挂羊头卖狗肉、小知府上任、好事好字、祸出东门庵、济公卖布、乌龟桧、破铜钱、济公尊称的来由、破芭蕉扇和旧蒲草鞋、济公帽的来由、济公当帽、金盘和枫树头山、牛生麒麟、陆遂求才、棒打寿联飞、拳打死尸、草绳变蛇、难题规劝不肖徒、广济村、审石柱、游走、伏蟹精、学医、盐落酱缸、兄弟葬母、痛改前非、怕痒树、送水瑞霞洞、吹起一头牛、争田沟、翻碗、四两韭、镰刀锯大树、巧编草灰绳、该当何罪、猪掉粪池、梨树饭锹柄、太湖石、心远香、修缘出家、出家当和尚、夜捉飞天鼠、弃新衣、木鱼柄、木鱼山和利济桥、呈诗护松、蟋蟀还魂救小僧、五味粥、竹篮打水、智擒盗宝贼、变牛谢老农、三斗鲤鱼精、济公上吊、计斗恶嫂、杨文祥、捉鬼、施安桥、济公坐屋梁的来历、济公两面像的来历、赤城山上伏蛇妖、慧眼识火神、济公化树、济公化缘、诗动王安抚、怒惩恶棍救少女、济公平潮、一叶知大小、傀系堂、赠柱、护城河的来历、背妇孺、铰刀兵、死无葬身之地、巧救剃头匠、题诗骂秦桧、得好休时便好休、鹰吭鸟、显圣救挑夫、令人常爱赤城晖等近九十则之多，如再加上济公灵隐祝发、净慈住锡、虎跑塔葬，二十五年“信脚天下”，大陆各地几乎都有济公传说流布，且已传播至台港澳地区，并迈出国门，走向海外，客观上无法用简单的数字作出统计。诚然，联系济公其人、其言行、其诗文、其事迹、其功德，济公传说大体都是以济公的生平、思想、事迹、神通为主线，以同情百姓、关怀民生为中心，以匡扶正义、抑恶扬善为手段，以风趣诙谐、颠狂济世为基调，可以将其分为身世传说（罗汉转世、观音化身、弥勒转世、地藏应化、延寿后身等）、聪慧传说（祇园寺续句、对联学台等）、出家传说（逃婚出家、赴考出家、点化出家等）、慈悲传说（飞来峰、背妇孺等）、侠义传说（铁佛寺惩妖、嘲讽奸相、疯僧扫秦等）与神异传说六大类。

由此可见，济公传说是南宋以降八百多年来，形成与发展起来的一种比较特殊的文化现象，它以民族的文化意识、思维方式与想象力，成功地塑造了一位慈悲济世、无我利他、彰善瘅恶、扬弃创新的圣僧形象。从济公由凡人到罗汉（仙真）、菩萨（圣僧）、活佛（天尊）这一渐进累积过程中，教派宗教与小说（传说）交织一起，成为民众百姓与高僧（道）大德合力互动的产物。而就单个的济公传说而言，它主要是以南宋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为背景创作，印刻着明显的时代痕迹，对了解该时期各个方面的社会现象，探究当时的民风习俗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就济公传说的总体来看，它既是民众思想意识与精神智慧的反映结晶，表达了百姓对幸福生活的向往、追求，具有直接的社会效应。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发

掘传承、创新发展济公传说，开展济公信仰、济公文化交流，巨大作用不可低估。

【注释】

[1] 济公信仰产生于南宋时代，及济公为浙江天台永宁村人氏，尽管通过历史文献发掘，已经昭然若揭，并得学术界的普遍认可，但也不排除总有一些学者喜好“标新立异”，以所谓的南北朝时期的颠僧释宝志充代济公原型，进而否定济公这一历史人物的存在，以吸引读者眼球；其中不乏也有大张其词称“南宋以来各种各样的僧门著作都没有关于济公的记载”“真实世界的道济……大概除了喝酒以外，没有什么令人惊异的行为”，济公信仰“是极近期之事，大抵不超过一百年”。凡此等等，民国时期就有，诸如：

①蒋瑞藻的《花朝生笔记》称，“世传南宋有颠僧济公，备极神奇，……实则南宋初无是人，乃因六朝释宝志而讹传者也。”

②钱静方的《醉菩提院本考》谓，“醉菩提演南宋颠僧道济，……此实六朝时之南宋时人，而院本以为赵氏之南宋者，误也。……西湖诸禅林，伪造种种灵迹，以惑乡愚，实则济公乃志公之误，无其人也。”

及至当代，类似现象仍然频频出现：

①黄天骥的《评〈济公全传〉》称：“传说中的济公形象，虽以释宝志为原型，但又比原型生动得多、丰富得多。”

②汪启发的《济公的原型》谓，“济公即道济和尚，其原型为宝志，……他不是南宋人，而是南北朝的宋朝人。”

③诸葛文的《图说宋朝三百年·济公和尚的原型历史上存在吗》，先写了“在《辞源》上有关于他的介绍：‘济公，是宋代著名的僧人，生于天台县（今属浙江省），出身不详，俗姓李，名道济。’”接着又称，“由于正史没有记载，《辞源》上关于济公的资料是来源于明代人所写的《西湖游览志余》，而这本书属于野史一类，可信度比较低。而且最重要一点是，虽然是和尚，但是从南宋以来各种各样的僧门著作中都没有关于济公的记载。如此看来，济公这一人物是被杜撰出来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之认为，“济公的原型并不是宋朝的和尚，而是出生在南北朝时期的一位高僧和尚，曾历经宋、齐、梁三朝……经过千百年的流传演变，就发展成了现在的济公和尚。”

④周纯一的《济公形象之完成及其社会意义》谓，本我济公之面貌，只有南宋释居简《湖隐方圆叟舍利铭·济颠》的唯一孤证，“道济在南宋本一平凡之禅僧，虽娴熟书记，却不能在思想或禅行上有所贡献。唯其坐化，舍利如雨，使居简和尚为他写‘舍利铭’，形象与宗教影响十分微小，国人因喜爱、崇拜，进而信仰是极近期之事，大抵不超过一百年。”“真实世界的道济是个很正常的禅师，……大概除了喝酒以外，没有什么令人惊异的行为”。

对以上诸君之观点，诚请读者结合本文品之悟之，从而去伪存真作出鉴别，还济公一个本来面目。

[2] 济公父亲李景逖定居天台的时间，目前尚未发现有史籍、文献记载。常理分析，李乃先朝驸马、公主嫡后，与宋高宗有外戚亲缘，且出身将门世家，又为抗金英雄、烈士后代，并正当壮年，与金人有不共戴天之仇，朝廷荫封其“通直郎”一官，与烈士父亲李岷出任知县品秩同阶，可谓荣誉之极，因之不大可能会在南宋小朝动荡不安、四面楚歌、政局未稳的情况下，贸然提出辞官请求，并至天台隐居。诚然，考宋金战争态势，自建炎三年（1129）春，金兵奔袭扬州，高宗帝狼狈渡江，及以后的南逃经历，勉强也只有以下几个时间段可称“局面稍为安定”，故而推测李茂春于天台永宁建府定居的时间大概是：

较早可能为建炎四年（1130）夏，金兵撤离江南，居北扶持册立宋降臣刘豫建国“伪齐”，高宗帝驻蹕越州，至绍兴三年（1133）宋将李横起兵北伐前的这一时间段。

中则可能是绍兴四年（1134）五月，岳飞出师襄汉，收复六郡，九月韩世忠诱敌深入，大败金军，金兵北归，刘豫“伪齐”军暂停南侵，至绍兴六年（1136）十月，刘再征发三十万军分三路进攻两淮，宋“齐”战争再次爆发前的这一时间段。

稍晚可能为绍兴七年(1137)十一月,金废刘豫“伪齐”政权,宋金分治基本定格,至绍兴十年(1140),宋抗金战争重新打响前的这一时间段。

至迟可能是绍兴十年(1140),亦即在南宋抗金战争取得节节胜利之时,高宗帝、秦桧却下令各路北伐军班师,内心对高宗、秦桧的投降行径不满,郁愤辞官,再至天台建府定居。

[3] 济公《重建净慈寺疏》之流传版本有二:

①明释大壑《南屏净慈寺志》、沈孟样《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版本

伏以祝融作衅,照一万顷之平湖;风伯助威,卷五百间之大厦。烈焰星飞于远汉,嚣尘雾锁于层峦。各携云锡以随身,共驾牛车而出宅。向来金碧,并作烟煤。过门孰不惊心,闭眼犹疑是梦。切念阿罗汉不能冷坐,放起玉毫光;可怜调御师也被熬熬,失却金花座。虽经世数,未厌人情,钟鼓重警,发于虚空,香火复追,崇于先帝。毗耶城里从来大有檀那,给孤园中指日可成兰若。金刚不坏,铁塔证明。

②清天花藏主人《济颠大师醉菩提全传》版本

伏以大千世界,不闻尽变于沧桑;无量佛田,到底尚存于天地。虽祝融不道,肆一时之恶;风伯无知,助三昧之威。扫法相,还太虚,毁金碧,成焦土。遂令东土凡愚,不知西来微妙。断绝皈依路,岂独减湖上之十方;不开方便门,实已缺域中之一教。即人心有佛,不碍真修;而俗眼无珠,必须见像。是以重思积累,造宝塔于九层;再想修为,塑金身于丈六。况遗基尚在,非比开创之难;大众犹存,不费招寻之力。倘邀天之幸,自不日而成。然工兴土木,非布施金钱不可;力在布施,必如大檀越方成。故今下求众姓,盖思感动人心;上叩九阊,直欲叫通天耳。希一人发心,冀万民效力。财聚如恒河之沙,功成如法轮之转。则钟磬复震于虚空,香火重光于先帝。自此亿万千年,庄严不朽,如金刚天人,神鬼功德,记于铁塔。谨榜。

[4] 济公于杭州净慈寺走完了他的人生历程,肉身于西湖西南大慈山虎跑寺前茶毗,“涌出舍利八万四千,赞叹不尽”(元无竞斋《湖隐上人赞》),“邦人分舍利,藏于双岩之下”(南宋释居简《湖隐方圆叟舍利铭·济颠》)。嘉定二年(1209)八月,奉敕于大慈山置建灵塔以供。兹因活佛茶毗于此,俗又称是山为“涅槃山”。而随岁月流转,草交石泐,济公塔墓一度荒淹。乾隆元年(1736),善男邱文晋、善女王氏,钦佩济公之行谊,对济公塔墓重加修治,却误改塔扉旧向,识者惜焉。越二十余年,探花、东阁大学士梁诗正“购得其地,将营宅兆发土得浮图,考其年月,证以净慈寺志,知为公墓。”南屏住持明中,插草倡缘,得京师潭柘院主琮璋为之募资,遵古兆复定庚山甲向;举人、赐进士梁同书(梁诗正子)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十月十八,作《宋道济和尚塔复向碣》以志。同期又建“济公塔院”,旁置“藏殿”,后毁。光绪年间,虎跑寺僧法轮议兴复藏殿,富春恒济坛同人首捐百金,期年落成。民国十三年(1924),再改济公塔墓为五角式,上镌济公神异事迹,内容有“紫金异兆”“灵隐落发”“古井仙踪”“普度生灵”“归真遗迹”等。上世纪80年代,著名济公表演讲艺术家游本昌捐资加以修葺、扩建。现塔墓石刻浮雕长15.5米,高2.5米,内容由“济公斗蟋蟀”“飞来峰”“古木运井”“大闹秦相府”四则传说故事组成,立体济公像高3.4米。塔院供奉的济公,上悬匾额“护国佑民”,两旁楹联为:谁识如来面目不坏金身犹住世;是真菩萨心肠浑然铁舌尚留尘。左右配“李修缘慧根皈菩提,定慧寺释禅成正果”木雕。修葺扩建后的济公塔墓、塔院,为杭州西湖南山景区的重要朝觐、观光景点。

[5] 明德皇后,山西长治荫城李坊村人,生于宋建隆元年(960),系太祖赵匡胤从龙功臣李处耘的次女,像列昭勋阁二十四功臣之一的李继隆之妹。开宝八年(975)十二月十九,太祖纳其为皇弟赵昀(即后来之太宗帝)妃,太平兴国三年(978)七月入宫。雍熙元年(984)十二月,太宗颁《立陇西李氏为皇后制》,册封皇后。李后曾育皇子,不幸夭折。至道三年(997)三月太宗帝崩,皇后在复杂、紧张的继位争夺环境下,协调各派意见,使得真宗赵恒平稳登基,真宗帝尊皇后为“明德皇太后”。景德元年(1004)三月十五,太后崩,终年四十有五。明德皇后与济公活佛同出唐高祖李渊、滕王李元婴一脉,为济公太祖李崇矩之堂妹,论辈份当为济公的堂太祖姑。

[6] 《宋史·李崇矩传》载,崇矩“字守则”,而《李嘉猷公支谱》《水坑尾堡李氏族谱》皆称,崇矩祖父守心,其字亦“守则”,祖孙相来年代不远,缘何同一字号,存疑待考?此外,欧阳修的《镇潼军

节度观察留后李公墓志铭》称，崇矩封“陇西元靖王”；韩元吉的《南涧甲乙稿·太恭人李氏墓志铭》谓，崇矩“封河东王”；《李氏族谱旧序》也载，“崇矩即崇阳公，涓五世祖都尉公勛之王父也”；但《宋史·李崇矩传》《水坑尾堡李氏族谱》皆无李崇矩的封王记载，诸多文献介绍两宋时期敕封、追封的异姓王，亦无崇矩之名，存疑待考？

[7]《水坑尾堡李氏族谱》称，李继昌“封楚国公”，而《宋史·李继昌传》无载，存疑待考？

[8]元马端临的《文献通考》载：“宋太宗七女……齐国大长公主适李遵勛。”至于李遵勛缘何变成李遵勉，详待考？此外，《水坑尾堡李氏族谱》称，遵勛仕历“赠太师”，而《宋史·李遵勛传》《李氏族谱旧序》《源流序》，及欧阳修的《镇潼军节度观察留后李公墓志铭》皆载，遵勛“赠中书令”，或“赠尚书令兼中书令”，详待考？是处暂采“赠尚书令兼中书令”一说。再者，北宋文莹的《湘山野录》（卷下）谓：“都尉李文和公，性谦雅，虽累世勲忠尚天姻，而识学优赡。”晓莹仲温的《罗湖野录》（卷四）、程居简的《湖隐方圆叟舍利铭·济颠》，元释照仲的《历朝释氏资鉴》皆载，李遵勛即“文和”。清汪灏的《御定佩文斋广群芳谱》亦谓：“京师旧无鸭脚（银杏），驸马都尉李文和自南方来移植于私第，因而着子自后稍稍蕃多，不复以南方为贵。”《李嘉猷公支谱》也称，遵勛卒谥“文和”。而欧阳修的《李公墓志铭》与《宋史·李遵勛传》《李氏族谱旧序》《源流序》《水坑尾堡李氏族谱》却载，遵勛谥“和文”，详待考？是处暂采“文和”一说。

[9]宋太宗赵炅七女(988~1051)，至道三年(997)五月受封万寿长公主，大中祥符元年(1008)十二月改封隋国长公主，四年七月改封越国长公主。年六十有四薨，追封齐国大长公主，谥“献穆”。元符三年(1100)三月，改封荆国大长公主。政和四年(1114)十二月，宋徽宗依蔡京建议改公主为帝姬，故尔改封“献穆大长帝姬”。史载公主，善笔札，喜图史，能为歌诗，尤善女工，为太宗帝所特别宠爱，为人天性恬静、不喜奢华，孝老尊长、谨守妇道，慈悲为怀、菩萨心肠，诗书传家、教子有方。

[10]清黄以周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五十九）谓：“敌犯蔡州，知鄂州崇阳县李涓持兵入援，至城下与敌战。创甚，犹被血大呼，叱左右负己以战，遂遇害，士死什七”。

[11]济公圆寂往生360年后，明清话本、小说(传说)始出现济公父亲名“李茂春”“李赞善”“李华”，官拜“春坊赞善”“赞善大夫”“宰官”“京营节度使”等说，具体如明沈孟祥的《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1569)谓：“台州府天台县李茂春者，乃高宗朝李驸马之后，官拜春坊赞善。”冯梦龙辑编的《济颠罗汉净慈寺显圣记》云：“台州府天台县，有一人姓李名茂春，乃高宗朝李驸马之后，官拜春坊赞善。”明清徐人瑞、程瑶初稿，徐道、程毓奇续成的《历代神仙通鉴》，则称济公父亲名“李华”，官拜“赞善大夫”。清天花藏主人的《济颠大师醉菩提全传》载：“台州府天台县，有一位宰官，姓李名茂春，又名赞善，为人纯谨厚重，不贪荣利，做了几年官，就弃职归隐于家。”郭小亭的《评演济公传》谓，“在朝有一位京营节度使，姓李名茂春，原籍浙江台州府天台县人，娶妻王氏，夫妻好善。”香婴居士王梦吉的《新镌绣像鞠头陀济颠全传》亦云：“赞善大夫姓李名华，字曰茂春，乃先朝驸马之后，与孝宗有中表之称。”后来，李茂春急流勇退，称病辞官，隐居天台。

考龚延明《宋史职官志补正》，与俞鹿年《中国官制大辞典》等相关文献，所谓“春坊”者，乃魏晋以来太子宫所属的官署名称，唐改门下坊为左春坊，改典书坊为右春坊；“赞善”者，为春坊官署的左右赞善大夫职衔之简称。宋初延唐制，仍于春坊官署置设赞善大夫职，至元丰三年(1080)官制改革，“赞善大夫”与“太子中允、太子洗马”等改衔称“通直郎”。虽元丰改制时，济公祖父李涓只有七岁，父亲李景逖尚未出生，不过也不排除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即元丰改制后的“通直郎”官职，因其源于春坊官署之“赞善大夫”，官阶品秩较高(隋唐宋初通常为文官第十七阶，品秩为从六品至正五品上)，及元丰改制前，“通直郎”官职素与“赞善大夫”同阶同品，改制后降为文官第二十五阶，品秩正八品，同僚或者时人则惯以旧制嬉称“通直郎”为“赞善”“赞善大夫”，流传久之，也就附会产生了李景逖官拜“赞善”“春坊赞善”“赞善大夫”“宰官”“京营节度使”等的传说流布，进而成为话本、小说的编撰素材。这与当今民间仍俗称“国务院总理”为“宰相”，称县、市长官为“知县”“知府”等，可谓道理相同。不过，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据清王梦吉的《新镌绣像鞠头陀济颠全传》与郭小亭的《评演济公传》

所载，李茂春天台永宁建府定居，“不烦有司选择第宅，看得乐意之处，用价遍买，不肯亏枉小民”，且其为人纯谨厚重，夫妻好善，不贪荣利，“居住里中，却不知有皇亲国戚声势”，因之也不排除李景逖有易名“李茂春”或者“李赞善”“李华”等，隐居永宁的可能。从诸多现象的存在与其中的脉络联系分析，《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济颠罗汉净慈寺显圣记》《历代神仙通鉴》《济颠大师醉菩提全传》《新镌绣像鞠头陀济颠全传》《评演济公传》等明清话本、小说出现李景逖又名“茂春”“赞善”“李华”，及官拜“春坊赞善”“赞善大夫”“宰官”“京营节度使”等绝非偶然，详待考？

三、济公信仰的精髓

济公信仰经八百多年的聚散演变发展至今，是乃诸多历史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而作为济公信仰集中体现的济公精神、佛学思想，是谓济公信仰的精髓所在，也是济公信仰赖以生存光大、弘扬发展的灵魂内核与不竭动力。而在济公文化领域，对济公精神、佛学思想的研究，差距甚大。以济公精神为例，从新闻报导、发言演讲，或是济公文化论著中大略收集，不同的表述就有以下二十多种：

1. 急人危难、抱打不平。
2. 无我利他、为世济公、道济天下、普度众生、彰善惩恶、打抱不平、扶危济困、无私无畏。
3. 慈悲仁慧、普度众生、无我利他、道济天下、惩恶扬善、扶危济困、无私无畏、打抱不平。
4. 济世利他。
5. 无我利他、道济天下。
6. 济世为公、无我利他，尚武任侠、急公好义。
7. 乐观向上、惩恶扬善、众生平等。
8. 普度众生、乐于助人，惩恶扬善、扶困济贫，敢于与为富不仁斗智斗勇。
9. 乐观主义。
10. 慈悲仁慧、无我利他，特立创新、和乐处世、四气（硬气、灵气、侠气、和气）并弘、光耀千古。
11. 众生平等、急公救难、除恶扬善、扶贫济困。
12. 扶危济困。
13. 无我利他、济世救民、惩恶扬善。
14. 惩恶扬善、扶贫济困。
15. 爱人如己。
16. 代表广大民众的利益，为弱势群体撑腰打抱不平，云游四方没有为自己的行为，到处无我利他。
17. 扶危济困、乐善好施、无我利他、济世为公。
18. 慈悲仁慧、无我利他、惩恶扬善、道济天下。
19. 慈悲仁慧、无我利他、扶危济困、惩恶扬善、戏佞罚贪。
20. 济世救贫。
21. 戒恶扬善，急公救难，和乐处世，无我利他。

22. 以无我利他为内核，以惩恶扬善、慈悲度人、和乐处世为具体表现。

23. 众生平等、急公救难、除恶扬善、扶危济贫。

从上可见，目前对济公精神的宏观认识，可谓大略统一。缘何表述如此多样？首先反映于济公文化领域，对济公精神的研究，总体虽已起步，但尚未成为一个专题科目，大多都是相对随意的一句话归纳，系统、深入予以论述的文章鲜见；其次就是济公精神博大精深，各人所处的位置、角度不同，或者发言、撰文的主旨有别，都会出现绚丽多彩的不同视觉折光，因之也就有了诸多表述不一的情况出现。

诚然，比较济公精神的归纳，对济公佛学思想的提炼，不但相关的研究文章鲜见，涉足之人更是少之又少，而且也有学者断言，济公“没有留下丰富的佛教理论思想”，表明该项研究仅是提出，亟需深入。

而在济公文化研究中，如何准确归纳、提炼济公精神、佛学思想？必须依附历史上的济公人物，进而联系济公的儒释道圆融同修，及其续佛慧命、信脚弘法，建寺垒桥、药石济世，关注生态、怜悯苍生，刚正不阿、打抱不平，精诗善文、出口珠玉等方面的行状、事迹、功德，广泛涉猎济公匡扶正义、惩贪罚恶、救苦救难、道济天下的各个层面，与神秘的超人类、超自然、超社会的灵异神通发挥，全面反映济公出走山门，积极入世，践行“人间佛教”，普度芸芸众生的济世理念，真实体现民众百姓对济公的崇敬爱戴与虔诚信仰，同时又须立足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政治社会背景下，都具普遍适用的价值效能，且在语言文字的表述上又要言简意赅、朗朗上口、通俗易懂，为传法弟子、信徒信众所乐意接受，通俗领会，并于实践中掌握运用。

（一）济公精神的归纳

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笔者管见，可以将济公精神从“慈悲济世、无我利他、彰善瘅恶、扬弃创新”四个方面作出归纳：

1. **慈悲济世**，是为济公的道德观反映。所谓的慈悲，为佛门的基本理念，是当别人受苦有难时产生的同情心或同理心，乃普度众生之重要法门；所谓的济世，即帮助、扶助、救助世人。慈悲济世就是以真理的智慧、正法的妙谛、庄严的法相，使芸芸众生能够亲耳聆听佛法和朴素的道理，从中获得切实可行的离苦得乐出路，亲眼看到或者内心感受佛、菩萨的智慧传承，进而产生震撼、感染，觉悟、忏悔，实现正心向善的自我改变。

济公生活的南宋时代，山河破碎，赵氏小朝并奸相秦桧等，一味避战，专心媾和，恬不知耻，称臣割地，跪拜金主为叔、为伯，岁贡贺旦，民众百姓同受其辱，泱泱大汉，国格全无，脸面丧尽。保国忠良、经纶贤达，泣血宵吟，扼腕长叹。残酷的社会现实，推及济公从一个没落的豪门阔少，决计放弃仕途，立志普度众生。虽然现在无法知道当年的李修缘，曾设想过多少救国救民的方略，但从其年少功读时所写的立志诗，完全可以看出他是悲愤交织，抱着弘扬佛法，匡扶正义，惩贪罚恶，拯救民众百姓于水火的一腔热血，走上出家为僧之路。但当其步入空门后，看到寺庙亦非想象中的神圣、庄严之地，故尔又出走山门，续佛慧命，济世度人，与不公社会进行顽强抗争。济公的慈悲济世精神，从他的《寄净慈寺长老书》中，更是可见一斑：“折了禅杖，不怕上高下低，破却草鞋，管甚拖泥带水；光着头，风不吹，雨不洒，何须竹笠？赤了脚，寒不犯，暑不侵，要甚衣包？……万里寻声救苦，当行则行……。”可谓把他的慈悲济世精神交代得非常清楚。伟大济公，如是说也如是

行，他徜徉山水、信脚天下，深入社会，浮沉市井，同情民众疾苦，关心百姓冷暖，扶持弱小，乐于助人，道济天下事迹不胜枚举，拳拳公心昭然若揭，于民众百姓的心目中留下独特美好的印象。

2. 无我利他，是为济公的民生观反映。所谓的“无我”，即心无旁骛、心无执着、心无杂念的至高至尚境界，也称无我境界、无我境地。所谓的“利他”，就是为了使别人获得方便与利益，出于自觉自愿作出的帮助、救助行为，而不图任何回报。济公处世，北方大片国土蹂躏金人的铁蹄之下，赵氏小朝、达官显贵却于行在临安花天酒地、寻欢作乐。在此等反差强烈的社会现状背景下，禅机促使济公以“颠”抗争，他自由出入歌楼酒肆，智慧相处社会各阶层，上至十六厅朝官、二十四太尉、十八行财主等士族大夫，下至饽饽儿王公、卖酒张公、卖药沈公、陈干娘、周画工、徐袂褙……等市井九流，将禅法自如运用于民间，济物利生，神通感应，事迹甚多。打破了传统的僧尼枯居梵宫、蒲团打坐、诵唱经文、超度“死人”的形象，从而成为亦俗亦僧、亦凡亦仙、亦庸亦圣，行道济世的人间活佛。诸多的济公小说（传说），更是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济公的博学多才，机智灵活，护国佑民，情系百姓，扶危济困，救苦救难，普度众生的慈悲心肠，体现出济公视名利如梦幻，富贵为浮云的高尚人格。伟大济公，狂而疎、介而洁，既出世又入世，难忍得忍，难行则行，从不介意自己的得失誉毁，生命不息，利他不止，一挂弘法念珠，一顶破僧帽，一身垢衲衣，一把破蕉扇，一个酒葫芦陪伴终生，达到般若智慧的真境界，圆满涅槃，乃当之无愧的“无我利他”圣僧。

3. 彰善瘴恶，是为济公正义观的反映。济公为僧，匡扶正义、打抱不平，并敢于提出破除杀戒，“诛恶即是扬善”。在济公的事迹与传说中，诸多是戏弄纨绔子弟，惩罚奸佞恶棍的故事。如大理寺正卿、恶霸王胜仙为秦大奸相之内弟，朝廷的最高执法者，绰号“花花太岁”，专以强抢妇女、夺人妻室为乐，济公让一只白狗，咬掉王的鼻子，让他的宠妾被“妖魔”摄去，玩弄一通后送回，再让宠妾把自己说成如何贞节云云。济公僧传最为精彩的二则，就是济公“疯僧扫秦”，将秦桧与妻王氏密谋东窗，陷害岳飞的罪恶予以揭露、曝光，及与秦桧比试高低，把奸相拨弄于掌股之间，淋漓尽致地发挥一通，并使其服输银子。济公伸张正义的故事，快人心、平民愤，说不尽、道不完，惟妙惟肖地展现了济公的侠义之心、侠义之气、侠义之行，从而使其成为一个以破蕉扇为武器的东方“佐罗”，集侠士剑客、绿林豪杰、神仙道化、滑稽俳优于一身，成为民众百姓的保护神，与忠义关公、正义包公并列，尊为“侠义济公”。

4. 扬弃创新，是为济公的发展观反映。所谓的“扬弃”，是指新事物代替旧事物不是简单的摒弃，而是克服、摒弃旧事物中的消极因素，保留、继承对新事物有积极意义的合理成分，并把它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济公济世，抱负宏大，包藏宇宙，吞天吐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形态张扬而秉性耿直，心胸坦荡而不拘小节，凡事有自己的独立思考，有自己的处事原则，从不人云亦云，照搬照套，随人摆布。他所以出走山门，入世修持，乃是其领悟到“有一丝挂体，尚可经年；无数粒充肠，难挨半日”（济公《化盐菜疏》）；看清了“世人所急，最是饥寒，性命所关，无非衣食”。诚然，靠化缘、靠施主，寺庙僧人尚可艰难度日，却无法救度民众百姓出饥寒苦海。他所以提出“人心有佛，不碍真修，俗眼无珠，必须见像”，乃是其真正领悟了师父瞎堂慧远的“道济”赐名，原本就是经典理论之“道”，与实践修持之“济”的结合，如不践法济民，不但自身毫无功德可言，且对社会也

是无益。

济公精神作为一个博大精深、富寓哲理的思想体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政治社会背景下，都会适时、适地形成悲壮慷慨或者昂扬激越的不同乐章，这是济公精神主旋律的必然反映，同时又反作用于济公精神，促使其内涵、外延不断与时代的发展相适应。因之，把握济公精神的要旨，必须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与时俱进，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从而于实践的前沿，理解其实质所在。犹在当前新的时代背景下，务必要从济公的民生为怀、以德劝善、救苦救难，匡扶正义、打抱不平、惩贪罚恶的济世圣迹立足，在“爱国、自强，民本、诚信，守法、和合，勤俭、好施”四个方面、八大内容上做好文章，作出表率，促使济公精神在当今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不断充实完善、不断发展传播、不断弘扬光大。

1. 爱国、自强。爱国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凝聚一体的原动力。纵观济公李氏家族，素有爱国传统。先祖渊，守河东、击突厥、克山飞、固太原、勇起兵、胜李密、图长安，改元称帝，开创盛世大唐基业；太祖崇矩，赤胆忠心，辅佐太祖赵匡胤统一全国，为大宋帝国的一代勋戚重臣；祖父李涓抗击外侮，沙场殒命，遗尸蔡州，以民族英雄、抗金烈士扬名后世。官宦世家、忠烈家风、儒雅门庭，熏染了济公的爱国情怀，故而年少立志“欲把贪官恶霸除，三更孤影读诗书”，这与周公恩来年轻时疾呼“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可谓异曲同音，铁骨柔肠！

考中华佛教，素以庄严国土为本。《梵网经卢舍那佛说菩萨心地戒品第十》《优婆塞戒经》《摩诃僧只律》《戒经》亦教导弟子要奉公守法、遵纪爱国，不作国贼，不谤国家，不漏国税，不犯国法。受人滴水之恩，当思涌泉为报。近现代印光大师亦对当年的汉奸予以痛斥，“日人以豺狼之心，欲吞吾国。吾国许多人私爱日人之贿，为彼作走狗，致彼之凶势益大。使无人为彼用，决不至有如此之横暴也”（《印光大师文钞》上册）。少林十三棍僧救唐王，青史刻载，脍炙人口；虔诚佛教徒戚继光、林则徐抗倭、禁烟，可歌可泣，流芳千古；岳武穆好慕佛理，淡泊功利，一曲《满江红·怀古》，浩气惊天地，精忠感日月。1937年上海抗战爆发，上海佛教慈善团体，首先组织“僧侣救护队”，全员120人，在宏月法师带领下，人人抱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壮烈意志，在烽火弹雨中，大力、大勇抢救伤员，计救护吴淞、大场、浏行一带我抗日负伤将士、租界难民8272人，创办“佛教医院”，举行“抗战阵亡将士超度法会”，佛光接引为国捐躯英烈往生净土、荣登极乐。五台山僧人成立抗日救亡组织，参加武装斗争，保护抗日干部，购买救国公债，为抗日武装提供食宿，传递情报，在民族解放事业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成为全国宗教界抗战的一面旗帜。江苏宜兴龙池山恒海和尚组织僧俗千余，成立游击队，在苏锡常宜地区，武装打击日伪军，战功卓著，终在倭寇大军扫荡洞庭山、马鞍山时，粮弹尽、外援绝，壮烈成仁，圆满涅槃！江苏句容茅山三宫五观道士为新四军带路，探情报、送消息，救护伤员、备粮筹款。1938年10月，日军洗劫茅山，烧毁山上宫观，西斋院道长黎洪春、乾元观道长惠心白等几十名道士惨遭寇之杀戮，死里逃生的汤念义、陶念忠等道士相继参加新四军，血洒疆场，羽化升仙。“少林和尚”许世友，活尽忠，死尽孝，从战士到将军，戎马一生，战功卓著，为民族解放、人民福祉贡献了毕生精力。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长河中，儒家古德先贤也是将国家的荣誉、尊严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提倡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正义可以“杀身成仁”。归宗炎黄、凝聚华夏、报

效桑梓，不甘耻辱、百折不挠，奋发图强、救国救民，慈悲济世、普度众生等精神，构成了近代爱国主义的力量源泉。

诚然，爱国不拘形式，爱国必须自强。只有苦学不辍，才能自强不息。宗教信仰是理性的信仰，目标也是揭示大千世界的本质真理，只是站立的角度与运用的方法较为特殊而已。唐一行禅师，修历法、算子午，既是佛教密宗领袖，又为一代科学大家。济公自幼聪颖，胸怀大略，毅然立志。赤城山功读，废寝忘食，手不释卷，经史子集无不涉猎，诗词歌赋出口成章，经法竺书善识能译，满腹经纶学贯中西，故尔才思敏捷，处事果断，行于当行，止于当止，感情丰富，挥洒自如。他之所以能够“息人之诤，救人之死，皆为之于戏谑谈笑间，神出鬼没，人莫能测”（明释明河《二颠师传》），与其博古通今的才华基础，联系甚是密切；他之所以能够避雷救黄生，古井运木建寺，并“强抢”新娘，拯救村民于“飞来”之“峰”祸，与其熟练掌握气象、地下暗河，以及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的学识铺垫亦是前后照应。

当下，岛国倭寇重蹈覆辙，“国有”我土；“台独”猖獗，统一维艰；列强机舰，虎视眈眈，屡屡犯境；蝼蚁小邦，夜郎自大，其欲逐逐，侵我海疆、占我岛礁、扣我渔船、排我企业、杀我同胞。传承、弘扬济公精神，爱国、自强则为首要的内容表现，也是济公精神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统美德的一种生动诠释与光辉写照，是亘古千秋的高尚情操。外宣主权，扬我大汉威灵，收复祖宗基业，内反“台独”，共识“九二”，誓师“统一”，既是炎黄子孙、龙的传人的社会责任，也是全体济公传法弟子、信徒信众，信仰济公、皈依济公的先决前提与基本要求。

2. 民本、诚信。民本即以民为本，是儒家思想的一种反映，认为民众百姓乃国家之根本，提倡重民、爱民、亲民。夏开国君主大禹称“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大成至圣孔子谓，能“博施于民而济众”（《论语·雍也》）即是圣人。后圣荀子云“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将民众百姓摆在至关重要的地位。《礼记·礼运》亦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亚圣孟子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明清时期，启蒙思想家黄宗羲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君应为天下人服务。近代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国父孙中山认为，国家之本在于民，秉持民族、民权、民生。毛泽东也多次号召，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

“诚信”是华夏民族五千年道德文明的精华传承。儒家提倡厚德载物、诚实不欺、恪守信用、言行一致；佛教要求严守戒律，由戒生定，因定开慧，不负本师，因果报应如影随形，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老子认为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历代商贾和百年老店都十分注重以诚立业，买卖公平，讲求生财有道，利以义取，践行童叟无欺，“秤平、斗满、尺足”。济公一生，崇尚道德、民生为怀、重民亲民、救苦救难、济世为公，匡扶正义、惩贪罚恶、打抱不平、普度众生。无不说明济公精神与古德先贤、圣人伟人所倡导的民本、诚信理念相互融合，高度一致。常言道，人无信不立，企业无信不长，城市无信不荣，为政无信不誉。当下社会，红尘碌碌，为官皆须以民为本，讲求亲民、诚信。济公之所以能在民众百姓中具有广泛的亲和力，与他济世为公、无私无欲的人格魅力，与他奉行民生为怀，诚信为上的理念都是密不可分。煌煌中华，素为文明古国，礼仪之邦，大力弘扬济公的民本、诚信理念，全面建设与时代相适应的信用文化，是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有之义，治本之策。离开民本、诚信，普度众生即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建设和谐社会则也成为一句空话、

套话，不可能真正实现。

3. 守法、和合。南宋释居简禅师的《湖隐方圆叟舍利铭·济颠》载，济公“狂而疎、介而洁，着语不刊削，要未尽合准绳，往往超诣。……公也不羈，谐谑峻机，不遵常度，辄不逾矩。”济公自己亦曾具状《自供》，“幼生宦室，长入空门。宿慧神通三昧，辩才本于一心。理参无上，妙用不穷。……醉昏昏，偏有清闲；忙碌碌，向无拘束。欲加之罪，和尚易欺，但不犯法，官威难逞；请看佛面，稍动慈悲，拿出人心，从宽发落。”可见济公当世，内心是视封建统治为“淫威”，自己只能在不触犯封建法律的边缘度日，得以首先保全自己，践行普度众生大业。至于济公的喝酒吃肉行状，清初晦山戒显的《济颠本传序》已作明示，是乃“良以既证果人，欲度执相凡夫，不得不隐圣现劣故也”。近现代印光大师的《文钞》亦谓，“其饮酒食肉者，乃遮掩其圣人之德，欲令愚人见其颠狂不法，因之不甚相信。”这与佛祖释迦牟尼在世时，曾让舍利子、目犍连度化王宫的人，但都未获成功；后来，佛陀派文殊菩萨前往，菩萨在王宫，跟他们一起吃喝玩乐，最终把他们都给度化了。文殊菩萨之“行”与济公之“颠”，可谓前后相承，方式相近。

所以说，济公表面虽“颠”态无常，实质是混俗同尘，酒不醉性，清净光明，匡扶正法，但又因地制宜，灵活变通，联系实际弘扬佛法，续佛慧命，从不给奸佞、权贵、富豪、地痞、“小人”以任何口实，他的颠狂忤戒，不过是慈悲济世，普度众生的一种方法、手段而已，实质乃“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济公的言行、事迹表明，他不但没有违反佛门的戒律，且是牢牢坚守饶益有情的菩萨戒，聚集了持律仪、修善法、度众生之三大法门，以牢牢坚守之。在济公的思想境界中，没有分别，没有取舍，没有得失，一切已经放下，一切随缘而为。启示人们在当下社会中，每说一句话，每做一件事，都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针对不同的时段、不同的地点、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条件，不同的对象，运用不同的方法，讲述不同的道理。惟有这样，方才符合慈悲济世、普度众生的行为法则。中国历史上，儒家主张轻徭薄赋、惠民富民、宽猛相济，导之以德、尊贤使能，倡导“礼之用，和为贵”，提倡社会中的人际关系要和谐；法家主张法治，严刑峻法，以破奸轨之胆，而使官吏称职，百姓乐安其业；墨家提出“兼相爱，交相利”，主张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天志、明鬼，赖其力者生，不赖者不生。从表相看，似乎泾渭分明，实际相互间又有不少的一致性与互补性，即礼法相通，恩威相容，刑德并用。今天，建设民主与法制社会，既要依法治国，又要以德治心，讲求和谐。当政为官、民众百姓都要以济公为学习楷模，依法灵活，行事变通，以义感人，以德化人，做到事事“辄不逾矩”“要未尽合准绳”，并且“往往超诣”，从而造就一个守法遵纪，团结互助，和合兼爱的社会氛围，建立健康有序的人际关系、生态环境，提升整个社会的亲和力，增进整个民族的凝聚力。

4. 勤俭、好施。济公出身豪门，抛弃万贯家财出家为僧，破帽、破扇、破鞋、垢衲衣，似丐似氓，事事处处以民生为怀，一生徜徉山水，浮沉市井，忙忙碌碌，赞誉不喜，闻谤不嗔，扶危济困，匡扶正义，救苦救难，济世度人，勤俭好施事例不遑枚举。如前述济公主持修葺东阳大智禅寺，首先自己倾囊而出，不足才向施主募化。济公僧传系列，也有济公送钱给孝子高广利葬母的事迹介绍。尤其需要点赞的，就是济公为僧，所做的济世利他、彰善瘅恶好事、善事无数，但从未以各种名义索要、收受施主的钱物为己所用，最多不过是参与其中吃喝一顿罢了。一生无私无欲，“东壁打到西壁，依旧水连天碧”，活也潇洒，死也潇洒，圆满涅槃，当为民众之楷模、百姓之表率，无愧庶民之圣、禅宗大德、无愧道家仙真、传

世“活佛”。

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的民族，古德先贤崇尚劳动光荣，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神农氏“教民农作”，大禹治水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尧贵为部落联盟首领，却住茅屋、喝菜汤、吃粗米、用土钵。北山愚公坚韧不拔，“每天挖山不止”。亚圣孟子认为只有“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才会有所作为，提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成为激励后人的不朽座右铭。毛泽东也通令告诫，要“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华夏古国历经磨难，几度衰微，几度崛起，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坚韧不拔、自强不息、勤俭节约之民族精神。因之，无论企业、商家，团体、个人，致富不能忘却节俭，不能忘却奉献。佛门素以慈悲为怀，慈善历史悠久，济贫、赈灾，救死、扶伤，助孤、援寡，义医、放生等长盛不衰，首屈一指。诚然，乐善不分贫富，好施不拘形式。民国时期，著名慈善家、佛教居士王一亭皈依济公（法名觉器），邀约上海工商界的济公信徒信众、慈善人士成立中国济生会。通过慈善劝捐，或请“济公”临坛扶乩形式，募筹钱物、施医舍药，为灾民提供人道援助。天台知事李锦枚与陈立仁、裘炳涛、朱福履等，效法中国济生会模式，成立济公会，先后在泉亭、石墙头、赤城山和永宁济佛院等地设坛，亦以降鸾扶乩等形式，托名济公为信徒信众释忧疑、卜吉凶，扶贫救困，甚为后世传法弟子、信徒信众所赞颂。

（二）济公佛学思想的提炼

中华佛教以罗什、僧肇、慧远、玄奘、智顓、道宣、延寿、契松等为代表，在佛学理论方面的贡献巨大，丰富了佛教文化之思想宝库。而在佛学的实践方面，济公则谓其中的集大成者与优秀楷模，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他为僧一生，虽未在佛门开宗立派，也尚未见有系统的佛学论著传世，却在狂而疎、介而洁，喝酒食肉、戏谑谈笑、佯狂“疯颠”之外表下，践行释祖的“人间佛教”，潜在留给后世之佛学思想，实不亚于前述高僧大德。正由于此，自宋伊始就有居简禅师的“有晋宋名缙逸韵”，破庵祖先禅师的“一拳拳碎虚空，惊得须弥倒走”，运庵普岩禅师的“业识忙忙，风流则剧”，天童如净禅师的“赛尽烟花瞞尽眼，尾巴狼藉转风流”的赞誉；元“无竞斋”亦品评济公，“非俗非僧，非凡非仙”。至明，释大壑的《南屏净慈寺志》又载，1209年济公园寂下火，全大同长老、铁牛印禅师，宣石桥、宁棘庵长老称济公“参透远老葛藤”“横说竖说，耸动王侯”“得灵隐寺远瞎堂之禅”“胸藏万卷书，笔扫三千首。”清晦山戒显的《济颠本传序》，聂先的《续指月录》，释自融、性磊的《南宋元明禅林僧宝传》，与释明复的《中国佛学人名辞典》也肯定济公，“锦绣蟠胸，出口珠玉，尽大地儒释，皆让一头地”，得瞎堂慧远“密印（秘传）”“神悟绝伦”“澈悟本来”。再行结合济公遗下的文翰、诗作，及其为僧的行状事迹等，可以对济公的佛学思想，大体作“禅非坐禅、心明性见，颠狂顽世、真乃禅本，无欲以刚、民生为怀，以德劝善、正法诛恶，混俗同尘、酒不醉性，般若性空、随缘任运”六个方面之提炼。

1. 禅非坐禅，心明性见。传统佛教把坐禅看成是学佛修行的基本方法之一，济公在经一段时间的坐禅实践后，即悟出长时间的坐禅，不但有违生理，对人体无益，且如桎梏牢狱，苦不堪言，坚决要求摒弃。明沈孟杲的《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载，济公于灵隐寺剃度后，瞎堂慧远长老告诫道济，汝已受三皈五戒，杀盗淫酒气，自后俱可除下，每日在云堂坐禅。监寺送道济入云堂，坐至三更，身渐疲困，从禅床跌下三次，跌得七块八块。渐至天明，道济起来，摸着头上的胛，连声叫道：苦恼、苦恼！清天花藏主人的《济颠大师醉菩提

全传》亦谓，道济备受坐禅之苦，找师父瞎堂慧远诉述时，曾说了这样一段话：

坐禅原为明心，这多时，茫茫漠漠，心愈不明；静功指望见性，那几日，昏昏沉沉，性愈难见。睡时不许睡，强挣得背折腰驼；立时不容立，硬竖得筋疲力倦。向晚来，膝骨伸不开；到夜深，眼皮睁不起。不偏不侧，颈项带无木之枷；难转难移，身体坐不牢之狱。跌下来脸肿头青，扒起时手忙脚乱。苦已难熬，监寺又加竹片几下。佛恩洪大，老师救我性命一条。

而把济公对坐禅的描述，与禅门高僧唐法海禅师集录《六祖坛经》所载的，慧能听志诚道，神秀的禅法主要是教人住心观静，长坐不卧时便说：“住心观静，是病非禅；长坐拘身，于理何益！”并作偈曰：“生来坐不卧，死去卧不坐；一具臭骨头，何为立功课。”予以对照比较，虽二者的说法不尽相同，但都蕴含禅非坐禅的思想道理。禅门临济宗创始人义玄禅师的《镇州临济慧照禅师语录》亦谓：“佛法无用功处，只是无常无事，屙屎送尿，着衣吃饭，困来即卧。”可见慧能、义玄对坐禅的论述，与济公的“坐禅……茫茫漠漠，心愈不明；静功……昏昏沉沉，性愈难见”，可谓慧眼所见略同。表明济公的“禅非坐禅，心明性见”佛学思想源于慧能、义玄，并自己的实践总结；至后，济公在《重建净慈寺疏文》中，则更为直截了当提出“人心有佛，不碍真修，俗眼无珠，必须见像。”在慧能、义玄之禅风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为禅门各宗、各派倡导纯任自然，不拘形式的修持方法，丰富、增添了新的思想内涵与理论依据。

2. 颠狂顽世，真乃禅本。明沈孟祥的《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还载，一日慧远长老与道济同吃，碗内只有些粗麸粿，余皆黄酸齏菜。道济随口念出：“小黄碗内几星麸，半是酸齏半是瓠；誓不出生违佛教，出生之后碗中无。”长老听后，遂以“月白风清凉夜何，静中思动意差讹；云山巢顶芦穿膝，铁杵成针石上磨”对之。道济曰，弟子自礼长老为师，不曾开发，如何得成正果？长老曰，汝忒性急，既如此可近前来。道济上前，即被长老扯住一掌。道济扒将起来，看着长老胸前，一头将长老撞翻跌下禅椅，径奔走了。长老高叫有贼，众僧云集，问偷去甚物？长老曰，禅门大宝。而道济一径直入云堂，扒上禅床，一头撞上首坐和尚，口言妙妙。上首坐斥曰，甚么道理？道济答道，闲又何妨；须臾，又撞次首坐和尚一头，再言妙妙，好耍、好耍！众曰，道济疯了。道济曰，我痴则痴自家知。是夜，道济在禅床上，戏耍了一夜，监寺不能禁约。次早长老独坐寻思，道济虽如此，未知他参得透否？擂鼓敲钟升法座，告众僧：“昨夜三更月正明，有人晓得点头灯；蓦然思起当时事，大道方知一坦平。”道济此时正在沐浴，连忙系了浴裙，穿上直裰，直奔云堂问讯道，弟子记得当时事。长老曰，既然晓得，何不于大众之前发露。道济就于法座前，打一跟斗正露出下身“物事”，众僧掩口而笑。长老曰，真乃吾家之种。监寺等僧控道济触犯禅门正法，应予责打，长老却于单子后面批了“禅门广大，岂不容一颠僧”之语。

清天花藏主人的《济颠大师醉菩提全传》，也记录了僧众与济公的一段对话：

众僧道：你是一个和尚，啰哩啰哩的唱山歌，是正经吗？

济颠道：水声鸟语，皆有妙音，何况山歌。难道不唱山歌，念念经儿就算正经？

众僧道：你是个佛家弟子，与猴犬同群，小儿作队，也是正经么？

济颠道：小儿全天机，狗子有佛性，不同他游戏，难道伴你们这班袈裟和尚胡混么？

再有，济公《自供》亦云：“尼姑寺里讲禅机，人俱笑我颠倒；娼妓家中说因果，我却自认风狂。唱小词，声声般若；饮美酒，碗碗曹溪。坐不过，禅床上翻筋斗；戒难持，钵

孟内供养唇儿。袈裟当于卢妇，尽知好酒颠僧；禅杖打倒庞婆，共道风流和尚。醉昏昏，偏有清头；忙碌碌，向无拘束。”

从上不难看出，济公在被慧远长老扯住一掌，犹如醍醐灌顶，顿然觉悟“禅”之本义在于“真”。真者，与客观事物相符合，对应“假”也、“伪”也；人性不加任何造作的本来面目，乃“真”之灵魂所在。这与老子《妙真经》云：“自然者，道之真也；无为者，道之极也。人为道，能自然者，故道可得而通；能无为者，故生可得而长自然也。得之者知其自然，不得之者不知其所由然”相通无异。透过现象认识古往今来之平常人的天机、本性，由于各种制度、礼教、规矩、欲望的雕凿、束缚，已经淹没殆尽，习惯表现出来的，大多是一种与本来面目相去甚远的虚假外表，唯有那种违情悖俗之“颠”之“狂”，可以表露出人性的本来面目。济公的“颠狂顽世，真乃禅本”佛学思想，虽然是在禅宗自心自佛、即心即佛、禅在日常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但融入了老子的道学思想，进一步夯实了禅门的修持理念，也为其日后出走山门，入世修持，践行“人间佛教”，戏谑谈笑，“颠”济苍生，作了一个很好的注脚。毋庸置疑，济公的佛道功底深厚，禅法运用娴熟，是为这一时期禅学发展的承前启后的集大成者，可谓达到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境界。

3. 无欲以刚，民生为怀。济公为僧，无私无欲，有酒喝酒、有肉吃肉，无酒无肉喝粗麸舂菜粥，什么钱财功名、爱恨情仇皆淡漠视之，始终奉行瞎堂慧远长老赐名“道济”的用意，深刻体会“世人所急，最是饥寒，性命所关，无非衣食”，故在徜徉山水，浮沉市井的“疯颠”济世之中，千方百计关心民众百姓疾苦，情系红尘俗世芸芸众生。从南宋释居简的《湖隐方圆叟舍利铭·济颠》，到元代的《东窗事犯》《东窗记》；从明沈孟样的《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冯梦龙的《济颠罗汉净慈显圣记》，到清天花藏主人的《济颠大师醉菩提全传》、郭小亭的《评演济公传》等著的记载皆可看出，济公一生，抑恶扬善、匡扶正义，息人之争、解人之难，济人之急、救人之死，所做的关怀民生好事、善事，不计其数。

中华佛教素以无私无欲，救人拔苦为大乐，以慈悲济世，普度众生为己任。《尚书》《论语》与《心经》《坛经》皆云，无欲以刚，有容乃大，提倡得之坦然、失之淡然。华夏五千年文明史告诉我们，凡有大志者皆有德者，有德者皆为无欲者，无欲者皆欲在天下众生者。济公的“无欲以刚，民生为怀”佛学思想，是为佛门的慈悲济世理念与无我利他传统道德，在“人间佛教”践行中的言行一致结合，与形象化的反映延伸、完美体现，而非脱离红尘，形式苦修中的无行意念、口头续诵，实实在在地打破了出世与入世的界限，融两者为一片。伟大济公，虽穷困落魄，体无完衣，却无时无刻关心民众百姓的冷暖，知民心、拯民命、解民困、排民忧、保民安、娱民乐，难忍得忍，难行则行。在千逆万难中不改救世达人之初衷，使民众百姓能够亲耳聆听佛法和朴素的道理，亲身感悟佛之精神、菩萨智慧的传承，从而明白希望在明天，乐土在脚下，对未来充满美好憧憬，这也是世人之所以崇拜济公、尊奉济公的因缘所在。

4. 以德劝善，正法诛恶。济公一生，神功叵测，匡扶正法、惩贪除霸、扶危济困，足迹遍及黄河左右、大江南北。不过，综观相关的济公僧传，济公济世，处处是以道德劝诫为先，以整饬风化为任，把佛门感谢恩人、原谅仇人、帮助苦人、救济穷人、调伏狂人、启迪愚人、感化恶人、鼓励善人、警策懒人、醒觉迷人的慈悲普度宗旨，与古德先贤倡导的和合兼爱思想，自然圆融于具体事件的处理之中。鞭挞丑恶，荡涤污秽，惩罚奸佞恶棍，只要情节不是十分恶劣，危害结果不是特别严重，鲜见一棍子将人打死，而是教育为重，劝化为念，

希望能感应对方，放下屠刀，自悟、觉醒、向善，即便是对十恶不赦的江洋大盗，济公在捕捉过程中也是屡屡加以点化，直到希望完全破灭，才将其缉拿归案。

然而，济公在以德劝善、整饬风化的同时，又提出破除杀戒，诛恶即是扬善。讲的是济公行走溪畔，见一只大螃蟹横行霸道，追食小鱼、虾米，恨极就将其逮住，一面口念弥陀，一面用石块将其捣成蟹酱，撒入水中，让那些平日受欺的小鱼、虾米，美美地饱餐一顿。济公的“以德劝善，正法诛恶”佛学思想，比较传统佛教的“不杀”戒律，表面看来是有重大突破，但与释迦牟尼当年杀贼却非常相似，故事谓释祖尚未成佛时，与五百商人一起至一岛上淘取珍宝，回程时其中一个坏人想杀掉其它人独吞，他于心不忍造如此大的恶业，便杀了这个坏人。也正是这起杀贼事件，反使释祖累积了九十九大劫（宋张君房《云笈七签》谓：“天地改易，谓之大劫”）的功德。所以说，佛法讲慈悲、讲扬善，也是具有两面性，当你不诛恶就无法慈悲、扬善时，那就必须诛恶，且只有诛恶才能弘扬正法，而非无原则的一味慈悲、慈善！同一道理，道教的《黄帝阴符经》，也是秉持这一宗旨，谓曰：“天性人也，人心机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天发杀机，移星易宿；地发杀机，龙蛇起陆；人发杀机，天地反复；天人合发，万化定基。”足见济公的“以德劝善，正法诛恶”佛学思想，是乃对释祖杀贼行为与人文初祖经典的创造性领悟和灵活性运用，延伸后世影响很大。1939年5月，抗日烽火遍及祖国大地，佛教圣地南岳衡山，一支由佛门弟子为主体的抗日救国组织“南岳佛道救难协会”成立，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公恩来，亲笔为协会作“上马杀贼，下马学佛”题词，道出了佛门弟子学佛首当爱国，爱国即应学佛的不朽真理，激励佛门弟子积极应世入世，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可谓大机大用，灵活善巧，堪为众生之福田，真正体现了释祖的“人间佛教”精神，代表了宗教的发展方向。

5. 混俗同尘，酒不醉性。济公醉里乾坤，壶中岁月。南宋释居简禅师的《湖隐方圆叟舍利铭·济颠》称其，“暑寒无完衣，予之，寻付酒家保。”铁牛印禅师之《起龕文》形容，“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无钱明日休。”宁棘庵长老的《挂真文》亦谓，“一生只贪浊酒，不顾禅师道友。”清天花藏主人之《济颠大师醉菩提全传》，辑录济公的《酒怀》，更是对其自己的酒后形态作了淋漓尽致描述，“倒于街，卧于巷，似失僧规；醉了醒，醒了醉，全亏佛力。贵王侯，要我超度生灵，莫不筛出来，任我口腹贪饕；大和尚，要我开题缘簿，莫不沽将来，任我杯盘狼藉。醺醺然，酣酣然，果然醉了一生；昏昏然，沉沉然，何尝醒了半日。”故从表像看，济公乃名副其实的“酒圣”“醉仙”，但如从其三教圆融同修的层面看，当时的“正一道”隆极一时，本来也是允许修炼之人不住宫观，可以饮酒食荤，称之为“火居道士”。不过，济公喜酒而不溺于酒，外形醉而心不迷。明释大壑的《南屏净慈寺志》，辑录济公的《真像沈提点求赞》，交代非常清楚，“一张大口，不会非言，只会吃酒，看看白头，常常赤脚。有色无心，有染无着。”徐人瑞、程瑶，徐道、程毓奇的《历代神仙通鉴》亦载，济公“年至六十，忽不食荤酒，平素朝臣有与诗酒盘桓者，俱不信。复置酒招之，烹鲜为馔，济云：可将去放生。”清香婴居士王梦吉的《新镌绣像龕头陀济颠全传》亦谓，“济颠嗜酒，量却不深，只是无聊寂寞之时，借他名色搭淘吃些荤菜，接力陶情之意。若说他沉湎不羁，肠宽似海，却也冤他。”《醉菩提全传》亦谓济公如是告诫时人：“荤酒既是我的玩世，亦是俺的宿孽。大众从今一心持斋戒精进，切勿以道济为借口，正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也。”真正践行了他在《重建净慈寺疏文》中提出的“人心有佛，不碍真修”的思想格言。

由此可见，济公的喝酒，不过是借酒通禅罢了，本意仍是强调自身自在，对名利所闲充

分体悟，从而使得精神压力解脱，而不是寻求醉酒那种超自然、超现实的缥缈虚无境界，通俗地反映了一种蔑视外在行径而重内在感悟，重心灵空寂而不重形式崇拜的发展趋势。可谓无牵无挂，事事无碍，风行水流，自然洒脱。禅门泰斗虚云老和尚重辑、宣化上人增订的《佛祖道影》品评曰：“眼观五色内无有，耳听八音心不知；鼻嗅百香离分别，舌尝众味远辣酸。身觉诸触泯滑腻，意缘万法少尘踪；毁誉讥嫌皆弗计，如如了了见性灵。”可谓道出了济公“混俗同尘，酒不醉性”佛学思想的真谛。这对现实社会中那些醉生梦死、名利所困，欲海难填、贪心不足之辈来说，不正是一声当头棒喝！或者说是一剂促人猛醒的救治良药吗？

6. 般若性空，随缘任运。纵观济公僧传系列，济公的人生如梦、般若性空思想俯拾皆是，诸如济公时常唱的两首歌为：

世人忙碌碌，都在一梦中。也梦为寒士，也梦做庄农，也梦陶朱富，也梦范丹穷，也梦文章显达，也梦商贾经营，也梦位登台鼎，也梦执掌元戎。离合悲欢，寿夭共穷通。仔细从头看，都在一梦中。

南来北往走西东，看得浮生总是空。天也空，地也空，人生杳杳在其中。日也空，月也空，来来往往有何功？田也空，土也空，换了多少主人翁。金也空，银也空，死后何曾在手中。妻也空，子也空，黄泉路上不相逢。官也空，职也空，数尽孽随恨无穷。朝走西来暮走东，人生恰是采花蜂；采得百花成蜜后，到头辛苦一场空。夜深听尽三更鼓，翻身不觉五更钟；从头仔细思量看，便是南柯一梦中。

事实上，明沈孟祥的《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清天花藏主人的《济颠大师醉菩提全传》载小济公，偶游天台山祇园寺时那句语惊四座的“净眼看来三界，总是一椽茅屋”续题，也是蕴含般若性空的思想。考禅门历史，自五祖弘忍以《金刚经》传予六祖慧能后，般若性空思想一直作为佛门的重要基础理论而奉之延续，亦即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因缘和合而成，虚而不实；换言之，就是一切事物的本质，没有一种是永久不变的，事物的本质都具自在自得的空性。因之可以认为，般若性空思想是济公出家为僧的动因之一，他之所以能够跳出世俗，静观云水，醉里乾坤，壶中日月，行事多取戏谑谈笑之态，与他看破红尘、看破本来、看破自在、看破始终，也是存在一种必然的照应联系。

所谓之“随缘任运”，就是要顺应自然，相信命运，不过于追求、不过分执着，更不可逆天而为，为人要相信自己、敢于担当，发挥主观能动性。颠僧道济之所以能够成为活佛，在于他坚持从事物因缘关系上不懈着力，生命不止，济世不息，以自己的率先垂范，向民众百姓形象地展示了性空乃来世，极乐在人间，为人应在尊重客观、顺应自然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作用，满腔热情地参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正是济公于出世与入世的互动之中，特立独行，敢说敢为、敢做敢当，将禅法自如运用于民间，在传统的顺自然，信命运，不追求、不执着的“随缘”理念中，注入了人为积极的“任运”因子，从而使得“人间佛教”的践行，充满勃勃生机。

济公于儒释道三教圆融修持实践中创立的佛学思想，不但与这一时期的禅学理论不相违悖，而且又有了创造性的突破、扬弃与发展，因之得到宋居简、祖先、普岩、如净、道全禅师，铁牛印、石桥可宣、宁棘庵长老，元“无竞斋”，明沈孟祥、冯梦龙、释大壑，清晦山戒显、释际祥、释自融、释性磊，天花藏主人、香婴居士王梦吉、郭小亭，与近现代印光大师、虚云和尚、宣化上人、释明复等高僧大德的一致肯定，填补充实、完善丰富了佛陀教义，历为后世儒释道三教所推崇仿效，并成为民众百姓、信徒信众、传法弟子的一种精神

渴望与生存寄托。至于济公的佛学思想形成，自然又与他出生官宦世家、儒雅门庭，饱读诗书，受儒家的为人道德、社会责任、人生使命的驱使存在联系，也与他年少在儒释道三栖圣地赤城山手不释卷，废寝忘食读经，受佛门慈悲和仙道贵生的情操陶冶，与他“罗汉应真”“观音化身”，生于天台、长于天台，长期受“自强不息、崇尚气节，勇于闯荡、敢于冒险，粗犷狂野、机智灵活”的天山硬气熏染亦是相关。

（三）济公精神、佛学思想的当代价值

现代社会，政治民主、法制健全，民众百姓生活安定，济公精神、佛学思想的当代价值如何体现？这是济公信仰、济公文化研究中的一个不可回避，并且必须正面回答的问题。首先应该肯定，时下的环境，包括国情、世情与社情、民情等，较济公生活的南宋时代，已经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机械照套、照搬当年济公的“疯颠”济世模式，则肯定是不合时宜，也无法行通。诚然，济公精神、佛学思想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作为儒释道三教圆融同修的经典范例，作为社会道德伦理、人格质量的引领指向，作为是非曲直、善恶美丑的考量标尺的哲理性质没有改变。济公之所以受人尊敬、受人崇拜、受人信仰，关键在于他是以出家人的身份积极入世，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参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至今仍具无可置疑的表率、榜样作用。再则，济公精神、佛学思想经八百多年的聚散演变、增益充实和扬弃发展，其内涵、外延已经涉足整个宗教领域，提倡宗教圆融和合，与世俗社会紧密联系，切实解决现实问题，积极为活人服务，为现代宗教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1. 济公精神、佛学思想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具体表现在，济公精神、佛学思想注重生命自觉和智慧启迪，对人类社会的道德提升，心灵净化，身心舒解，情操陶冶，秩序创建，以及摒弃战争、和平共处等的影响深远。漫长的历史岁月，它超越时空、文化的藩篱，辗转流布于大陆内地、台港澳地区，乃至世界各地，焕发着生生不息的生命光华，无时无刻提醒人们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不同的政治文化背景下的行为模式与应负责任。终极目标是教人开发道德光明之本性，不以侵犯他人生命、钱财、身体、名声等，做好自己的修持德目，从而认识生命的真正价值，认识自我的清净本性，开发芸芸众生的先天佛性与平等法性，建立人文环境全面优化的社会状态。因之，它能够引领人们的思想，倡导人性的慈悲，使民众百姓在善与恶、荣与耻、生与死之间作出正确的理性判断。济公的行状、事迹、功德启示，为人必须对自己的“所欲”与“不能欲”，要有所选择、有所放弃，切切不可影响他人的“所欲”与“不能欲”，尤其不能损害他人的生存与发展，自觉以慈悲理念济度苍生、繁荣苍生。济公精神、佛学思想集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关注环境、遵纪守法等方方面面的内容于其中，能够使人抑制七情六欲，规控怨念情愁，克服心浮气躁的本性弱点，回归清静状态，做到宽容谦让，明礼诚信，和平相处。信仰济公、效法济公，除了用强制外在的国家政策法律约束自己外，更为重要的在于自觉重视身心行为的操持，生起大悲，广度有情，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从而激发整个民族、整个社会，形成一个团结互助，伦理有度的气象氛围，建立起健康有序的和谐人际关系。这与建设打造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文化强国，弘扬符合社会实际的先进文化，切实解决当前文化发展与国民素质不相适应等问题，无论是从内涵上看，还是从外延上讲，都是具有相当的一致性。

2. 济公精神、佛学思想是儒释道三教圆融同修的经典范例。从元孟宗宝的《洞霄诗集》辑录济公的“羽衣读黄庭，内景宜自修；蓬莱隔弱水，九转即可求”，与明释大壑《南屏净

慈寺志》入编济公的“桃花柳叶无心恋，月白风清笑与歌；倒骑驴子归天岭，钓月耕云自琢磨”之诗句，完全可以看出济公对张果老那种神仙日子的向往，这显然与他自小受兼容并蓄、博大精深的天台山文化熏陶不能分开。天台山文化者，北方的豪迈大气与江南的柔顺细致，在这里完美结合，以崇尚力量品格、天性自由的海洋文化，与具鱼米之乡特色、才智艺术称著的吴文化，及气质勇悍、开拓冒险的古老百越文化，亦在这里交融。在中华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碰撞、交流中，天台山首先完整地实现了对外来文化的合理吸收，诞生了第一个中国化佛教——天台宗，及后流传朝鲜半岛、日本和东南亚等国；创立了中国道教南宗，深刻地影响本土道教和台港澳地区，东南亚、欧美国家道教的发展；传承了以寒山、拾得二圣为代表的“和合文化”，主导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济公一生，出世入世，三教同修，皆成正果，亦庸亦圣，亦俗亦佛，亦凡亦仙，是为天台山文化的形象代表。济公精神、佛学思想，无不与提倡血亲人伦、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现世事功、修身存养、道德理性，核心为“仁”的儒家文化相互融合；无不与道家的“仙道贵生（鲜明特色）、清静寡欲（行为标准）、自然无为（生活态度）、柔弱不争（自我修养）、返璞归真（理想状态）、天人合一（文化主体）、天道承负（善恶报应）、性命双修（修炼要诀）”教义融会贯通。在三教的圆融修持中，济公精神、佛学思想既是一种经典范例，又是一种精髓结晶，更是一种潜在活力，不但可以凝聚人心、振奋精神，形成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信念，与共同的价值追求，且可促进民族优秀文化的弘扬，以文化人，提升人的思想境界，足以培育造就福智双全、人格高尚、赤胆忠心、为国为民，并具牺牲奉献精神、坚忍不拔毅力，以利乐天下苍生为己任的圣贤豪杰、仁德君子，感召引领民众百姓、信徒信众、传法弟子，以慈悲的理念，务实的心态，坚定的信念，不懈的修持，积极的事功，捐弃前嫌、认祖归宗，实现祖国统一，并为此作出积极的贡献，共同续“公”慧命，服务社会、回报社会，促进文明进步，人类向上，和谐发展，永恒真爱，福祉绵延。

3. 济公精神、佛学思想为社会道德、人格品质的引领、指向。现代社会无处不充满功利、充满竞争，不少人在享乐主义、拜金主义、个人主义的诱惑下，在纸醉金迷、灯红酒绿，养尊处优，或东扯西拽、掩南遮北、你争我夺中荒芜了精神田园，迷失了人生的航向；也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人们的生活压力增加，情绪不安，且会遇到种种的不如意之事和桩桩的坎坷挫折等，诸如命运之有别，机遇之不一，人与人不能相称、不能相等、不能平衡？诸如天灾人祸，本人或者亲朋好友的疾病、痛苦、死亡等，与目前人口的老年化趋势，老年抚养率上升，长者认知活动能力衰退，或长期患疾，还有单亲家庭愈来愈多，问题儿童大量产生，与年轻一代观念新颖，喜欢过两人世界，不愿照顾父母，甚至不愿培育下一代，每因意见争执，或利害冲突，时常翻脸无情，婚姻触礁、家庭破碎、子女前途毁弃、社会秩序破坏，以及当下私利泛滥，人情冷漠，良知泯灭，老人摔倒无人扶、两岁女童车撞倒地奄奄一息，十八路人见死不救，等等、等等。尤其需要济公精神、佛学思想予以感化、教化、净化，倡导慈悲为怀，乐助他人，回报社会，扶危济困，服务民众，用自己的真诚付出，担当起为人的社会责任，在体验自己幸福人生的同时，不忘周边那些仍生活于困顿的人们，推动整个社会救助，给弱势群体以实际的利益，唱响人间大爱，营造行善氛围，使之成为一种趋势、潮流，帮助人们消除恐惧，疏解普遍存在的心理危机，从而起到心灵抚慰、稳定情绪，求得心身之平衡。

诚然，相对国家、社会而言，家庭乃细胞组织，责任之开始，夫妇为家庭的骨干，人伦

之启航。家庭的和谐与否，与社会和谐息息相关，父母、夫妇、子女都有责任。济公精神、佛学思想能够引领人们带头负起佛化家庭的责任，以八正道作为共同遵守的德目，正见、正思惟、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从而做到思想纯正，伦理高尚，行为端正，无不良嗜好，尽力防止灵魂深处产生邪念，使身口意三业向善靠近，自行化他，为国家、社会、人民作出贡献。故济公精神、佛学思想，对安定社会秩序，消弥潜在乱源、化解社会矛盾于萌芽状态，促进社会风淳俗美，挽回世道人心等方面所起的作用，远超一般的社会意识形态感召。

4. 济公精神、佛学思想为是非曲直、善恶美丑的考量标尺。当下社会，贫富两极分化，贵贱反差强烈，阶级、阶层对立明显，有钱人雇工剥削，贫弱者打工挨宰；财阀可以站到别人的头上，用别人的屈辱换取自己的尊荣，用别人的痛苦换取自己的享乐，用别人窄难容身的空间，换取自己富丽堂皇的华屋豪宅。还有，官员道德沦丧、贪污腐败前赴后继，已是一大公害，名人（明星）移居国外（境外）成为时尚，数典忘祖、偷税漏税视之本事，搞科学的不如唱唱歌的，干实业的不如耍嘴皮的；全球顶尖的80位富豪拥有世界财富的一半左右，内地10%的家庭拥有国内财富的87%，畸形的分配模式似乎已让社会失去前进的动能，加剧了人们心态的不平衡。不过，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每个人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有乐于助人的好人，也有无恶不作的坏人；有天才，也有虚度年华的庸才；有忠诚，也有奸诈；有挚热永固的亲情、友情，也有“狗面生毛”，翻脸不认人的绝情、无情；有执着，也有放弃；有光明的现在和未来，也有一时的沮丧和失意；有衣不遮体、食不裹腹的穷人，也有西装革履、大腹便便的禽兽；有处世狡诈阴险，不择手段之“曲”，也有雷厉风行，率真不讳之“直”。谁是谁非？谁忠谁奸？谁善谁恶？谁美谁丑？白日青天，朗朗乾坤，济公精神、佛学思想，都会适时适地对“小人”、奸佞、权贵，地痞、恶棍、禽兽，不时发出当头棒喝，促使其惊心猛省，静夜忏悔，改恶从善，光明做事，清白无污，合道则进，非道则退，修身悟道，庶免死后堕落幽冥，受阴差恶鬼之凌辱惩罚；如不思悔改，则诚如清福州侯村老人的《十无益》格言所谓，“存心不善，风水无益；父母不孝，奉视无益；兄弟不和，交友无益；行为不端，读书无益；作事乖张，聪明无益；心高气傲，博学无益；为富不仁，积聚无益；巧取人财，布施无益；不惜元气，服药无益；淫逸骄奢，仕途无益。”不时引领民众百姓、信徒信众擦亮眼睛，与恶人坏事、违法乱纪行为作坚决斗争，并依法、依律予以无情打击，“超度”其来世堕入恶道，沉溺苦海，不得翻身，从而伸张社会公平、天道正义。济公的慈悲除暴、济世安良的大公无私之心、之行，永远和民众百姓站在一起。他之所以被后人神化为罗汉、菩萨、仙真、活佛、天尊，神通叵测，法力无边，无所不能，那是因为作为弱势群体的民众百姓，希望有这样一个正义与真理的形象化身。故在中华佛教莘莘芸芸的高僧中，唯有济公的诙谐、“颠狂”，与唐僧的正经、呆板，于民间的影响最大、传颂最广，可谓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晨钟暮鼓警醒世间名利客，经声佛号唤回苦海迷途人”。济公精神、佛学思想昭示，任何形态的宗教信仰，都必须于众生的关系中，即与民众百姓为依、为救、为归、为趣、为炬、为明、为照、为导，各尽所能，各显所长，服务社会，尽力报答国家、民族、人民的关爱，致力消除不平等现象，构建人类永久和平，不断增进人民福祉，通过人的道德劝化，心灵净洁，善行倡导，淳正世风，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共生。离开人类社会的实践，脱卸应负的社会责任，既不能成就佛果，也无法飞升“天国”，自也难了生死，难以圆满涅槃。所以，济公精

神、佛学思想不但没有过时，且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正能量，甚为现代宗教发展的目标指向。

四、济公信仰之传播

济公信仰因其精神主旨与佛学思想，贴近民众百姓的思维认识、生产生活，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政治社会背景下，皆具普遍的适用价值。故自明清以降，就为传统释道二教以外的其它教派所吸纳。在地域空间上，以大陆内地、台港澳地区，东南亚国家的传播较为集中，并已面向世界，拓展全球；在教派的种类上，主要敷布于历史上的中国济生会、梵天极乐宗、理教、义和团、皈一道、一贯道、同善社、天德教、德教等教派，现代则以一贯道、德教、理教、天德教、轩辕教、天帝教、康济会、圆玄学院、东井圆佛会等教派的传播，影响较大。

（一）大陆内地的传播

大陆内地释道二教以外的济公信仰，以天台济公故里、中国济生会、梵天极乐宗、理教、义和团、皈一道、一贯道、同善社、天德教、德教等教派较具代表性。

1. 济公故里。继南宋嘉定十四年（1221）净慈寺的“济颠禅师石刻像”供奉，与明代前的“济公辞世偈言碑”刻植，及淳佑七年（1247）前后，天台上清宫道士陆大伦于赤城山立“济公祠”祭祀，标志济公信仰之源头发端。明永乐年间（1403~1429），民众百姓又于永宁济公李府遗址建“济佛院”，规模为正殿五间加若干附属披屋，供奉济公及其弟子雷鸣、陈亮像，前后各有天井，围墙上书“济公遗址、活佛祖庭”八个大字。民国十六年（1927）稍后，剃度杭州虎跑寺的弘一大师，因思念道济天下，舍利入塔虎跑，且与自己同一俗姓的济公，悉闻永宁济佛院大修重光，甚是欣慰，特书“佛法无边”四字，托人送至天台，济佛院即加工成匾以挂。修葺后的济佛院，香火鼎盛非常。民国二十年（1931），济佛院鸾坛开乩，“济公”释忧疑、卜吉凶，诊病配药，影响迅速扩大，与塔葬济公舍利的杭州虎跑寺一起，成为江南地区民众百姓、信徒信众、传法弟子，朝觐济公活佛的两个丛林中心。抗战时期，国共两党人士组成的政工队第二区队驻扎永宁“济佛院”，并在院厝奉抗战捐躯的天台籍烈士灵位，以使英魂在活佛的庇佑下，听经闻法，往生净土。

明万历年间（1573~1620），天台民众百姓又于城北沙坑建“永宁庵”，供奉、祭祀济公。民国十五年（1926）三月，天台知事李锦枚与乡贤裘炳涛（了真居士）、陈立仁、朱福履等，效法中国济生会模式，在城西古泉亭庵（铺前村）成立“济公会”，李亲任会长，于赤城山紫云洞设立乩坛。民国十六年（1927）四月，成立天台济公慈善总会，通过“济公”的扶乩劝捐，赈灾、济贫、助医、助孤、助残、义葬等慈善活动有序开展。同期，裘炳涛出资，对赤城山瑞霞洞予以拓宽，塑济公及其弟子沙弥、达悟像，紫云洞乩坛移址是洞，以“济公”为主体的降鸾扶乩实录辑编成《清夜钟声》一书，上卷由天台丽美石印社出版，下卷由海门沐浴源石印局刊行。

在天台济公故里的济公信仰影响推动下，临海、黄岩、温岭、仙居等地与江南诸省，纷纷效法设立济公乩坛，开展济公慈善活动。甚为遗憾的是，1958年前后，“大跃进”运动风靡天台，永宁济佛院被拆建改作消防队，济公故里的济公信仰随之中止。

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逐渐得到落实。1981年3月5日，昆剧《济公三戏花太岁》于上海劳动剧场演出，3月26日《解放军报》发表张绪的《济公一剧引出社会热烈争论》文，1985年游本昌主演的《济公》于银幕、荧屏播出，部分佛教寺庙、道教宫观重塑了济公金身。1984年2~3月间，客居上海的天台籍离休干部齐树铭乘回乡扫墓之机，向中共天台县委、县人民政府提出“在赤城山旧址重修济公庙”的建议；1985年5月，县人大代表张祺珍、朱辉等，在县人大八届二次会议上提出“在赤城山旧址重建济公庙”议案。1986年，经县委常委会碰头，县长办公会议研究，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分别印发天政办（1986）41号文、天政办（1986）10号《县长办公会议纪要》，同意“在规划赤城山风景点时，将整修‘济公院’计划列入”，决定“济公院的规划、设计、施工及经费筹集，由风景园林旅游管理局会同有关部门去搞”。经县旅游局与老人协会的努力，赤城山济公院重建工程于1987年8月17日正式开工，至1988年9月13日一期工程竣工，济公故里的济公信仰开始得以恢复。

世纪之交，天台赤城路建设指挥部指挥余云安、济公故居建设指挥部指挥王明德先后领衔复建济公故居。2004年上半年，泰国华侨慈善家蔡卓明先生并夫人刘惠珍女士，获悉复建的故居济佛殿即将落成，特捐赠济公白玉立像一尊。随济公故居的复建落成，与故居济佛殿道场的重光开放，济公故里的济公信仰影响逐渐扩大。至2017年年底，济公故居、故居济佛殿已接待朝觐、观光人次达113.7327万（其中台港澳地区、东南亚国家3.6404万），举办各类大小法会3495场/次。

现天台济公故里，除济公故居、赤城山济公院的济公供奉外，还有天台山国清寺、高明寺、华顶寺，赤城街道永宁石墙头济公亭、东门观音堂、下松门济公堂，始丰街道永福庵，福溪街道慈恩寺，平桥镇紫阳宫、青山寺，街头镇寒山明岩寺济公殿、浙□（上“山”下“酋”）玄帝庙，白鹤镇秀岩寺、下陇禅寺、岭根寺、关岭侯王庙，洪畴镇资福寺、宝灵寺、双塔庵，坦头镇东横大觉寺，南屏乡前杨上岩庵济公殿，三州乡天龙寺等也奉祀济公，只不过这些场所，其中很多是被冠以所谓的“民间信仰”登记罢了。

2. 中国济生会。1915年，浙江富阳济公鸾堂恒济坛与杭州吴山永济坛，始于上海设立集云轩，作为开展济公信仰活动的据点。民国五年（1916），上海集云轩奉济公为宗师，根据济公的出世入世、慈悲济世理念，集合绅商居士，创建以济公扶乩信仰为主要内容的佛教慈善团体——中国济生会。1918年1月，在民国首任民选总理熊希龄等的支持下，济生会注册取得合法身份；1926~1938年，著名慈善家、佛教居士王一亭荣膺是会长。集云轩、济生会不断组织固本团，于每年的春秋二季朝觐杭州虎跑济公塔墓，自称佛教“南屏宗”，向外布道传教。卢大方的《上海滩忆旧录》称，济生会在当时上海的乩坛中“最负时望”“主坛老祖是济颠僧”。清末主甘肃、云南学政，民国后迁居上海，居家学佛，以遗臣自居的叶尔恺，1939年称济生会乩坛“坛方开谕不下百万号”“皈依弟子不下万人”。内档反映，1931~1937年间，是会共筹洋1480659.6元、银782922.38元、法币198151.12元，用于慈善救助。尤其是1932年1月28日晚，倭寇侵略上海，我十九路军将士奋起抵抗。济生会组织“白十字救护队”，救护战地负伤将士600余人，灾民4000余人；开办“伤兵医院”，收治伤兵120余人；并于上海、苏州设立“难民收容所”11处，救助难民25000余人，收容难民2000人以上。1937年“8·13”抗战，是会亦开办三处“收容所”，救护了大量的战地负伤将士和难民。1934年，九世班禅额尔德尼·曲吉尼玛访问上海，济生会

（集云轩）专派代表至车站迎接，并与中国佛教会、世界佛教居士林、上海市佛教会、佛教净业社、佛教西方莲华会与密云精舍一起，以上海佛教七团体之名义在觉园公宴班禅，额尔德尼向济生会（集云轩）捐银 500 元，赠刻“南屏正宗”汉藏文字合璧石印一枚，并亲为《济师塔院志》作《南屏正宗序》^[12]。1949 年 5 月，上海解放，济生会因经费筹措困难，将慈善救助活动压缩至沪上一隅，1950 年初在反迷信浪潮中退出历史舞台。

3. 梵天极乐宗。是宗为佛道双修，隐世之派，明代创立，教庭位陕西秦岭以西的武功、蓝田县境的终南山，奉济公为“上清天祖师”，地位仅次“太清天祖师”老子、“玉青天祖师”李淳风。内档介绍，梵天极乐宗开派，是乃天梵真人和极乐圣师在深山古洞中发现老子、李淳风、济公三祖师的手录古籍，互相切磋交流，历时二十余年研创佛道双修之法。真人、圣师共收一徒林天龙，为是宗的第一任宗主。林宗主不断吸收佛道二教之长，并予以修正融合，但终因二者有别没有完全实现，交代后世宗主，定要将佛道二教合而为一，创制出佛道双修的旷世功法。按照林天龙宗主之要求，历任宗主皆以探索佛道合一修持为本宗的奋斗目标。民国时期，大和武士入侵，第十三任宗主率全宗弟子奋起抵御，死伤殆尽，只剩几个传承道统弟子，从此一蹶不振。辅之其它原因等，是宗传至今天，宗主已是第十六任，仍然没有大的影响。

4. 理教。是教又名在理教、理门、理善会、白衣道、八方道等，为明崇祯癸未（1643 年）进士、山东即墨的羊宰（也作扬莱儒，教内称羊祖）于清康熙中叶创立。早期具有明确的反清复明思想，五字真言为：“反清复大明”（也作“复明灭大清”）；教义主张三教归一，以佛教信仰中的观音菩萨为最高神灵，以道教的内丹修炼为主要功夫，以儒家的“五伦八德”为教义核心，强调“性命双修，内功外果”，通过“正心修身”的内圣之道，达到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的尧舜境界。随清政权的日益巩固，反清复明的政治意识逐渐淡化直至消失，因之改五字真言为：“观世音菩萨”。理教之所以尊奉济公为主要神祇之一，可能与藏传佛教素视济公为观音菩萨化身，及教义亲近佛教有关。乾隆三十年（1765），尹松岩（也作尹来凤，教内称尹祖）与弟子赵名山等，在天津城西永丰屯建立理教第一个公开活动居点——积善堂公所（史称“西老公所”），并以天津为大本营传教。清末，发展成为遍布南北的大教派，维新志士、“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也于变法（1898 年 6 月 11 日~1898 年 9 月 21 日）前加入理教，探究其如此盛行之奥秘。1933 年于上海成立“中华全国理教联合会”，1934 年得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和内政部的核准备案，但实际没有统一全国理教组织，所属公所主要活动于沪、津两地。因为在此之前，北平与南京分别已有两个标榜全国性的理教组织存在，前者为李毓如、谢天民、赵秉钧等发起，成立于民国二年（1913）的“中华全国理善劝戒烟酒总会”（北洋理教）；后者为鹿鸣等发起，成立于民国八年（1919）的“中华理善劝戒烟酒总会”（南洋理教），民国十九年（1930）改称“中华理教拒毒同志会”。民国二十四年（1935），南京王有才、秦钟灵等再次发起组建“中华理教总会”，得国民党中央执委民运指导委员会的支持，1936 年民指委要求各省市党部负责理教团体的“一律改组”工作，各地方才成立分会，膺服其管辖，“中华理教总会”由此成为全国性的理教组织。理教不强调偶像供奉，公所中除供圣宗（观音）与羊祖、尹祖像外，不奉其它神像；具体戒律有不吸烟、不饮酒、不烧草香、不焚纸帛、不拜偶像、不吹打念唱、不书写符咒、不养鸡猫犬等八项，其中以不吸烟、不喝酒两项最为主要，同时要求信徒孝顺父母、和睦乡里，戒杀、贪、淫、妄，只准行善，不许作恶等；经典有《忠经》

《孝经》《观音经》《黄庭经》《心经》《金刚经》《道德经》《无字真经》《参经》等。抗战时期，北京理门首领谢天民等勾结日寇，成立所谓的“中国理教总会”，成为历史上一件不能抹去的不光彩事件。解放战争期间，边区政府视理教为迷信组织，曾对其实行查禁政策，没收财产，勒令教徒退教等。1949年解放后，人民政府对理教的迷信组织定性不变，对其采取了相对谨慎的不取缔、不支持态度，使其自身陷于一种无名无分的尴尬境地，终在整个社会的声势浩大的反迷信浪潮中，不断萎缩、不断衰落，遂于1957年自行宣布解散，在大陆内地退出历史舞台。

5. 义和团。19世纪末叶兴起的义和团，举旗“扶清灭洋”，尊奉济公为佛祖，其开坛请神咒语谓：“天灵灵，地灵灵，奉请祖师来显灵。一请唐僧、猪八戒，二请沙僧、孙悟空，三请二郎来显圣，四请马超、黄汉升，五请济颠我佛祖，六请江湖柳树精，七请飞标黄三太，八请前朝冷于冰，九请华佗来治病，十请托塔天王，金吒、木吒、哪吒三太子，率领天上十万神兵。”在义和团的揭帖、告白、歌谣、乱训中，还有光绪二十六年（1900），“济公”铁骨铮铮的《降坛诗》留传于世，“岁次庚子年，……天下奉教多，不把情理说，欺天子，灭神佛，拆庙宇，免香火，舍善书，反理说，总要把国谋，问人晓得莫……那里有人才，一般脏与污，竟把清朝弄坏。不料洞门大开，吾等暗使文武才，感动人心枪刀排，扶保大清不坏。可喜之才不受害，官败民不败，自带口粮来，除国之大害”（现代蒋世弟、吴振棣《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

6. 皈一道。是教又称天仙道、老子圣人佛、三圣教、三佛教等，个别地方称“太阳道”，为清道光年间（1821~1851），山东平原“拔贡”赵万秩（号复存，别名赵纯一，道号赵皈一，自称“普度佛”，教内尊初祖、复阳帝君），承继清初先天道道统创立的以“三教皈一”为宗旨的教派。赵将儒家的孝道仁义道德，佛教的善恶相报、生死轮回，道教的修炼成仙杂糅一起，形成教义，于山东各地与河北、东北等地传播。皈一道供奉儒家的神明有至圣孔子、述圣子思、复圣颜回和朱熹等，供奉佛教的神灵有释迦牟尼、弥勒古佛、燃灯古佛、济公活佛、观音菩萨、地藏菩萨、普贤菩萨、达摩老祖等，供奉道教的神灵有老子、纯阳帝君、文昌帝君、泰山圣母、重阳真人、紫阳真人、李拐仙、何仙姑、普济真人，及北斗、南斗星君，关圣帝君、灶君、土地等。主要经典有《登仙梯》《传家宝训》《三教正宗救劫宝筏》《救急文》《归一宝训》《渡世慈航》《高王观世音菩萨真经》等，《济颠僧训》入编皈一道宝卷、乱训汇编。1945年下半年平原县解放，边区政府对皈一道实施打击，1951年被人民政府取缔。

7. 一贯道。明清时期，新兴宗教活跃。山东即墨罗清（字梦鸿，也作蔚群，号思孚、无为等）以自己口述，徒弟记录的《苦功悟道卷》《叹世无为卷》《破邪卷》《正信宝卷》《泰山宝卷》，创立罗教，几乎所有的民间教派都受其影响，尊罗为“祖师”。之后，罗教分化为多种教派，一贯道乃其中的一支，缘由山东青州王觉一，著《三易探源》《一贯探源》等，于同治十二年（1873）创立“先天无生老母教”，不久改名“末后一着教”，标榜三阳信仰。光绪十二年（1886），山东青州刘清虚继承道祖，取《论语》的“吾道一以贯之”，改称“一贯道”，拓展全国各地。民国三十年（1941），受《皇母训子十诫》影响，增称“天道”，其后两名并用，延续至今。

一贯道称开天辟地有青阳、红阳、白阳三期。青阳期，燃灯古佛治世，道运东方，五行属木，故曰青阳；红阳期，释迦佛治世，道运南方，五行属火，故曰红阳；白阳期，弥勒

佛住世，善法治世，理在道运，由南转西，五行属金，故曰白阳。当世正处白阳期，法界破除一切古经旧典、迷信，以善为法，以恶为戒，以人为宗，以修心为本、为根、为正，故须藉祈祷、忏悔、戒杀，并持斋吃素，口诵“无太佛弥勒”五字真言，以求得渡。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刘清虚弟子山东济宁路中一（道号“通理子”，传为文盲）自诩己为弥勒菩萨化身，于青州领受天命继承道统，道亲尊其为白阳期初祖，或称路为“金公祖师”。教仪先是以儒教为中心，主张儒、释、道三教合一，夹杂古老的讖纬图说，与降鸾扶乩典仪等，道术色彩颇浓；进入民国后，增益主张宇宙真理因所处的文化圈不同，表现为儒、释、道、耶（基督）、回（伊斯兰）五教，变三教合一为五教合一的宗教形态。

民国十九年（1930），道士出身的山东济宁张光壁（又名张天然，教内尊济公活佛，救劫菩萨）以济公道统接任一贯道，在济南设立中枢坛，并建金刚、敦仁、礼化、天一四大坛，并以 20 世纪二十年代产生的乩书《洞冥宝记》^[13]为传道著作，四方发展，在各省建总坛，下设分坛，管理各地道务，形成全国网络。有学者研究，鼎盛时期，一贯道有道亲 300 万以上，当非虚言。因之，引起民国政府并蒋介石的注意，1936 年召张软禁于南京，在其承诺归顺后解禁。

一贯道的中心主神为“无量清虚 至尊至圣 三界十方 万灵真宰”的明明上帝（即无生老母，为古代女神形象，集创世主、人类祖先、救世主于一身），与儒教的维皇上帝（套用《诗经》，意为“天帝”）、佛教的大日如来（统率佛和菩萨的根本佛，代表绝对真理，也作摩诃毗卢遮那、毗卢遮那、遍一切处、光明遍照等）、道教的无极圣母（自创名号，意为女娲）同一，之下的神灵体系为：

①东方前十八代，依次即伏羲→神农→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唐尧→虞舜→夏禹→商汤→文王→武王→周公→老子→孔子→颜回→曾子→子思→孟子。

②西方二十八代，依次即释迦牟尼→摩河迦叶→阿难陀→商那和修→优婆鞠多→提多迦→弥遮迦→婆须蜜→佛陀难提→伏驮蜜多→肋→富那夜奢→马鸣→迦毗摩罗→龙树→迦那提婆→罗喉罗多→僧伽难提→伽耶舍多→鸠摩罗多→闍夜多→婆修盘头→摩拏罗→鹤勒那→师子→婆舍斯多→不如密多→般若多罗。

③东方后十八代，依次即达摩（初祖）→慧可（二祖）→僧璨（三祖）→道信（四祖）→弘忍（五祖）→慧能（六祖）→白马（七祖）→罗蔚群（八祖）→黄德辉（九祖）→吴紫祥（十祖）→何了苦（十一祖）→袁退安（十二祖）→徐杨（十三祖）→姚鹤天（十四祖）→王觉一（十五祖）→刘清虚（十六祖）→路中一（十七祖）→张天然（十八祖）。

一贯道的经典分“无字真经”与“有字真经”两种，前者系由明师口授心印，不著文字，如《九节内功口诀》《雷庵经》《五字真经》等；后者有文字记录，主要为《愿忏》《万年归宗》《太和堂书帖》《三易探源》《一贯探源》《弥勒救苦真经》《暂定佛规》等。教义主张人类要“归根”，就是要藉修道方式回到无生老母的身边，以避“三期末劫”之来临。无生老母慈悲，三曹普渡（上渡河汉星斗、气天诸仙，中渡人间芸芸众生，下渡地府幽冥鬼魂），以期无极理天降生于娑婆世间为万物之灵的 96 亿先天佛子（九六原灵），脱离情欲名利的迷恋，四生（胎生、卵生、湿生、化生）六道之轮回，生死苦海的逐流，返回无极理天。提倡把“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落实于日常生活中，强调以广度众生为第一要务，肯定各教的“因果报应”“业力轮回”，独创“玄关窍、抱合同、念真经”三宝并用之说。所谓之玄关窍，即玄关是生死的门户，神机藏于“窍”中；所谓之抱合同，即

以左右手互按相抱置于胸前的手式，象征无生老母为唤回儿女，手抱孩儿之意；所谓之念真经，即真经是道亲得道升天，也是遭逢厄运时可以转危为安的口诀。藉此顿见道心，明心见性，涵养功力，返本归元，再待上天命弥勒祖师设“龙华大会”时，按功定果安排道亲在无极灵界的品位。主要仪式为作揖、献香、叩首、默念愿忏文四项，奉关、诀、印为修持三宝。所谓之关，即人的灵性出入口，道亲去世归天灵魂从此而出；所谓之诀，即前述五字真言“无太佛弥勒”；所谓之印，即“子亥手”，象征“白阳佛子”抱持赤子之心，将来与无生老母团聚。

抗战期间，“一贯道”将大量的汪伪政府官员发展加入组织。如中央税警团团长李丽久、军事委员会委员孙祥夫、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褚民谊、考试院院长王揖唐等，均在“道”内担任高级职事。东方后“十八祖”张光璧，亦充任汪伪政府的外交部顾问之职。1946年，国民政府社会部曾联合内政部，公告各地取缔“一贯道”，并以“汉奸罪”对该教发起诉讼，但最后不了了之。

1947年，张光璧暴毙四川成都，是道分袂两派，一派以张之妻刘率贞与其子张英誉为首，以杭州为基地，称“明线”（又称“东派”“师兄派”“正义派”），主要活动于上海、南京、济南、青岛等市，及东北、东南沿海地区；一派以张之妾孙素真（也作素珍、素贞，教内尊“中华圣母”）为首，以成都为基地，称“暗线”（又称“西派”“师母派”“金线派”），主要活动于北京、天津、河南，及西南、西北等地，在华东也有一定影响。1950年10月，一贯道被人民政府取缔。

8. 同善社。同善社创立于民国元年（1912），以四川永川（今重庆永川）秀才彭汝尊为师祖（教内称“统道师尊”“回龙师尊”“南无清静自在无极燃灯佛”，主要著作有《指破五十大魔关》《百字训》《劝孝歌》《普度语录》等）。1917年得北京政府批准创立，以总统曹锟和国务总理段祺瑞为“护法”。短短10余年，发展迅速，自号拥有道徒3000万，1925年在汉口成立“合一会”，作为统摄全国的首脑机构。教义自诩“万法归一”，宣扬“用儒教之礼节，做道教之功夫，而证释教之果位”，也以《洞冥宝记》为传道著作，主张多神崇拜，以“无生老母”为宗主，兼拜弥勒、释迦、阿弥陀诸佛，玉皇大帝、文昌帝君、济公、孔子、老子、吕洞宾、关羽、张飞、灶君等神明、圣贤；主要经典有《了道经》《佛堂规则合编》《续定佛规》《同善社章程》《回龙师尊普度语录》等。由于同善社与北洋政府关系密切，民国十六年（1927）北伐军下令取缔同善社，彭汝尊的活动有所收敛。民国二十年（1931）“九一八”事变后，倭寇利用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彭认为弥勒古佛转世的“真命天子”登基了，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派次子宝善潜赴长春，晋见溥仪表示拥戴，尊溥仪为弥勒佛，并许愿组建几百万的“神兵大刀队”，为溥仪入关复辟效力，因之得到溥仪的嘉奖，授彭汝尊教主名号。民国二十六年（1937），蒋介石下令逮捕彭，但被侥幸逃脱。1951年，同善社被人民政府取缔。

9. 天德教。为四川乐至的萧昌明（自命“三才教主”，教内尊“佛王降世”）于民国十六年（1927），受国民党湖南省主席何键、军阀阎仲儒、王雅之等人的支持所创，宗旨取儒之忠恕、释之慈悲、道之感应、耶之博爱与回之清真，合为“忠、恕、廉、明、德，正、义、信、忍、公、博、孝、仁、慈、觉、节、俭、真、礼、和”二十字，以“慈悲救人，教人为善”为教义，以正己化人，报国淑世，倡导宗教大同为使命；以萧口述的百余万言记录稿《德藏经》（1986年弟子秦淑德等结合其它文献，将其汇编成四类八部二十八卷）为基本

经典，分经、律、论三藏与行品；主要戒条有：戒不敬天地、戒不孝父母、戒不睦手足、戒抛撒五谷、戒吸食鸦片、戒赌博乱淫、戒挑拨是非、戒借道敛财、戒明瞒暗骗、戒不信不爱、戒好酒贪杯、戒不信圣训、戒巧装异服、戒放荡形骸、戒不守二十字、戒毁谤神祇。认为佛法平等，故不专供一佛，坛场内只供观音大士圣像，又以横宽五尺五寸或九尺九寸、纵高三尺三寸或五尺五寸之黄色棉布挂于壁上，称“光布”，代表三十三天。入教者经导师指点，打坐修持，言称可在“光布”上看到“宇宙之光”的“神谕”传达。要求传法弟子、信徒信众早晚诵前之二十字经，以修持身心。1930年以“南京特别市宗教哲学研究社”名义向南京政府申请备案。天德教所以尊奉济公，乃该教是以各教之成法与精神为宗，师法人类过去之仙佛圣贤及一切伟人；台湾桃园崇心杂志社的《大道天德》，其中之《序》与《跋》，皆是“济公”扶乩所书。1930年，萧昌明印行《人生指南》一书，蒋介石为之题词“修身养性”。1933年底，天德教成立“上海特别市宗教哲学研究社”暨“东方精神疗养院”。民国二十五年(1936)，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发现萧昌明有“以教治国”的政治企图，国民政府行政院遂通令全国取缔“天德教”，封闭“宗教哲学研究社”总社与各个分社。萧迁总社至安徽黄山，建芙蓉居，改头换面秘密指挥各分社活动。1949年4月黄山解放，天德教被解放区人民政府取缔。

10. 德教。是教于20世纪30年代由广东潮阳的杨瑞德，以关圣帝君甲子年(1924，另说1864)受禅登极“玄旻高上帝玉皇大天尊”(也作“玄灵高上帝玉皇大天尊”)之乩说，1939年通过沙盘柳笔的圣谕传达，首创紫香阁于潮阳。德教的活动场所称“阁”或“社”，宗旨为儒之忠恕，道之崇德，佛之慈悲，基督之博爱，伊斯兰之慈恕，以1942年5月22日，“关平少帝”受其父玉皇大天尊关圣帝君敕旨，降鸾汕头“紫和阁”挥沙写出的《心典》^[14]为主要经典，以“以德教民，积善累德”为立教之本，拯救众苍生之末期浩劫；教义主张儒、释、道、耶、回五教同宗，诸教归一“德”，倡导“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智”十章，以不欺、不伪、不贪、不妄、不骄、不怠、不怨、不恶为八戒则，昔在汕头亦曾创办过善堂和学校。是教以降鸾扶乩为特色典仪，进而与仙佛师尊感应交流，儒释道耶回各教的仙佛师尊，及潮汕地区的各路神明都被纳为崇拜对象，都能被恭请前来降鸾指示。诸如，询问疾病有华陀祖师和白云道长，风水有杨乩松和何野云，超度有观音菩萨和大峰祖师，诵经有济公活佛，教育有至圣孔子等。新中国建国后，德教被人民政府取缔。

(二) 台湾地区的传播

台湾地区的济公信仰，始于清光绪七年(1881)，浙江部队增兵台岛，奉济公为守护神，随军浮海登陆传入，开始多为私人或家庭奉祀。民国三十五年(1946)六月，台南市万福庵陈厝出现第一家济公坛堂(乩生俗名“詹万”，法号“悟道”，为今台北市虎林街灵源寺之前身)。1949年，退逃台湾的国民党政府颁布《戒严令》，自当年的5月20日起对台全境实施戒严，至1987年7月15日解除，时间长达38年56日。戒严期间，当局对佛道耶回等传统以外的宗教皆实行限制政策，致使诸多本来相对独立的济公寺庙、宫观、堂坛、阁社、团体为求生存，变通“挂靠”佛道二教，主要寄居道教登记注册，并成为一种习惯延续至今，可谓济公信仰发展中的一个特殊例外。

目前，台湾没有“挂靠”佛道二教的济公信仰，主要敷布于：

1. 一贯道。约于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由大陆内地传入，相关的佛堂基本都是以秘密形

式存在。1949年新中国建国后，对一贯道以反动会道门实施取缔，教派的部分人员辗转于此，重新发展。1953年，当局以“涉及迷信及妨害地方治安”为由，对其实施打击，但未能完全阻止其进入地下活动。直至1987年台岛进入小蒋时代，在时任“内政部长”吴伯雄的帮助支持、斡旋协调下，终使经国先生和风细雨表态，任何宗教，只要它不违背善良风俗，奉行基本国策，有益于社会人心，都应给予同样的尊重。随之，当局解除禁令，注册登记一贯道为合法宗教。做了三十多年“黑教”的一贯道，终于漂白身份，登上台岛宗教的大雅之堂，与国民党政府一笑泯恩仇。

现台湾的一贯道，以“敬天地、礼神明、爱国忠事、敦品崇礼，孝父母、重师道、信朋友、和相邻，改恶向善，讲明五伦八德，阐发五教圣人之奥旨，恪遵四维（礼、义、廉、耻）纲常（三纲五常）之古礼，洗心涤虑，藉假修真，恢复本性之自然，启发良知之至善，己立立人，己达达人，挽世界为清平，化人心为良善，冀世界为大同”作口号，发展迅速，影响不断扩大，并流传香港、澳门，触角伸展国外。1995年9月柬埔寨一贯道总会成立；1996年10月美国洛杉矶一贯道总会成立；2000年3月泰国一贯道总会成立，6月印度尼西亚一贯道总会成立；2003年12月马来西亚一贯道总会成立；2006年4月美国一贯道总会成立，8月日本一贯道总会成立；2007年4月巴拉圭一贯道总会成立，10月奥地利一贯道总会成立，11月英国一贯道总会成立；2009年9月澳大利亚一贯道总会成立；2011年9月南非一贯道总会成立，9月巴西一贯道总会成立……。

据不完全统计，一贯道现已在世界80多个国家（有文献称100多个）和地区传播。2000年有道场3124个，道亲84.5万人，另有学校34座，医疗机构29所，出版社30家。近几年，以师兄派（明线）、师母派（暗线）为主的传道组织，“效益”非常显著，形成层级裂变的发展态势。目前，仅本岛就有道亲近400万，列27种宗教之第三位（《中文百科在线·台湾宗教》称25种，即佛教、藏传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回教、理教、天理教、轩辕教、巴哈伊教、天帝教、一贯道、天德教、摩门教、真光教团、统一教、亥子道宗教、儒教会、太易教、弥勒大道、圣教总会、宇宙弥勒皇教、先天救教，黄中、山达基宗教），全球道亲估计已超1000万，成为事实上的“准世界性”大教。

台湾高雄六龟乡的一贯道神威天台山道场（又名天台圣宫），隶属一贯道二十四组线（也有作十九组线，即基础、文化、法圣、乾一、天祥、金光、天真、慧光、浩然、中庸、安东、宝光、明光、浦光、常州、法一、兴毅、阐德、正义辅导委员会）中的“宝光建德”道场，为亚洲之最大，占地375公顷，耗资五十亿新台币，于2008年12月27日竣工落成。道场内设当局教育主管部门核准成立的天皇学院，以开展道学研究与人才培养；道场园区伫立高4.95米，由青斗石雕成的四面济公圣像，代表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及对四方的眷顾；主体建筑为前白阳圣殿、中祖师圣殿、后皇母圣殿，还有道亲大楼、宗德馆、土地公庙、□乡圣域（“中”字之“口”内加“丿”，“丿”间以“丨”贯通“口”字中分）等建筑。白阳殿供弥勒、济公、关圣、月慧菩萨、孚佑帝君等；祖师殿中供金公祖师（路中一）、天然古佛（张光壁）和中华圣母（孙素真），旁供六十四祖师（东方前18代祖、西方28代祖、东方后18代祖）；皇母殿供明明上帝，中央以神龛造型，竖立金碧辉煌高20米的二十字神碑，气势宏伟，四周壁面安奉10800尊弥勒金佛，象征白阳应运，时时刻刻都有光明指引，天降大道，众生普渡。

基于海峡两岸“血缘同源，圣脉同宗”，及随大陆内地的传统文化复兴，一贯道早已将

“道弘神州”“老水还潮”视为“接绪道统”的关键，以快餐式的“读经班”“国学班”等形式，直接在大陆内地，或者通过香港、澳门基地“中转”等方式，积极向内地传道，范围几乎涵盖所有省份。目前，广东、福建、浙江、上海一带受过培训或转培训的潜在“道亲”，估计已达100来万。

自上世纪90年代伊始，台湾一贯道频频向大陆内地抛出橄榄枝：

一是参与慈善赈灾。自1991年以来，大陆内地发生重大自然灾害，就有一贯道道亲以个人名义捐款；2008年汶川地震、2013年雅安地震、2014年鲁甸地震，一贯道亦向大陆内地捐款、捐物赈灾。

二是开展文化交流。以各种便利名目，出席湖南长沙两岸经贸文化论坛、福建厦门海峡论坛。2009年8月23~24日，由台湾一贯道总会、华夏文化交流协会举办的“近现代中国民间结社学术论坛”，在一贯道神威天台山道场举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卢云峰、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张新鹰等17位内地学者(含官方代表2人)与会。为缓解内地学者或多或少对一贯道存有的戒心，并让学者对现代宗教结社的实际情形有所了解，“论坛”专门安排学者入住道场，参访一贯道道亲经营的烨隆钢铁集团所属的义守大学，与玉山宝光圣堂(道场)。圣堂秘书长王宝宗专设唐宫庭风格晚宴招待，60人组成的国乐团，以内地的“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乐曲开场，终结于台湾的“快乐的出航”，使得与会学者放松原先的紧绷心情，享用美食。2015年9月28日孔子诞辰，玉山宝光道场与福州文庙，亦联合举行海峡两岸祭孔大典。

三是释放“一中”信息。2009年5月28日，台湾“评论通讯社”高层访问团拜会一贯道总会理事长李玉柱。在谈及两岸关系的基本立场时，李表示，历史渊源不能切割，两岸关系不能切割，中华文化不能切割，我们都是炎黄子孙，是一家人。国共两党良性互动，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有利，期待两岸创造一个新的历史机遇、一个更好的发展环境，希望两岸永远和平、和谐，不要自己人打自己人。两岸同是中国人，只因为有海峡才分为两个地方。两岸好好合作，中国人才能扬眉吐气，我们身为中国人应该向这个方向努力，不管将来政治问题怎样解决，在完全解决之前，两岸至少要先做朋友，见面至少要先坐下喝杯茶。一贯道支持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希望两岸永远和平、和谐。

大陆内地的台湾事务机构、世界宗教研究所，与相关的民间团体，香港中评社、凤凰周刊等单位，也为内地能与台湾一贯道开展正常的宗教交流，积极活动。国台办郑立中、叶克冬副主任，与部分地方台办、地方官员、民间代表、专家学者等，参访考察台湾一贯道道场；也有部分内地的地方官员与民间代表、专家学者，参访考察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等国的一贯道道场。香港中评社、凤凰周刊等亦曾正面报导一贯道在台湾与世界的发展状况，建言内地有关方面要以务实的态度看待现在的一贯道；中评社官网还刊发了中台办、国台办综合局局长、海协会秘书长杨流昌的《天道传奇·一贯道在台湾的传播与影响》，是文明确指出：

一贯道在大陆被定性为反动会道门，因为有这道不可逾越的政治鸿沟而不敢研究尚可理解，但对一贯道在台湾的传播与影响，我们的研究也几乎是空白则实在不该。民间宗教不是政治组织，时过境迁，当我们看到昔日摆开战场进行你死我活拼杀的国共两大政党，在六十年后的今天，他们的当代领袖都可以在“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情景下握手言和，在时空已发生重大变化、国家学术研究政策相当昌明的当今社会条件下，我们完全应

该以更加超然的态度重新审视一贯道，加强研究，填补空白，正确处理民间宗教信仰问题，既有宗教理论意义也有社会现实意义。

甚为遗憾的是，内地有关方面似乎对一贯道抛出的橄榄枝，与台湾事务机构、民间团体，相关宗教研究、新闻单位与专家、学者的积极活动、衷肯建言，而无明朗的态度与相应的举措应对。

2. 理教。台湾自日据时代起就有理教活动，后一度停止。1950年，理教以“理教总会”的名义重新登记。1951年，推选圣理哲学博士、国民党少将高参赵东书为教宗（总领正）。1953年，赵创立理教圣理学院，自任院长。1954年，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内政部”拨日本净土真宗留下的台北“西本愿寺”给理教，作为其总公所之居所，并由“国民大会”正式通过议案，确认了理教的宗教地位。1981年，陈志泉继任教宗；2009年，理天心接任教宗一职。有数据显示，现台湾有理教公所78处，传教场所131处，教职人员638人，信徒信众约20万余；办有多种刊物、三家神学院，及幼儿园、诊所等文化慈善机构。

3. 天德教。1949年，随安徽黄山的解放，天德教总社迁香港新界青山，以“天德圣教”之名于港英当局登记。1953年，萧昌明弟子、湖南平江人王笛卿（教内尊台湾开山祖师），由在台的国民党海军上校、理教徒龚家宝申请，一级上将桂永清担保，自香港到达高雄。1965年，王在高雄、台北设立公共道坛；同年10月30日，邀王德溥、赵恒惕、刘峙等64人联名申请“天德圣教”立案登记，未获当局批准，转而筹组“精神疗养研究会”，于1966年4月召开成立大会，推选内政部长王德溥任理事长，并在一些市、县建立支会，附设道坛，吸纳徒众。1974年，王笛卿与王德溥分袂，自立“天德圣教总会”，仍未获准登记，但可自由活动。1975年，王笛卿去世，“总会”由弟子、台南“念字圣堂”住持秦淑德管理。1987年，秦召开会员大会，推选萧楚乔为“总会”新一届理事长，执掌教务行政；自任道监，总管道务。1989年1月，天德教再次申请立案，4月得台“内政部”登记为合法宗教；6月，17家天德教团体集会台北，将“天德圣教总会”改组为“天德教总会”，萧楚乔仍任理事长。1992年8月，天德教总会第二届会员大会召开，萧再次连任。现天德教坛场的圣像供奉，已由原来的观音一尊，增加为观音大士、无形古佛（萧昌明）、圆明至圣佛（王笛卿）三尊。1992年底统计，是教在台湾的坛、堂、宫、殿等活动场所共34处，教职人员103名，信徒19.38万人，辖下设有“天德教公益慈善事业基金会”，并在台南开办《觉明杂志》；至2000年，约有信徒20万人。

4. 轩辕、天帝教。台湾的轩辕教，系由1949年迁台的国民党立法委员、史学家王寒生在国民党要员黄季陆、郑彦、陶希圣、倪文亚等的支持下，于1957年发起创立，自任教首，称“大宗伯”，总部设台北大同黄帝神宫。1974年6月，经当局之“内政部”批准注册。是教信仰昊天上帝，奉轩辕黄帝为宗主，以继承轩辕黄帝道统，恢复中华固有宗教，启发民族魂为目的，以“尊天法祖”为信条，儒墨道三家同源为理论基础，“天人合一”为最高境界，以光大民族文化，净化现实生活，提高精神生活境界为实务；自定使命为：发扬固有宗教，光大文化传统，建立生活范畴，净化现实人生，寻求生命归宿，升高精神境界，普及宗教济世，促进世界大同。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黄帝四经》（《经法》《十大经》《称经》《道原经》），轰动华人世界。王听到这个振奋人心的喜讯，几经周折，通过日本搞到影印件，即夜以继日，呕心沥血，花近四年时间，将其作了翻译，于1976年在台湾龙华出版社出版。王在自书的序言里庄严宣告：“读罢四经，我们认识了修

道之门径，更提高了人生境界。如果我们仍然是懵懵懂懂，那就不可挽救了。纵然再读书万卷，也无济于事。在四千年前，我祖已经打开了宇宙奥妙之门，指出了一条上进大道，今日能读到宝贵经典，是如何幸福！”又云：“黄帝四经出土，如老祖再降人间，这是可幸的，凡是黄帝子孙们，全当雀跃鼓舞。”轩辕教奉行十戒五律，经典以《黄帝四经》，辅之以《大学》《中庸》《礼记》《教经》《墨经》《易经》《道德经》《南华经》《冲虚真经》等。1992年底，轩辕教有宗社18个，教职175人，信徒22万；1997年底，信徒人数下降至13.60万，教职109人；至2013年，有宗社20多个，信徒复升至20万。大陆云南地震，轩辕教也曾筹集100万元新台币，援助灾区。

台湾的天帝教，为道教徒李玉阶于上世纪50年代在天德教的道统基础上创立，1982年正式注册登记。是教谓人间不设教主，李为“天帝驻人间首任首席使者”，代天宣化。以生生不息，体天心之仁；亲亲仁民，仁民爱物为中心思想，也要求教徒奉行“忠、恕、廉、明、德、正、义、信、忍、公、博、孝、仁、慈、觉、节、俭、真、礼、和”二十字真言，号召信徒信众要先尽人道，再修天道，进而修持“身心性命妙道”，达到宗教大同、世界大同、天人大同，宇宙为家之目标。自诩教义内涵“与三民主义思想有融会贯通之处”，当前时代使命为“化延核战毁灭浩劫”“确保台湾复兴基地，实现三民主义和平统一中国”。各级院、堂里，“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子到处可见，孙中山、蒋介石被封为“中山真人”“中正真人”。1990年台湾“总统”选举前，李玉阶在报上刊出大幅广告，宣称天帝已御定李登辉、蒋纬国为“总统”“副总统”人选。因此，舆论称天帝教为国民党的外围宗教。1994年12月，李玉阶病逝；1996年其长子、淡江大学退休教授子弋接任“首席”。后因国民党的不断蜕变，天帝教这种“党系宗教”的面貌有所调整。天帝教以全球宏教中心（始院）为最高组织机构，次为洲级的“统院”，再次为国级的“主院”，下再依次为省级“掌院”和县级“初院”，基层活动场所称“堂”，总坛天极行宫位台中清水市东山路38—1号。是教对降鸾扶乩也是“情有独钟”，常借“神谕”表达主张，但道场不供神像，亦以天德教的“光布”设置。1994年，共有始院、统院、主院、掌院、初院22家，其中2家分设日本三重市和美国洛杉矶；1997年，有“堂”52个，信徒21.10万；至2003年，约有信徒30来万。辖下设有基金会、帝教出版社和教讯杂志社，以“宗教哲学研究社”和慈善机构“红心字会”为外围团体。1989年、1995年云南地震，“红心字会”亦向灾区提供物资援助；“宗教哲学研究社”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四川大学等单位亦有宗教学术交流、联系。

至于轩辕、天帝二教缘何尊奉济公，分析可能的情况是：

一是济公降鸾扶乩的影响使然；

二是长期以来一贯道、轩辕教、天帝教关系密切，天帝教与天德教又是共宗同源，彼此之间的联系、影响使然；

三是上世纪80年代的大家乐，及之后的六合彩、乐透彩风潮掀起，济公、太子爷（哪吒）、土地公为开牌神明中的最多三位，使得济公信仰在一时之间得到“爆炸”性升华的影响使然。

此外，台湾“济公”素来以“灵”著称，特别是通过上世纪中下叶的快速传播，在信仰形式上已经逐渐体系自成，影响及于港澳地区与东南亚国家。诸如，以济公佛像之“分灵”替代了传统的“开光显圣”，而对分灵寺庙、宫观、堂坛、阁社，实行所谓的“祖庭”拜认，及称济公曾五次投胎降生救世，谓五公菩萨，并有大师父、二师父、三师父……，多

达十八师父之分等等。此外，自定济公出生地（如以明显有误的文献记载，称济公为临海、杭州人氏）、佛教宗派（台南《永康乡志》称济公为天台宗「实为禅宗」僧）、圆寂日子（嘉义诸多济公寺庙称济公寂于十月初三，明显与南宋释居简的《湖隐方圆叟舍利铭·济颠》、明释大壑的《南屏净慈寺志》记载的嘉定二年「1209」五月十四、五月十六相悖）等现象普遍；还有低调潜在的济公神祇的源流比较，往往强调自己寺庙、宫观、堂坛、阁社分灵而来的济公神祇为正统、正宗。更为突出的是，由于“济公”曾为大家乐、六合彩、乐透彩开牌，因之受到彩迷们的热捧，以致一些赌徒也介入其中，给“济公”形象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至今仍为济公文化研究学者所心有余悸、谈“彩”色变。

发源大陆内地的同善社，解放前后亦曾传播台湾，一度易名“孔学会”，接又分袂为“孔学会”与“同善社”；之后，“同善社”又易名“国民修身协会”等，频繁周折，已是元气大伤，目前影响不是很大。

（三）港澳地区的传播

香港地区的济公信仰历史颇早，清道光三十年（1850），本岛湾仔大道东迪龙里就有僧人租房供奉济公，上环太平山街的济公庙也有约 150 年的历史，兼祀济公的庙宇为数也是很多。澳门福庆街，清光绪十二年（1886）就建有睡佛堂济公殿，香火一直旺盛。特殊的地理位置与社会制度分界，长期以来，港澳地区一直为一贯道等诸多教派的“中转”发展基地，现传统释道二教以外的济公信仰，以康济会、圆玄学院、东井圆佛会、一贯道、德教的影响较大。

1. 康济会。成立于 1960 年，为 1946 年杨悟平与堂兄杨悟灵在广州成立的康济会的后身，坛堂分设于红磡、九龙二地。在康济会，济公以圣医形象出现，仁心妙手，灵药仙方，深得病家患者信赖。是会刊行的乱谕结集《餐霞室诗稿》《雨花集》，与《康济坛道训选集》等，在济公信仰丛林颇有影响。

2. 圆玄学院。系 1945 年赵聿修、吕重德等人发起创建，1956 年注册为有限公司的宗教慈善团体，位新界荃湾三迭潭。圆玄学院以释道儒三教合一为特色，崇奉三教圣祖，道统传于关圣、吕祖、济公、华佗和郑金山“五师”之系，道派溯源于广东惠州罗浮山的冲虚观，以“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八字为宗旨，发扬济世利人的优良传统，以宗教慈善福利事业为重，开展多文化社会服务；院名“圆玄学”，“圆”即佛教，“玄”即道教，“学”即儒学，主要殿堂有三大殿，供奉道德天尊、至圣先师、释迦牟尼、六十甲子神等，另二殿供奉关圣、吕祖、济公等。辖下有安老院、护理安老院、老人中心、西医诊疗所等服务机构，建有香港道教界最大的图书馆，藏释道儒经典及各种研究书籍、期刊等数万册，虽非高等学府，但在学术界具有较高地位，资助中学三所、小学一所、幼儿园五所。1998 年，是院于广东花都投资创建圆玄道观，现为粤之道教活动中心和旅游观光胜地。

3. 东井圆佛会。为广东中山坦州林东先生于 1997 年及后，分别创办于香港、澳门和加拿大温哥华的宗教慈善团体。佛会成立二十多年来，本着“以国为主、以民为本、慈善报国”的宗旨，举办佛学班、读经班，祈福法会、祭祖法会、放生法会，文化德育讲座，传统文化展览、儿童尊师开笔礼，并探访送暖长者，慈善义诊，为重病善信诵经、往生助念等各类活动，一直致力于大陆内地、港澳地区的宗教慈善事业而不懈努力。据不完全统计，自 1989 年起，东井圆佛会并会长林东，已捐助项目 60 余，计为大陆内地、港澳地区的校舍、医院、

老人院等建设，与南方雪灾、汶川地震、玉树泥石流，海地地震、泰国水灾、南亚海啸等捐款赈济 5000 余万元。辖下有澳门黑沙环慕拉士大马路的德教济修阁，加拿大卑诗省烈治文市的济公庙和德教紫屏阁，广东江门叱石的济公禅寺，还有位于中山坦州、港澳、东非、加拿大的佛堂七所，与香港、澳门的东井圆慈善诊所等，在中山坦洲和美国旧金山设有联络处。会长林东先后被国家、地方有关部门（单位）授予“中国大陆慈善家排行榜最无私奉献奖”“首届中华慈善人物”“侨（爱）心工程特别贡献奖”“2006 爱国报国事业先进人物”“2007 中国十大慈善家”“人道服务奖章”“爱心大使”“2008 中国十大慈善家”“影响中华公益的 60 位慈善家”“国际慈善功勋人物奖”“逸仙奖金奖”“爱心个人奖”等荣誉。

在东井圆佛会的各类宗教活动中，犹对济公信仰、济公文化情有独钟，这可能与会长林东少年流浪行乞栖居济公庙有关，凡济公圣诞、成道纪念日，佛会必举行祈福法会。2008 年 6 月，佛会联动澳门德教会济修阁、澳门道教协会，并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德教会等，于澳门威尼斯人度假村，举办“2008’ 国际济公文化节暨济公活佛成道八百周年庆典”，内容包括“济公文化展览”“济公文化论坛”“祈福会”“飘色巡游”等系列活动，来自欧美、澳大利亚、东南亚与台港澳、大陆内地等六十二个国家（地区）的五十多家宗教机构、寺观会所的 2000 多名代表，与宗教、济公文化学者，传法弟子、信徒信众出席，盛况空前。2011 年 6 月，联动加拿大温哥华德教会紫屏阁，在温哥华举办“济公文化展”；国庆期间，联动澳门德教会济修阁，于澳门商务旅游中心举办“澳门社会与济公文化展览”。2014 年 10 月，于香港举办“济公活佛圣诞祈福法会暨国际济公文化展览”。2015 年 6 月，经林东先生倡议发起，创建“国际济公文化协会”于澳门，林任会长一职；同年 10 月，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举行“万指千人印济公”活动，破健力士（吉尼斯）世界纪录。2016 年 10 月，佛会与国际济公文化协会一起举办纪念“济公成道 808 周年巡游暨‘慈善行、建仁心’慈善步行筹款”活动，成功以 291 人穿济公服，创健力士世界纪录。

4. 一贯道。香港的一贯道传播，始于天津霍永盛 1941 年至港设颖筏坛。1947 年，上海宝光坛抵港设道明坛，其后又有秋明坛、宏化坛设立。1948 年，宁波明光道场抵港设仁光坛。1949 年新中国成立，并声势浩大的取缔反动会道门运动开展，诸多一贯道人士至港避居，及后设立的堂坛有昭德坛、正光坛、荣光总坛、泽化坛、仁光坛、义光坛、礼光坛、智光坛、信光坛、达光坛、德善总坛、浦善坛、博德坛等。尤自上海道首徐书印、北平道首张五福等抵港后，香港一贯道的地位遂升，成为与台湾一贯道比肩而立的两个大本营，许多国家的道场皆由此分出。1966 年，香港各组线，在铜锣湾设道德善堂（中合堂），以此作为联谊与道学研习中心；上世纪 80 年代后，台湾部分支线开始在港设坛。1997 年回归后，也有部分道场迁移至海外美、加、纽、澳等地发展。

澳门一贯道源自上海、香港、台湾三地，较早的佛堂为善一坛，系上海宝光坛许志卿于 1949 年创立。1950 年后，香港一贯道陆续抵澳建堂，先后有慈云坛、园光总坛等数十坛设立。1990 年，台湾一贯道宝光建德道场也抵澳设崇义堂，后设天恭堂；1994 年，发一发恩道场抵澳设启慧佛堂。1991 年，台湾发一崇德道场抵澳发展，速度令人瞩目，现已在澳设立基德、致德、林德、霖德、行德、康德、涵德、发一佳等佛堂十五所，并成立“发一崇德澳门道务中心”，辖下有崇仁文教会（1998）、致德文教总会（1991）、发一佳文教研究会（2005）、发一崇德文教会（2010）、发一崇德正承协会（2011）、康德儒学会（2012）等社团组织开展弘道事业，为目前澳门最大的一贯道组线，与拓展世界各地，中转大陆内地

的重要平台。

5. 德教。1947年香港就有德教会阁出现，马贵德与广东潮州德生在盘含道创立紫宛阁，并在当地翁善长的支持下，成立香港德教会。及后，本岛和九龙又有紫兰、紫因、紫蓉、紫香、紫靖等阁创建。近年，东井圆佛会亦在澳门创立济修阁。

（四）东南亚国家的德教弘扬

德教于二战结束后传至东南亚各国，现已发展为凝聚海外华人振兴传统道德，开展慈善福利事业、交流信息、合作互助、增进友谊的宗教慈善组织，诸多学者将其作为当代华侨社会最重要的宗教和文化现象加以研究。是教缘因1945年底华侨林修悟（也作林修吾）返回泰国时，于广东汕头紫雄阁得在泰建立新阁之乩谕，并请得“白云道长”题匾与道长画像，1947年于泰国曼谷首创“紫辰阁”。1952年，德生萧锦锡创立紫真阁于曼谷。1953年2月24日（农历正月十一），泰国拉玛九世皇陛下御驾临幸是阁礼佛参师，德教的影响随之扩大。期间，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的德教会阁之创建亦如雨后春笋，频频涌现，后来成立的会阁，阁名习惯冠以“济”字或“紫”字，并以此分为济系和紫系两大派别。1956年，紫系8个德教会阁在马来西亚怡保市举行会议，决定在新加坡成立“南洋德教总会”，于马来西亚成立“德教联合会”，泰国也于1979年成立“德教慈善总会”。目前新马泰三国，特别是在侨居的华人中，德教规模已经相当，有自己的会旗、会歌、会徽，会阁遍布各个角落，兴办的慈善机构、学校等亦是诸多。大略估计，全世界的德教会阁当在350家以上，德生人数已达20~30万（也有文献称30~40万），且目前正以强劲的态势拓展新西兰、澳大利亚、日本、美国、加拿大、缅甸、越南、菲律宾等国，与中国的台湾。

大陆内地的德教尽管没有得到宗教职能部门的认可，但近年会阁的发展速度很快，粗略统计就有：

北京的紫鑫阁（2003）、济化阁（2003）；天津的紫航阁（2001）；上海的紫源阁（2001）；江西的紫化阁（南昌·1998）；福建的济佛阁（崇武·2009）、紫雾阁（仙游·2011）；广东的紫香阁（潮阳·1997）、紫玄阁（潮州·1998）、紫宁阁（普宁·1999）、济源阁（深圳·1999）、紫映阁（广州·1999）、紫普阁（普宁·1999）、道济殿（潮州·2001）、紫澄阁（澄海·2001）、济心阁（丰顺·2001）、紫屿阁（汕头·2003）、紫旻阁（深圳·2005）、济公亭（澄海·2006）、紫海阁（澄海·2006）、济公庙（潮州·2007）、紫缘阁（普宁·2007）、醉僧楼（潮州·2009）、紫垣阁（坦州·2011）；新疆的紫疆阁（乌鲁木齐·2004）；云南的紫钦阁（昆明·2004）；山东的紫藏阁（青岛·2002）；浙江的济公德德社（杭州·2015）。

另从2006年美国南加州大学李建军教授的《关于天台山旅游景区的考察情况与建议》，与以色列夏维明教授1998年的《济公·中国宗教和世俗文学》反映，欧美与以色列等国，也有很多人喜好济公文化、济公传说，至于是否与一贯道、德教的国际性广泛传播有关，详待考？

【注释】

[12] 1934年藏传佛教格鲁派大活佛，九世班禅额尔德尼·曲吉尼玛《南屏正宗序》：

禅自布达拉城至杭州路踰万里，其所以不惜远道而之此者，以杭为圣湖福地。我佛荟萃，寺有三百六十者，沙门□□行瑰异。一日，经慧日峰谒净慈寺，见济师石像如对当年出现，神运井□□，六甲神运木时，也见南屏□□，闻南屏□钟，想见赵府尹过南屏访济师吟眺时也。诗云：“□茶迎客月当户，采药出门云满篮。”其湖中夕泛归南屏云：“一声啼鸟破幽寂，正是山横落照边。”又云：“遥看白鹭窥鱼处，冲破平湖一点青。”不但无丝毫蔬笋气，的是唐人风格。是济师之遗集，虽不得见，然吟咏辄在南屏，其历年之久不离南屏已无疑义。是故武林梵志谓，时德辉为净慈住持，与瞎堂为法伯仲，见济而深器之。一夕济乘醉亟，称无明发，众莫之悟，而大火竟作，殿宇忽成灰烬。辉随其火化，遗偈于砖，独济预知其几焉。火后济自为疏，具见塔院志；其神异等事，具如传记。于坐化说偈之碑，并其身骨俱存本寺，此吴之鲸大令梵志所言也。故济师生前事迹不出南屏，生后宰堵则安于虎跑耳。此其说可信，今而传后也。杭州孙梦松居士，峻徇申江寓公之请，纂济颠塔院志。禅闻之亟为，借阅简编载诵，翻阅序例，凡志所应列者，无不应有尽有，独于宗派一门尚未成书。询之梦叟，尚未属稿。禅因不辞越俎，将宗派代为草成，省居士检书之烦耳。自天竺第一祖摩诃迦叶，至二十八祖菩提达摩，凡属释氏，皆能言之，不具载开。兹自南屏宗系初祖达摩祖师、二祖慧可大师、三祖僧璨大师、四祖道信大师、五祖弘忍大师、六祖慧能大师。南岳怀让禅师与青原思禅师同为六祖法嗣。南岳自马祖传百丈后，宗统益繁。兹就马祖以至道济牐陈于次：一世马祖道一禅师、二世百丈怀海禅师、三世黄蘗希运禅师、四世临济义玄禅师、五世兴化存奖禅师、六世南院慧颙禅师、七世风穴延沼禅师、八世首山省念禅师、九世汾阳善昭禅师、十世石霜楚圆禅师、十一世杨岐方会禅师、十二世白云守端禅师、十三世五祖法演禅师、十四世昭觉克勤禅师、十五世灵隐慧远禅师，十六世神功道济禅师，此其大略也，于以徽南屏宗统脉络相承。□敬□汉藏合璧一印，文曰：“南屏正宗”，以承万世无疆之□云。佛历二千九百六十一年，阙逢阉茂，班禅额尔德尼。

[13] 《洞冥宝记》（又称《洞冥记》），产生于20世纪二十年代，即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8月至1918年11月）结束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一部乱书著作，是书以忠义关公（关羽）在天界就职第十八代玉皇大天尊玄旻高上帝（也有称玄灵高上帝）为主轴，铺陈演义，告人行恶必坠地狱，受励鬼施刑，魂飞魄散，胆颤心惊，诚惨苦矣！行善必升天堂，则贝阙珠宫，圣真仙佛，晤对相亲，何其乐哉？宣扬三纲五常、仁义道德，三教统一，万道归宗，中外一家，醇风沕穆；仙鬼升降，准绳善恶，路分两条，任人择取。一贯道、同善社等教派尊奉是书为“古今劝善第一奇书”，影响甚大。

[14] 1942年5月22日，关平少帝受其父玄旻高上帝玉皇大天尊（关帝圣君）敕旨，降鸾广东汕头潮安街“紫和阁”之协天阁，挥沙写出《德教心典》，全文如下：

（一）祝香辞

缕缕清香绕圣空，香绕圣空神人通；

神人相通惟心感，心感信香化苍穹。

南无天云海会诸仙真（三称）。

（二）起 赞

阴阳分晓日月尊，浑浑五行合乾坤；

帝德玄黄参化育，订立慧缘修真根。

奉请东方木德星君，

奉请南方火德星君，

奉请中央土德星君，

奉请西方金德星君，

奉请北方水德星君，

奉请德德社诸佛仙真。

（三）经 文

玄旻高上帝玉皇大天尊，慈念尘土末劫，发大悲心，扬大教化，渡一切苦厄，救一切苍生。众善子，教不离德，德不离身。天命为性，率性归真。是故有诸行藏，不欺、不伪，不贪、不妄，不骄、不怠。尘世

无魅，无侵损相害，无是非讼扰。赤心古朴，积精为神。水火刀兵不见，灾疫疾厄不遇。恬愉自得，慧志洁净。常持圣典，正觉开智，超凡化真，心宽体胖，家室安宁。以增天爵，以邀吉亨，至诚无物，至妙至真。道化成理，虔感至灵。

南无大慈大悲伏魔大帝。

德德社至上古佛玉皇大天尊(三称)。

(四)收经辞

玉皇大天尊，义气贯乾坤；

忠心如赤日，紫德定道轩。

愿以此教典，普化于世间；

同登极乐土，共跻天堂欢。

南无德德社诸佛仙尊(三称)。

五、济公信仰的属性

正确认识济公信仰的属性，合理界定其在宗教领域的地位和作用，事关大陆内地“济公”能否领军世界济公信仰大势，事关海峡两岸“济公”能否“和谐统一”，进而助推祖国的和平统一，事关宪法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之公民基本权利能否真正得到实施。因之，摆脱长期以来意识形态豢养的定式，对中华宗教文化的内在图式、典仪秩序、思维观念、行为传统等方面进行剖析审视与客观总结，并以积极的态度，全球的视野，当前的实际，在理论上作出梳理，从而使济公信仰的“正能量”，在新时代得到充分有效的发挥。

(一) 济公扶乩的属性

扶乩，又称扶箕、抬箕、扶鸾、降鸾、请仙、卜紫姑、架乩等，源于传统道教的一种占卜方法，流传至今约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东晋时期进入非常成熟的应用阶段，唐时传入日本，由日本传入荷兰，再由荷兰传入欧美各国。扶乩的板为“维吉板”，研究扶乩的组织称“灵学会”，组织扶乩和与神明交流的人为“神媒”或“灵媒”。扶乩进行中，神明附身的角色，称鸾生或乩生。鸾生以写出的字迹，传达神明的意思。传法弟子、信徒信众通过是种方式，与神明获得沟通，并于生产、生活实践中奉之、行之。我国历史上，民间扶乩多以迎请紫姑神，卜问来年农耕、桑织、功名之事。唐李商隐的《正月十五闻京有灯恨不得观》，就有“羞逐乡人赛紫姑”的诗句，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洪迈的《夷坚志》、陆游的《箕卜》等，也对扶乩有详细的记述；清末民初，降鸾各寺庙、宫观、堂坛、阁社、团体的，除通常的释道二教神明外，还有孔子、拿破仑、华盛顿、托尔斯泰等。至于扶乩的属性，即扶乩到底是归属宗教信仰范畴，还是列于迷信范围？专家、学者素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较具代表性的观点有三：

一是力主扶乩为迷信活动。诸如，《辞源》《辞海》分别载，扶乩为“旧时迷信”“一种迷信”。1918年，北京大学教授陈大齐，在李大钊、陈独秀等创办的《新青年》发表《辟“灵学”》文，对当时上海滩盛行的扶乩活动进行抨击。1941年，著名小说家、散文家许地山的《扶箕迷信的研究》，以古文献记载的132则故事，比较详尽地阐述了扶乩的起源、形式，及古人通过扶乩所欲达到的目的，分析了扶乩这一活动在人们心理上的状况，结论扶乩不是什么神明的降示，而是自己心灵的一种作怪反映而已，揭露了扶乩的虚伪性和欺骗性。

二是于宗教与迷信间游离。诸如，清代政治家、文学家纪晓岚，在其所著的《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述了数十例扶乩事例，认为“大抵幻术多手法捷巧，惟扶乩一事，则确有所凭附，然皆灵鬼之能文者耳。所称某神某仙，固属假托。”近现代鲁迅先生先是以不屑于之态，在杂文《随便翻翻》称：“讲扶乩的书，讲婊子的书，倘有机会遇见，不要皱起眉头，显示憎恶之状，也可以翻翻。”后又于《花边文学·偶感》云：“五四时代，陈大齐先生曾作论揭发过扶乩的骗人，隔了十六年，白同先生却用碟子证明了扶乩的合理，这真叫人从那里说起。”印光大师也是一面首肯西方极乐世界觉明妙行菩萨之乩书《西方确指》（收录《卮续藏经》），一面又对扶乩作了如是的评说，即“扶乩一事，皆灵鬼依托扶者之智识而为，亦或多由扶者自行造作而成者，且非全无真仙，殆百千次偶一临坛耳，至言佛、菩萨则全是假冒。但扶乩者多是劝人为善，纵不真实，因其已挂为善之名，较之公然为恶者，当胜一筹，又可证明有鬼神祸福等事，令人有所畏惧。所以吾人亦不便故意攻击。”山东薄法平的《漫话扶乩》谓：“英国著名生物学家查理·达尔文……的好朋友、著名生物学家赫胥黎对扶乩虽然持怀疑态度，但经常参加扶乩会。”

三是肯定扶乩为宗教典仪。《中华道教大辞典》载，扶乩为古代“天人交通”术的一种。东晋哀帝年间（362~365），江东一带天师道盛行，时任护军长史的许谧举荐能够通神的杨羲，到会稽王司马昱（即后来的晋文帝）府上做事。许世代信奉天师道，于京都建业（今南京）设立乩坛，自为坛主，杨为乩生，最初的道教《上清经》（31卷），就出自许谧、杨羲的扶乩之手。北周武帝天和年间（566~569），道徒王灵期通过扶乩，增修《上清经》至186卷，其中127卷于是代印行，成为道教上清派的基本教义，列《道藏》七部分类的“三洞四辅”之首。明末清初著名文学家金圣叹，笃信神佛，擅长扶乩，称自己为佛教天台宗祖师智顓弟子的转世化身，法号“泐庵”，士大夫尊金为“泐公”或“泐师”，江南文坛领袖钱谦益亦曾邀金到自己家中设坛起乩。薄法平的《漫话扶乩》还载，带领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并取得胜利的“前总统威尔逊生前笃信扶乩……英国著名生物学家查理·达尔文的哥哥……坚信扶乩，经常在自己家里组织扶乩会……达尔文的另一位好友、著名科学家华莱士却是扶乩的坚决拥护者。”

前述《西方确指》之《后序》，为清代名士彭绍升所撰，彭对扶乩的宗教性也作了如是的阐释肯定：

佛法入中国千五百年，其间豪杰明睿之士，得一经一偈，决定信入了，脱生死者，怠不可悉数。……近世飞鸾之化行，三教圣贤往往随方应感，宏法渡人，是皆不得已之心。读其书，知其言，决不可以伪为者，亦断之于理而已矣。《西方确旨》者，极乐界中觉明菩萨所说法也。其为教，贬斥邪修，指归净土，阐一心之妙谛，穷向上之玄关，诚学佛者之指南也。……飞鸾之化，与现身说法何异？读是书者，诚能信自本心……如其不信自心，因而不信净土。如说修行，心心回向，无诸异念，念极情空，脱然无住。虽现居五浊恶世，已浑身坐在莲华国里。报缘一谢，弹指往生。是果是因，初无先后。如其不信自心，因而不信净土……。

1939年，编纂《佛学大辞典》的丁福保，为《济师塔院志》所作的《南屏宗乘序》，也认为扶乩与《西方确指》一样，具有佛教的正统性。入编《续藏经》的云峰大师、谷口子的乩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亦谓，乩书之言常被他人视之为“幻”，是因其不依据正统佛典经传，所以“述而无考”，原因乃《金刚经》传世各注本内容未详所致，不应以“诞妄”看

待。直截了当肯定，扶乩具有阐释佛法的功效存在。

济公信仰传承中，“济公”扶乩可谓区别与其它宗教形态的魅力独具的一大特色，只不过是在上世纪 50 年代，大陆内地明确将它定性为迷信予以革除而已，但在台港澳地区，东南亚国家，乃至世界各地的济公寺庙、宫观、堂坛、阁社、团体却发展成为一道亮丽的宗教风景线。诚然，“济公”乩谕数不胜数，但与国家政治、命运相关联并影响之大者，可能莫过于 1945 年春，因民国政府考试院院长戴传贤等祈请，“济公”降坛重庆所作的乩谕，与是年初夏，重庆成立国际宗教研究会，“济公”在道院继明、玄存、仁道、印川，及曾经出任印度等国外交使节的卢春芳等的亲眼目睹下，写就的《重庆国际宗教研究会宣言》（中英文）乩文。

1. 1945 年春“济公”乩谕

原由金劈甲，二子震天下；

木鸡啼罢日无光，四海靖安康。

怕只怕！萧墙祸又起，处处红花伴牡棠；

和衷共济商量商量，终不免真刀真枪演一出全武打。

盗贼如麻民尽瘁，遭殃、遭殃；

戌亥会元土鼠见，小康、小康！

2. 1945 年初夏“济公”《重庆国际宗教研究会宣言》乩文

大道之行——To bring the highest ideals of God into practice.

天下为公——The best world can be made without prejudice.

不分彼此——This and that is needless to say.

无论西东——Or east and west anyway.

大如宇宙——As large as the whole universe.

小似鱼虫——Or as small as an insect or a fish.

形体有异——They differ only in body and size.

性灵终同——With the same soul in each.

俯察黄泉——To look upon the heaven above.

仰视霄冲——And down to the ground below.

万千变化——Many a thousand changes may occur.

不离其宗——But all the same are governed by law.

纯乎自然——This seems quite natural.

异曲同工——To sing different songs with equal skill.

生化之间——During an interval of life and death.

各秉正统——Every particle owns a good spirit still.

日月星辰——The sun the moon and the stars are.

弥漫太空——Heavenly bodies all over the sky.

山水沙木——While mountains waters sands and woods were.

造化所鍾——Created by God in forms wet or dry.

人列三才——In between the heaven and the earth.

灵焉最聪——Human beings are the wisest of all.

- 领导群伦——To take the lead among the rest.
共乐仁风——And enjoy the Big Nature what we can all.
溯彼太初——From the very beginning.
万有穆雍——A peaceful air was over all.
主宰恒存——There must be the Lord.
操纵其中——With an absolute power to control.
一胞所系——Such a huge system is of no border.
静躁不同——With a content of bodies large and small.
无巨弗包——They may be in motion or at rest.
无细弗容——That s the only difference after all.
有象易见——With image one can easily observe.
无形难穷——Lest one cant even comprehend.
天命莫测——The ways of providence are oftentimes.
自始至终——Inscrutable from beginning to end.
生来何自——Where were we born from.
死去何从——Where shall we pass away to.
真理常在——Causes and effects are rather complicate.
因果错综——Yet the truth is always true.
无化无灭——Unchangeable and indestructible is.
厥为圆灵——The true essence This one soul.
舍之则亡——It may be neglected and lost.
操之则存——Or it may be kept in full.
生生之本——To search for the origin of life eternal.
上苍之仁——We resort to the great kindness of God.
仁者无敌——For a kind person is always invincible.
草木全仁——And a good plant depends upon its seed bud.
恒大悠久——Moreover eternal is also the civilization.
博厚高明——And profound are both and heaven.
不动而变——Without any abrupt change of themselves.
无为而成——All things molded within.
煌煌先哲——So brilliant were the ancient sages.
世界圣人——Saints of the world.
积年累月——For years and months they tried.
真谛是寻——With God s truth to hold.
因时因地——To preach the gospel through different apostles.
因事因人——At different times in different localities.
悉奉使命——They were born to be Archangel of God.
至性生成——Together with many good qualities.
创立宗教——They had established their religions respectively.

- 修己度人——To save themselves and others who suffered too much.
善不计功——To cast their own bread into waters.
取义成仁——They had done what ought to be done for each.
耶回儒释——The five religions are Christianity.
道教异名——Mohammedanism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初本一家——With no difference from the outset.
未尝径庭——They are the same under Gods kingdom.
诸子百家——To develop them into many branches.
衍出多门——There were countless thinkers of the past.
择善固执——They followed strictly the human nature.
率性而行——To prove all things good and hold them fast.
自诚而明——Honestly makes a man wise.
自明而诚——Wisdom makes a man honest.
忠以尽己——Faithfulness of oneself is apt to win praise.
恕以待人——Yet forgiveness to others is still the finest.
何道非道——Nowhere will not be the truth of God.
晶晶莹莹——That s apparent to everybody.
一以贯之——But success had only those.
炳炳鳞鳞——Who took it under custody.
降及后世——Until the recent centuries.
志理竞欲——Men forgot truth for wants in competition.
异端纷起——Differences in opinion arose.
入主出奴——From differences in pre-occupation.
各因成见——Because some prejudices existed.
互不和睦——They were not mutually reconcilable.
酿为战争——As a result belligerent actions took place.
干戈相属——And wars were unavoidable.
祸乱之烈——The disaster might be so serious.
此兴彼伏——That one came after another.
正义莫张——There could be no more justice.
生灵汨役——And many living souls always died together.
或为刀俎——Some of them were slaughterers.
或为鱼肉——Some of them were victims.
残肢缺体——Nothing had there been so dreadful.
伤心惨目——As the wounded bodies and limbs.
粉碎家庭——Many families were broken.
离散骨肉——Many couples were dissociated.
掠夺土地——Many fertile soils were spoiled.
覆灭异族——Many peoples of different races were annihilated.

- 丧失文化——Civilization was deteriorated.
摧残教育——Education was metamorphosed.
破坏和平——Peace was destroyed.
牺牲幸福——Welfare was sacrificed.
经济崩溃——Financial crisis had always occurred.
自由难图——As to freedom twas difficult to attain.
科学误用——Scientific knowledge was illused.
利器百出——Secret weapons were renewed again and again.
生活艰苦——To get living twas very hard.
饥馑满屋——Starvation came to every home whether new or old.
弥天烽火——Distress had caused pain to all.
遍地萑苻——Robbery existed at nearly every corner of the world.
愈演愈厉——The conditions grew worse and worse.
愈来愈酷——The cruelty became more and more.
报应昭彰——Both defensive and offensive actions were repeated.
循环往复——Those facts were quite clear to all.
哀哉芸芸——Alas May poor creatures.
无辜受戮——You have been innocently illtreated.
既绝反省——Be wiser to plan for yourselves.
亟宜自图——At an early date after thoroughly yon reflected.
爰在今日——Therefore its up to nowadays.
将谋战后——A good plan shall be carried out effectively after this war.
永久和平——For the sake of eternal peace.
国际机构——A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is the best by far.
宗教教义——The same truth for all religions.
尤当研究——Everybody has to research.
信仰自由——The freedom to worship God in ones own way.
理论精透——Is the most fundamental principle one may reach.
凡各教徒——Apostles of the world.
悉属优秀——You are all good fellows.
应发宏愿——You have to serve for the greatest will.
救人自救——To save yourselves and any other who follows.
不分中外——With no regard to nationality.
男女老幼——Members of different sexes and ages.
殊途同归——On the basis of equality you will reach.
何薄何厚——The same kingdom of God through different passages.
本会成立——Here i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R. I. R.
惟展各埠——With branches in all parts of the world.
宗旨纯正——With a righteous aim.

不愧屋漏——We are all faithful to God.
发挥真理——To preach the same truth.
迅伏魔寂——And to defeat the devil enemies.
胜利可期——Victory will be ours.
肤功克奏——Triumphs will not be absurdities.
人类文明——Unlike the wild beasts.
非同野兽——Human beings are civilized.
互增情感——Be sympathetic and honest.
勿生疑窦——No doubts can ever be roused.
天下大同——In a world of Universal Brotherhood.
河山依旧——As usual territories have to be restored.
共策安全——To enjoy the same happiness.
胥得享受——The common security must be assured.
愿此世界——Wishing that whorled world.
民康物阜——Will return to good order.
一夫不获——If any individual be there not properly treated.
众生互救——Any other may be asked as a saver.
永久和平——Eternal peace could aptly be maintained.
殆属天授——If it were gifted by heaven.
愿吾同人——Come on my dear friends.
精诚奋斗——We have to try our best for this heavy burden.

对“济公”之上述乱谕、乱文，加以肯定的，普遍将其作为预言对待，认为济公神通广大，不可推测，并从善意角度作出诠释。诸如，对《1945年春乱谕》，将“原由金劈甲，二子震天下”，理解为日本长崎、广岛两颗原子弹爆炸；将“木鸡啼罢日无光，四海靖安康”，理解作1945年为农历乙酉年，乙为天干的次位属木，酉为地支的十位属鸡，即是年日寇战败投降，二次大战结束；将“怕只怕！萧墙祸又起”，理解为国共两党组建联合政府观点分歧不一；将“处处红花伴牡棠”，理解为国共两党谈判破裂，红旗、青天白日旗同时存在，小规模冲突时有发生；将“和衷共济商量商量”，理解为1945年底，马歇尔奉杜鲁门总统之命，来华调停国共军事冲突；将“终不免真刀真枪演一出全武打”，理解为马调停失败，国共内战全面爆发；将“盗贼如麻民尽瘁，遭殃、遭殃”，理解为内战期间，国内治安混乱、经济萧条，民力、心力劳累极度；将“戌亥会元土鼠见，小康、小康”，理解作戌、亥为地支的末数，亥终贞起下元，子为地支的第一位，子鼠为生肖之首，子会则轻清上腾，政治清明，及1984年为甲子鼠年，正是是年的10月22日，邓公小平在中顾委三次全会上阐述了实施小康战略目标及其重要意义。而对《重庆国际宗教研究会宣言》乱文，普遍认为“济公”以“钟灵毓秀”为韵，谴责了战争的残酷，表达了对和平的祈盼，预言了二次大战结束，国际机构“联合国”的成立。

在德教，无论是会阁的创建，还是根本经文《心典》之产生，及日常的一切重大活动，包括德生个人的经商、求职、远行、治病等，大多要通过扶乩，以求得师尊的训谕和指导，然后根据乱文的指示而行。是教崇奉的仙佛师尊中，济公的地位表面逊于玉皇大天尊

玄旻高上帝（关帝圣君），五教教主孔子、释迦牟尼、太上老君、耶稣、穆罕默德，甚至不及柳春芳、杨筠松、张玄同、吴梦吾四位掌教，但实际却受广大德生的由衷敬仰与忠心爱戴，地位非常崇高。济公既是济系的主坛师，又是紫系的主坛师，经常显灵降谕，宣说教理，指导教仪活动，为德生指点迷津。“济公”的乩谕，素被广大德生视为信受奉行与析疑解惑的宝典。德生更是喜好将济公圣像安置于家，甚至带在身边，朝夕礼敬。是教著名的“十大居士”，即“大明居士”沈忠明（泰国紫真阁）、“大雄居士”郭昭荣（马来西亚紫善阁）、“大德居士”刘小源（文莱济德宫）、“大慈居士”陈钰标（马来西亚济阳阁）、“大仁居士”李斯仁（马来西亚济阳阁）、“大礼居士”何秋辉（泰国紫真阁）、“大智居士”李基智（泰国紫真阁）、“大勇居士”沈永发（泰国紫真阁）、“大义居士”张汉昌（泰国紫真阁）、“大善居士”沛汕（泰国紫真阁），亦系“济公”据“玉皇大天尊”之圣谕，降鸾嘉封。2018年6月刊行的《泰国德教会紫真阁成立六十六周年暨德教崇圣大厦揭幕六合庆典纪念特刊》，由紫真阁录入汇编的自2014年1月2日至2017年12月24日的356篇乩文，其中：302篇为“济公”降鸾所作，占84.83%；2篇为“济公”与“白云”“杨益”师尊合作，占0.56%；52篇为其它仙佛神灵降鸾所作，占14.61%。2018年8月12日，紫真阁第十七届理事会的最高荣誉顾问、最高荣誉顾问兼鸾务顾问、永远名誉顾问、永远名誉理事长、实权名誉理事长兼参议、名誉理事长、荣誉顾问、名誉顾问、常务顾问、顾问、鸾务顾问等一干人选，亦系扶乩产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德教的整部历史，就是一部神明降鸾扶乩的历史，更是一部以“济公”为主要代表的扶乩历史。“神道设教，乩示圣训”，诚为“德徒之崇高信仰”“道德教育之工具”“神人相通之道径”（现代郭良锡《认识德教》）。当年中国济生会、天台济公会开展慈善活动，亦是由“济公”降谕指示赈济任务和捐款额度的分摊，会员无不纷纷积极踊跃投入，赈济效率大为提高。此外，在台港澳地区、东南亚国家，乃至世界各地，几乎所有供奉济公的寺庙、宫观、堂坛、阁社、团体，都有自己的济公乩身，凡各种规模宏大的神明绕境进香活动，基本都能看到济公乩身的结队参与。

缘何在相关教派，“济公”扶乩之地位如此崇高，及传法弟子、信徒信众如此虔诚志信？析其内在原因，主要有三：

一是济公的形象近人。自南宋以降，通过历代辞书、史志、灯录（道影、仙谱）、语录（诗偈）、传记（笔记）、小说（传说）、雕塑（绘画）等的渲染，济公的破帽破扇破鞋垢衲衣，似丐似氓，赞誉不喜，闻谤不嗔，扶危济困，救苦救难，济世度人的平民化形象深入人心。伟大济公，既具《水浒传》梁山好汉的英雄气概！却无行者武松那样的“礼数”，又不同花和尚鲁智深那样的“鲁莽”，也没有《西游记》唐僧那样的“正经”，更不像《杨家将》五郎那样的“俗累”。伟大济公，揉合了唐代诗僧寒山子的蓬头垢面，赤足褴衫，吃残羹冷饭，树间壁上题诗，讽喻时弊之形态，又蕴含五代延寿禅师的某些怪诞“神迹”，给人以莫测高深，历久弥新之感。诚如现代文正义先生的《解读济颠》所说：“自南宋迄于清季，从署名宋沈孟样的《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到清代郭小亭的《评演济公传》，济颠留在世人心目中的形象，不再是当年的禅僧道济了，揉合了儒释二教的基本理念，倾入了人民群众的理想情感，也是神异传闻和小说创作的结合体。他既神圣奇异、主持正义，又平常住世、颠狂诙谐，不像黑面包拯那样一脸凛然，更富有一种人情味与亲和感，其形象不是分娩于一朝一夕，而是不断地被人们‘再塑金身’，逐渐地完善其故事，丰满其性格，突现其主题。……得到了人民的崇敬、喜爱，成为了他们感情的寄托，希望的化身。”

二是济公的精神通俗。伟大济公，他于三教圆融修持实践中创立的“慈悲济世、无我利他、彰善瘴恶、扬弃创新”精神，与“禅非坐禅、心明性见，颠狂顽世、真乃禅本，无欲以刚、民生为怀，以德劝善、正法诛恶，混俗同尘、酒不醉性，般若性空、随缘任运”佛学思想，言简意赅，能为普通民众百姓所能理解、接受，并于生产、生活实践中运用，从而成为济公信仰发展的内因作用力体现，在不同的时空环境与不同社会文化的适应上，而非一般社会意识形态所能比拟。

三是济公的事迹实在。伟大济公，亦庸亦圣、亦俗亦佛、亦凡亦仙，题墨隽永、访遗览胜，河北传法、僧众建塔，业识忙忙、风流则剧，横说竖说、耸动王侯，建寺垒桥、药石济世，关注生态、怜悯众生，刚正不阿、击扫奸相，精诗善文、出口珠玉等的济世事迹真实可信，辅之以寂后募疏、上偈，火化蟋蟀现青衣童子，重新藏殿、梦感太后，募化建寺、古井运木，无尾螺、半焦鱼放生，救护黄生，挪移死尸，化钟偈预言，醉酒贴金、死鸽复生等灵异神通的传播，在事迹的可信度上，远超其它仙佛神灵，以及济公一生济世为公，“万里寻声救苦，当行则行”，主动、自觉为人排忧解难的高尚品格，更为民众所亲近，百姓所接受。

诚然，也不否认对“济公”扶乩，历来的确存在争议。如对上述乩谕、乩文，否定者则谓，1945年初，日本战败已成定局。早于1941年8月14日，美国总统罗斯福与英国首相丘吉尔签署的《大西洋宪章》（又称《罗斯福丘吉尔联合宣言》），已首次提出了建立战后国际秩序的设想，至1942年1月1日，中、美、英、苏等26国代表在华盛顿发表《联合国国家宣言》（又称《阿卡迪亚会议宣言》《二十六国宣言》），标志着以中美英苏为核心的世界反法西斯联盟正式形成，强调在打败共同敌人后，建立一个拥有广泛普遍安全制度的世界秩序，粗略地描绘了未来国际组织的轮廓，为建立联合国组织奠定了初步的基础，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及至1943年10月30日，中、美、英、苏四国外长在莫斯科发表《普遍安全宣言》，提出尽快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1944年苏、英、美三国和中、美、英三国先后在华盛顿的敦巴顿橡树园举行会议，同意把即将成立的国际机构定名为“联合国”，并拟定了《联合国宪章》的基本轮廓。再至1945年2月4日至11日，苏（斯大林）、美（罗斯福）、英（丘吉尔）三巨头在黑海北部的克里木半岛的雅尔塔皇宫举行会议，就安全理事会的五大国一致原则达成协议；同年4月25日，“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在美国旧金山开幕，包括中国在内的50个国家的288名代表出席大会，6月25日通过《联合国宪章》，26日举行签字仪式，10月24日在得到多数签字国批准后生效。由此足见，国际机构联合国成立本来就不是什么秘密。至于将乩文中的“原由金劈甲，二子震天下”作两颗原子弹爆炸解，纯属文字巧合中的牵强附会。因之认为，所谓的“济公”乩谕，实乃乩生托名“济公”作秀而已。

尽管长期以来对“济公”扶乩争议颇多，不过无论你是肯定、提倡也好，还是否定、贬黜也罢，在济公信仰的发展中，“济公”扶乩恰恰又是作为一种特色的宗教典仪而长期存在，并得广大传法弟子、信徒信众的普遍信任，相关的济公慈善救助经费，主要也是靠“济公”扶乩筹措，没有“济公”扶乩，也就没有济公信仰的如此广泛传播，与如此巨大的社会影响，这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近现代佛教改革运动理论家、实践家太虚大师在《追念王一亭长者》文中，也从慈善与佛教的视角，以民国年间政界、军界风云人物，段祺瑞临时执政（国家元首）的“四大金刚”之一的国务总理、陆军上将，晚年意志消沉，诵经礼佛的靳云鹏之言，对济生会“济公”扶乩的宗教属性也是作了潜在的肯定，大师谓曰：

民六，上海有组设中国济生会者，以所谓济公活佛主坛扶乩，颇施医药及推行赈灾等慈善事业，长者亦于坛皈依济佛，法名觉器，由是称佛弟子。而济生会推长者会长，每年筹赈南北灾难，恒集资数十万数百万，而长者遂为上海乃至全国慈善家之巨擘。沪上之各善堂与诸慈济事业，鲜有不藉长者以为之号召者。靳君云鹏，历长军政，近年甚深佛学，其抱负甚高。民二十四抵沪，独下拜曰：三年一总统，而数十年数百年才有一菩萨，称长者为当今之一活菩萨，其善行为并世人士之倾倒如此。……呜呼！长者逝矣！能以菩萨慈善心行维护佛教者更谁望耶？……。

在济公信仰已日趋国际化的今天，大陆内地的济公丛林如何与台港澳地区、东南亚国家，乃至世界各地的“济公”扶乩典仪对接？是乃当前济公信仰、济公文化交流中，必须引以国家宗教、台湾事务、外事、社科、文化等部门高度重视的一个重要问题。诚然，以平等的心态观而论，宗教毕竟是归列有神论信仰范畴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与历史文化现象，也是由相同信仰的人所共同构建、共同实施的精神生活模式，是一种缺乏科学基础的景仰、崇拜，表现为民众百姓、传法弟子、信徒信众对超人类、超自然、超社会力量的尊崇和敬畏；换言之，就是人类的思维水平与历史局限性，以及认识论上的幻觉与错误，则是宗教产生、存在的根源与基础所在。因之，我们不能以纯粹的无神论理念，苛求宗教必须对自己的经、律、论体系或者典仪、科仪行为，作出完全符合现代科学的说明；否则，整个人类的“宗教”也将不复存在。况且在科学上，从来也没有绝对终极的真理，现代科学对很多问题尚无法全面、完整作出解释。诸如近代对人们的思想、行为产生深远影响，并被列为19世纪自然科学三大发现之一的生物进化论，也随科学与认识的不断提高，在许多方面已经不能自圆其说，以致受到质疑、挑战。而从济公信仰的发展历史，也可以非常清晰看出，正是“济公”扶乩典仪的存在与推动，促进了济公精神的弘扬，助推了济公佛学思想的传播，并于民众百姓、传法弟子、信徒信众的社会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使得济公信仰以强劲裂变的发展态势，鼎盛于世界的宗教之林。所以，对待济公扶乩典仪，关键在于看它是否符合济公精神、济公佛学思想，惟以此为标准，方能对其作出切合实际之合理评价。鉴于“济公”扶乩，在济公信仰的传播实践中，普遍得到传法弟子、信徒信众的赞誉、肯定，亦有入编道藏、续藏的《上清经》《西方确指》《乩释金刚经》等典籍依据，并得近现代太虚大师、丁福保等高僧大德的辩证肯定，与时下“济公”扶乩在台港澳地区、东南亚国家，乃至世界各地的济公寺庙、宫观、堂坛、阁社、团体，已经成为一种魅力独具的宗教信仰典仪存在，大陆内地光是禁行恐也不是个长远之法。不妨在尊重现实，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允许先在较小范围，诸如于天台济公故居济佛殿等，恢复开展扶乩试点，先对台港澳地区，东南亚国家的传法弟子、信徒信众开放，在取得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再视情作出是否推向整个济公信仰丛林的政策性规定，从而进一步扩大济公信仰、济公文化的交流渠道，进一步拓展济公精神、济公佛学思想的影响空间，使之中华传统宗教文化的扶乩典仪不致于灭绝，故尔亟需政府或者有关部门予以明示、明确。

（二）济公信仰的属性

济公信仰既圆融于传统的释道二教，又于历史上、近现代的天台济公故里，中国济生会、一贯道、德教、梵天极乐宗、理教、义和团、皈一道、同善社、天德教、轩辕教、天帝教、康济会、玄圆学院、东井圆佛会等教派占有一席，方外与俗世、出家与居家，德润其身，泰

和共隆。诚然，继于人们观察济公信仰的时间、空间，与站立的角度、位置的不同，或者心境、状态的有别，自然也会出现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反映。2005年以来，大陆内地将原本为学术名词的“民间信仰”升格为行政制度，释道二教以外的济公信仰，被定性为需依政策或者官员意志实施的“民间信仰”，排斥于国家宪法保护的“宗教信仰自由”的公民基本权利之外，明显是对济公信仰的传统宗教地位作了贬谪、降格，传法弟子、信徒信众在心理感情上普遍不能接受，因之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台港澳地区、东南亚国家，乃至世界各地的济公寺庙、宫观、堂坛、阁社、团体，对我宪政制度、统战政策抱有疑义？相互间无法开展平等的济公信仰、济公文化交流，导致根生土长天台山的“济公”，不能以其固有、完整的宗教身份统领世界济公信仰大势。析其原因，主要有三：

一是价值观念的影响。价值观念，是乃基于人的思维认识而作出的理解、判断或者抉择，也是为人认定事物、辨别是非的一种价值取向。内地潜在的宗教观念预设，将没有归附佛教、道教、天主教与基督教（新教）、伊斯兰教，事实大量存在的“居士型”“景仰型”的信仰崇拜，与标榜“三教合一”“五教合一”的信仰形态，排斥于“宗教信仰自由”之外，但又不能从理论上对宗教的本质属性，以及不允许新兴宗教形态发展的理由，作出全面完整、令人信服的诠释，实践中又无法对此类信仰形态从根本上予以取缔，故而就以所谓的“民间信仰”实行“缓冲”，必然地引发部分身居要职的地方官员，在潜意识中认为“民间信仰”地位低于宗教，是“低级宗教”，或者是“等外宗教”，甚至是“次品宗教”的话语体系，说穿不过是美其名的“民俗宗教”“民间宗教”而已。济公信仰时乖命蹇，亦被人为作了“一佛两性”的瓜分，即佛教寺庙与道教宫观的济公供奉定性为宗教信仰，释道二教以外教派，及其衍生的寺庙、宫观、堂坛、阁社、团体的济公崇拜，又被冠以“民间信仰”。导致一些根本不知三教圆融为何物的“外行”领导，也跟着高喊济公饮酒食肉、半疯半颠，非佛非道、非耶非回，只能归列“民间信仰”云云。目前，已在部分地区出现对民间信仰活动场所实行所谓的“一票否决”的“年度考核”管控机制；也有一些基层干部“劝说”传法弟子、信徒信众，认为“济公”已经非常幸运，至少释道二教的供奉，已经进入宗教殿堂，而对那些标榜三教、五教合一的一贯道、德教等教派，就是不考虑其历史原因，也是不能与国家价值观念匡限的“宗教信仰”相提并论，只能是自己自称自娱自乐罢了。岂知在传统的释道二教中，济公只是作为少数寺庙、宫观的一般神祇供奉，实际地位远不及其它教派的位置显耀与影响广大。因之，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对济公信仰属性的长期以来的喋喋争论不休。

二是历史定性的余波。新中国建立前后，内地的理教、皈一道、一贯道、同善社、天德教、德教、济生会等教派，或在人民政府（边区政府）发动的声势浩大的反迷信浪潮中，不断萎缩，不得不自行宣布解散，或被定性为“反动会道门”“迷信组织”等予以取缔。特定时期产生的政治术语，孕育了人们对“异端教派”的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般的惊恐自忧，而济公信仰恰恰又是圆融于这些教派之中，高度的警惕性积淀，自然而然演变成一种对济公信仰的心理偏见。担心政治越轨，立场错误，阳沟翻船，潜意识认为宗教信仰能少则少，越少则越具中国社会主义特色，加上一些宗教职能部门的官员又把宗教信仰的特殊社会意识形态，及其内在的精神文化属性，与宗教职事人员、宗教活动场所作完全的等同看待，认为所谓的宗教，就是和尚、尼姑、道士、道姑、阿訇、主教、神甫、修士、修女、牧师、教师、长老、传道、执事等人员在许可登记场所内的循规蹈矩活动，否则就是越界犯规，实行以特定的宗教名称、特定的寺庙场所与特定的人员划界的机械管理模式，与信仰的精神意识完全

脱钩。无怪乎，时常被人以“一拜三性”作为戏谑嘲笑之资，即对同一神明而言，在宗教活动场所拜之为宗教信仰，在民间信仰场所拜之为民间信仰，在非宗教、民间信仰场所拜之则为迷信。对圆融于一贯道、德教等教派的济公信仰，在台港澳地区、东南亚国家，乃至世界各地的广泛传播，而形成的“信仰反哺”“老水还潮”“道弘神州”的发展态势，却不作敏锐关注与深入调研，仍以进入档案体系的上世纪 50 年代的行政模式、政策规定、监管经验，与陈旧不堪的政治、安全理念依葫芦画瓢，作为观察分析、判断处理问题的“依据”，视济公信仰在全球的勃兴而不见，更谈不上提出切合新时代实际的具体应对举措，其中自然包括开展济公信仰、济公文化交流，实现两岸“济公”的和谐统一，进而助推祖国和平统一之重要性意义的认识不足，并将这一渠道自我予以堵截、放弃，致使根生土长内地的“济公”，不能以其完整超然的宗教身份，统领世界济公信仰大势，严重地抑制了济公精神、佛学思想在新时代的不断传播弘扬，不断发展光大，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应有的贡献。

三是“正统”宗教的排斥。正是受价值观念、种类匡限、历史定性余波，与宗教职能部门的重视关注程度不同等因素的影响。长期以来，大陆内地的佛教、道教、天主教与基督教（新教）和伊斯兰教，素以“惟我正统”姿态自居，或多或少都有一种排斥外教，抑制新兴宗教发展的心理存在。以对待准国际化的一贯道为例，不时就有所谓的高僧大德发声，称“一贯道不是正教”，也有一些寺庙居然发布所谓的《伪经目录》，称济公信仰中长期流行的《慈悲济公宝忏》为“伪经”。加上地方宗教职能部门的“改政放权”，大多将宗教场所登记的审核大权，交由宗教协会，即对应的和尚、尼姑、道士、道姑、阿訇、神甫等职事人员行使，本来地位平等的“竞争对手”，跃然变为实际的“行政监管”，以致出现对没有“挂靠”佛道耶回的有神论信仰，普遍不能获得宗教场所登记，甚至在一些信仰场所的换证登记上，出现了今天是宗教信仰，且在各种条件皆未改变的情况下，明天又被取缔的咄咄怪事，济公信仰夹杂其中，境遇亦是同样。这与台港澳地区，东南亚国家明确将济公信仰界定为宗教信仰，对济公寺庙、宫观、堂坛、阁社、团体，按宗教庙宇、社团等实行登记发照，任其自由举行各类信仰活动，及在宗教场所的登记发照程序上，对新兴宗教，大多已由原来的“审批制”，改为现在的“备案制”，亦即只要检具发起人名册、章程，按规定程序提出申请，只要不违反相关的法律、法令，就应准许，而对教义、资产、经费、名称等普遍不作要求，可谓迥然不同。

继于上述原因，长期以来内地是以“层级三分”的模式，管理有神论信仰。第一层级就是以“垄断”的方式匡限宗教的种类，享受宪法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公民基本权利保护；第二层级就是对不能进入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新教）、伊斯兰教门槛的，但对社会管理有利，或者至少无碍社会管理的，则充许其存在，冠之以所谓的民间信仰或者民俗宗教、民间宗教等的美称，允许其自生自灭，但随时适地可以以政策或者官员的意志灵活调整、控制。第三层级就是对有碍社会管理，不能列入宗教、民间信仰范畴的，则定性为迷信，并视其社会影响的程度不同，或默认存在，或衍伸称之为反动会道门、邪教等，予以取缔、打击。天台济公故居自 2017 年 8~9 月间体制划归县旅游集团公司监管后，故居济佛殿因相关的宗教协会没有审核同意进行宗教场所的换证登记，与名义上的安全管理考虑，已根据有关领导的“指示”，遣散僧人、停办佛事，并一度暂停“念佛会”诵经，至此 2004 年创建的“活佛本山道场”，已纯粹质变为一个商业性经营的“旅游景点”；及天台历次举办

“中华济公文化节”，启动仪式与济公祭祀大典皆前后紧接举行，每每启动仪式结束，现职官员纷纷退场，任凭个别分管领导与济公故居、台港澳地区，东南亚国家的传法弟子、信徒信众，参访代表“自娱自乐”举行祭祀活动等情。不难看出，大陆内地称济公信仰为民间信仰，如果剥离剔除其所蕴含的历史性学术意义，剩下的内容，说白了就是一种随官员意愿，或允许、或默认的情况下践行，不过是一种存在与否都无所谓，或者说是内心本不支持，但目前尚不具条件予以完全禁止、取缔的一种敷衍应付的“官言政语”罢了。

再考“民间”一词，词性为人民中间，指的是民众方面，语境对应“官方”；“迷信”是不懂内在道理的自迷，指称对人（神）或者事物的一种迷惘、盲目，完全丧失理性的痴迷信任，语境对应“科学”。宗教则是人类社会发展一定历史阶段而出现的一种比较特殊的精神文化现象，属社会意识形态范畴。以上不能对应“宗教”，下不能对应“迷信”的“民间”一词，作为第二层级有神论信仰范围的确定标准，不但自身缺乏科学性，且也必然导致上下边界上的重迭不清，这也是济公信仰所以此地定宗教信仰，彼地却定民间信仰，相互间不能进行同一层面的正常交流的原因所在。不如乘早弃“民间”二字不用，从其本质属性将信仰分为有神论信仰与无神论信仰；在有神论信仰之下，再分宗教信仰与迷信两项以行政管理之。对不同的宗教形态（包括新兴宗教）则由宗教职能部门直接予以分门别类登记，依法管理，取消宗教协会审核宗教活动场所登记这一环节，实现不同宗教形态之间、不同寺庙（宫观）之间的地位平等，与真正法制意义上的宗教信仰自由，使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真正切实有效地保障到每一位传法弟子、信徒信众。而对有碍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有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迷信，则依法该默认为的默认，该教育的教育，该取缔的取缔，该打击的打击，该法办的法办。

另从三教修持历史与济公文化层面看，儒释道三教的圆融发展，先是以魏晋南北朝梁武帝时期为第一阶段，其时虽有三教的连称，但重在三者的功能互补，以及由此产生的相互影响，彼此间还是相对独立。在经梁武帝时期的功能互补、相互影响的基础上，至唐宋时期为过渡性的第二阶段，表现为三者于内在意识上趋向流通融合，同时也增添了诸多新的内容，虽形式仍然各树一帜，但实际已渐变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前两阶段的基础上，发展至元明清时期为第三阶段，三者之间出现了诸多的内质演变，形成圆融和合之态，并表现为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三教同修”也由相互的思想认识，转变为实践的修持炼养。佛教天台宗三祖慧思，以道门之神仙方术修命，以释家的定慧之学修性，开创先命后性、佛道双修之模式先河。北宋时期，尊道教南宗祖师的天台张伯端，则将宗教之归求分为由儒入道→由道入禅→禅道双修三个阶段，并以禅道双修为最高境界，亦即三教虽殊，同归于善，不论出于那家之口，都是以维护社会秩序、公共道德与自我完善、自我发展为出发点和归宿。济公文化研究成果也显示，无论是本我济公，还是传说济公，无论是济公信仰的成因，还是具体内容的构成，无论是史志、灯录的记载，还是戏剧（影视）、文翰（诗偈）、小说（传说）等的流布，皆与宗教信仰息息相关。总括济公的从佛人生、济世精神、佛学思想、事迹功德、修持果位，与济公信仰的诞生、传播、发展轨迹，不可否认济公信仰的基础是佛教信仰，但又嫁接道家信仰，圆融儒学文化，并以“济公”扶乩为教仪特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政治社会背景下，具有普遍的适用价值。济公信仰的精神主旨、思想体系、三教特色，与出世入世之理念，既圆融于传统的佛道二教，也兼容于近现代的其它宗教教派，并且又能作为一个独立的宗教形态，鼎足于世界宗教之林。

综上，济公信仰的宗教地位，历史铸就，民心所向。因势利导，创造条件，充分调动“济公”的传奇影响力、亲民凝聚力、慈善和谐力、认祖促统力，助推济公信仰鼎足于世界宗教之林，现实意义深远，作用不可低估。特定历史时期的一贯道、德教、天德教、皈一道、同善社等教派被取缔，无损济公信仰在新时代的绚丽光辉，更不影响济公信仰的飞跃裂变发展。离开历史事实、济公文化基础，与传法弟子、信徒信众的心理感情，强行“开除”，或者“半开除”济公的僧籍、教职，排斥济公信仰于宪法保护的“宗教信仰自由”的公民基本权利之外，自必促使境外、国外的“济公”成为孤魂野鬼，有家难返，继之产生诸多的后顾之忧，实乃宗教发展的历史倒退。

六、济公信仰之影响

济公信仰经南宋以降八百多年来的弘扬发展，民众百姓以民族传统的思维方式，极其丰富的想象力，在本我济公的基础上，通过不断的演绎、拼凑、嫁接，成功地塑造了一个亦庸亦圣、亦俗亦佛、亦凡亦仙的菩萨、天尊形象，影响及于大陆内地、台港澳地区，东南亚国家，乃至世界各地。

（一）在文学出版方面

尽管明马愉、曹鼐等辑编《文渊阁书目》中的《济颠语录》，与晁瑛撰著《宝文堂书目》中的《红倩难济颠》，目前尚未发现传本，但之后的济公小说（传说）仍是高潮迭起，精彩纷呈，续书不断，在文学出版领域形成了以《济颠语录》《醉菩提》《济颠全传》《济公传》《评演济公传》为核心的五大济公僧传系列。

1. 《济颠语录》。为早期的纪传体济公题材小说，地位重要，也是后世济公小说创作的基础范本。故事大略是讲，济公乃五百罗汉之一应真，出生浙江天台李赞善家，取名李修缘（元），成人至杭州灵隐寺出家为僧，师父瞎堂慧远赐法号道济。一生慈悲济世，但行为放浪不羁，世人称之“济颠”，后驻锡净慈寺，化缘修葺灾毁寺院，病重圆寂，阉维舍利塔葬虎跑等事迹。

现存的《济颠语录》系列，主要有以下四种版本构成：

①明隆庆刻本。又称四香高斋平石监刊本，为明隆庆三年（1569）仁和沈孟祥叙述辑编，书名有《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与《钱塘渔隐济颠禅师语录》二种，现藏日本东京内阁文库，国内尚未发现原本。

②明天启刻本。为明天启年间（1621~1627）姑苏冯梦龙（字犹龙，又字子犹）辑编的《三教偶拈·济颠罗汉净慈显圣记》；但学者魏全胜认为，《济颠罗汉净慈显圣记》的成书时间，应在万历三十一年（1603）之后。现藏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双红堂文库，国内尚未见有原本发现。比较隆庆刻本，天启刻本改动较大，即对隆庆刻本的粗略简陋处，皆加以修订、补缀，并作繁冗删减、合并，前后文气更加贯通、简洁利落。

③明崇祯刻本。为明崇祯年间（1627~1644）刊行之版本，原书卷首残缺一页，故无书名和作者姓名。1958年，文学家路工以隆庆刻本补足书名，将其入编《明清平话小说选》，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将是本收入路工、谭天合编的《古本平话小说集》，并据清乾隆刻本补足首页，定书名为《济颠语录》刊行。比较隆庆刻本，

崇祯刻本除有个别异文外，余基本与隆庆刻本相同。

④清乾隆刻本，为清乾隆年间的杭州云林寺（灵隐寺）刻本，书名题《济颠语录》，国家图书馆（前身为北京图书馆）与著名文史学家黄永年有是书收藏。

2. 《醉菩提》。清初就有“天花藏主人”编著的二十回本《醉菩提》出现，别名有《济颠大师醉菩提全传》《济公全传》《济公传》《济颠大师玩世奇迹》《新镌济颠大师醉菩提全传》《皆大欢喜》《度世金绳》等，已知有乾隆、道光、同治、光绪年间的刻本多种。是书开章回体济公题材小说之先河，上承沈孟梓的《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下启郭小亭的《评演济公传》，影响很大，且早于乾隆十九年（1754）前就流传日本，入录大庭修辑编的《宫内厅书陵部藏舶载书目》，东洋文库、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京都大学文学部图书馆、大阪府立图书馆、东北大学图书馆等均有收藏。日本还于宝历九年（1759）翻译出版了《通俗醉菩提》（京都书肆西村平八刊行），文化五年（1808）刊行了山东京传托名一休禅师改写的《本朝醉菩提》。国内发现较早的《醉菩提》，为乾隆二十四年（1759）金闾书叶堂刊本，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内蒙古师范大学图书馆、天津图书馆、大连图书馆等皆有收藏。

“天花藏主人”号蕙秋散人、荻岸散人、夷狄散人、素政堂主人等，真实姓名不详，有学者多方考证，认为是即浙江嘉兴之徐震（字秋涛，号烟水散人，生平、生卒不详），约于清康熙五十年（1711）前后在世，善著通俗小说，传世甚多，但不同的否定声音亦是很大。

《印光大师文钞·复庞契贞书》品评《醉菩提》曰：“济公传有几种，唯醉菩提最好。近有流通者，云有八本，多后人敷衍之文。醉菩提之若文若义均好，所叙之事，乃当日实事。”在《南屏宗乘颂》，大师又谓：“醉菩提、醉菩提，无智之人莫逐队；若是错认定盘星，万劫泥犁常沈坠。愿学者，善简择，顺心逆迹为上策；倘无真正择法眼，决定受损不受益。”

现存《醉菩提》系列，主要由以下二种版本构成：

一是题署“西湖墨浪子偶拈”之繁本；

二是题署“天花藏主人编次”之简本。

繁、简本的不同点主要有六：

一是繁本无桃花庵主人序，简本有；

二是繁本有天花藏主人序，简本无；

三是在分回上有四处错前错后之别；

四是每回开头不甚相同，繁本每回正文前皆有一诗作为引子，简本除第一回外，余皆无；

五是繁本正文夹杂的诗赋、偈文、曲词、联语等，约比简本多四十余处；

六是繁本约八万多字，简本则不足六万字，相差两万余。

此外，在《醉菩提》系列中，还有题“古吴墨浪子搜辑”，成书于清康熙十二年（1673）的《西湖佳话·南屏醉迹》，比而较之，主要为文字繁简不同，内容没有多大差别。另有题“张大复”所作的《醉菩提全传》，学者吴越先生之《济公全传·导读》考证，是本系据原本《醉菩提》敷衍所作，时间则在道光之后。

3. 《济颠全传》。清康熙年间，坊间就有《济颠全传》流传，文前有朱印绣像二十四幅。是书共三十六则，不分卷，别名有《新镌绣像济颠大师全传》《新镌绣像麴头陀济颠全传》等，署名香婴居士编著，存世数量甚少。目前已发现，《济颠全传》系列主要有以下三种版本构成：

①北京藏本。国家图书馆收藏，封面题“西墅道人参定”“麴头陀新本”，心发主人清独山莫棠跋语，题“西湖香婴居士重编”“鸳水紫髯道人评阅”，前图后赞，每则有总评。

②大连藏本。大连图书馆收藏，有香婴居士戊申年“小引”一篇，其余与北京藏本基本相同。

③文学所残本。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收藏。

考香婴居士即王梦吉，字长龄，清顺治十八年（1661）前后在世，杭州人，余不详。

学者一般认为，《济颠全传》与《济颠语录》文字接近，有一种前后承袭关系，唯前所写的高宗、孝宗事，与济公圆寂后的轶闻有所不同；而高宗、孝宗事，采自明末崇祯年间武林（旧时杭州的别称，以武林山得名）周清原，别署济川子的短篇平话小说集《西湖二集》（卷二），文字相同；但学者胡胜先生的《济公小说的版本演变》，则从书题重编用意、名称贴近、内容相近等方面分析，认为《济颠全传》，既非全同于《济颠语录》，亦非全同于《醉菩提》，而是在《醉菩提》的基础之上，有继承、有发展的重创之作。

如果说从《济颠语录》到《醉菩提》，济公的形象尚能基本保持一致；而自《济颠全传》始，济公已由原来的狂放不羁，转变为处处以道德劝诫为先，以整饬风化为任之状态。比较而言，《济颠语录》和《醉菩提》似乎受传统力量的影响大一些，但就文字的雅驯，结构的别致，《济颠全传》又胜《济颠语录》《醉菩提》一筹。

4. 《济公传》。清乾隆九年（1744），吴门（古苏州的别称）仁寿堂刻《济公传》十二卷，首页题“西湖渔樵主人编”，卷首有序，署“乾隆九年季春金陵旅寓枫亭王宣撰”，是书现藏日本宫内省图书寮，国内尚未发现原本。学者孙楷第的《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介绍，该刻本内容与《济颠语录》相同，唯分为十二卷各立标题而已，与二十回本《醉菩提》关系不大；但学者胡胜先生则坚持认为，该书是《醉菩提》的压缩改编本，与孙的观点不甚统一。也有学者认为，是版本的《济公传》内容有了较多的创新发展，即已经掺和了不少公案传说，如其中“转蠢成灵替虫将军下火”一节，明显就是后来路人皆知的“济公斗蟋蟀”故事。

考王宣，字枫亭，号渔樵主人，钱塘（今杭州）人，生平、生卒不详，清乾隆初年（1736）旅居金陵（今南京）。

5. 《评演济公传》。作者清郭小亭，为济公传说故事的集大成之作。先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三十二年（1906），宣统元年（1909）由中原书局、煮字山房、章福记书局、江左书林、有益斋、校经山房等，以《评演济公传》（十二卷，一百二十回）刊行；继之刊行《评演后部济公传》（十二卷，一百二十回），与前传媲美合璧。至后，续书不断，葛啸侬、坑余生等续至一千七百五十五回（580万字，浙江古籍出版社）。

由于《评演济公传》（前后传）续书不断，篇幅远远超过原著，加之出版单位诸多，书名变化频繁，主要有《评演济公传》《济公全传》《济公活佛全传》《绣像评演济公活佛传》，与《济公传初集》《济公前传》《初集济公活佛传》《济公活佛初二三集》《〈济公活佛全传〉之〈初集〉》，及《评演后部济公传》《续济公传》《济公后传》《四续济公传》《四十续济公传》《济公传二集》《〈济公活佛全传〉之〈二集〉》，与《二集济公活佛传》等。

《评演济公传》通过大量生动有趣的传说故事，对济公亦庸亦圣、亦俗亦佛、亦凡亦仙的形象有着生动的描写，读之妙趣横生，回味无穷。济公善掐会算，未卜先知，法力无边，神通广大；他慈悲为怀，治病救人，曾使盲者复明、哑者能言、死者回生；他嫉恶如仇，惩恶

扬善，庇护弱小，路见不平，出手相助；他铲除邪道，镇压恶势，保护地方，维持佛法；他充满智慧，经纶满腹，游戏人间，诙谐戏耍。从不同角度展现了济公的智慧、慈悲、正义、平等的优秀品格。同时，《评演济公传》系列，又把济公塑造成一个不看经、不坐禅的狂僧、颠僧，特出表现为不守戒律，喝酒吃肉，整天“醉里乾坤，壶中日月”，但从中又能清楚地感悟，济公追求的是一种“纯任自然、无修无证、随缘放旷、任性逍遥”的心灵自由，他的“颠狂”行状，实非精神状态的疯疯傻傻，而是一种天然本性与本具佛性的真实体现；济公的信口狂歌，一切皆空，表面似乎消极，恰恰又能从这种看似消极之中，道出了他的出世入世，不断进取的真谛。《评演济公传》系列，是济公小说创始以来，篇幅最长、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并深受好评的一部经典佳作，故事生动有趣，语言文字通俗，结构安排、人物塑造、思想表达都别具特色，独树一帜。

至于前已述说的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收藏的《足本济公全传》（二百八十回，世界书局，题清王梦吉编著），与《绣像绘图通俗小说·济公活佛》（二百八十回，香港长兴书局），推测可能是据郭小亭《评演济公传》翻印之异本？详待考。

继至民国初年，江苏无锡杨钟钰，据舞台演出的《济公活佛》，将其改编为《济公活佛真传》予以出版。解放前后，不同底本石印或者铅印的济公小说到处流传，没有刊印成书的评书底本、记录本数量更是惊人，如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文化编辑室，现存一部济公故事的评书记录本，估计当有上千万字，尚未整理出版。及后，大陆内地没有再版过古本济公小说。直至1983年，有关部门才准许花城出版社，据桐乡乌镇敬元潘恒收藏的二百八十回本《济公全传》，删去后三十八回，予以重排少量印刷，内部发行，仅供研究通俗小说和民间文学的学者参考。随后来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逐步落实，并济公登上舞台、银幕、荧屏，据各种旧版本重新排印的“济公僧传”正续本四处刊发。其中一些底本仅是说书艺人的即兴发挥，没有经过文人的订正润饰，相对而言，功底较浅，文字粗糙，前后雷同现象普遍，尤其是早先北方说书艺人的底本，因不熟悉江南，以及杭州、天台等地的地理、风俗，也不了解南宋社会之政体、宗教之背景，句语信口开河，不当在所难免。

不过，之后创作的较为优秀的济公僧传为数亦是诸多，例如：

陈玮君的《济公外传》（1987·浙江文艺出版社）、止戈的《济公的传说》（1987·浙江文艺出版社）、浙江科技出版社的《济公故事系列》（1990）、蔡庆生主编的《浙江省民间文学集成》（1991·浙江文艺出版社）的济公故事、天台民间文学集成编辑部编辑的《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天台卷》（1992·浙江省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的济公故事、陈东友的《济公系列小说》（1992·辽宁教育出版社）、赖永海的《济公和尚》（1993·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徐建华、宋仲琤选编的《中国佛话》（1994·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济公故事，许尚枢的《天台山济公活佛》（1997·国际文化出版社）、《济公文化面面观》（2016·上海古籍出版社），杭州文化局辑编的《西湖民间故事》（2000·浙江文艺出版社）的济公故事，庸非、赵征的《济公传奇》（2000·海燕出版社），洪无的《太空颠狂·济公禅师大传》（2003·时代文艺出版社）、孙雅菊的《济公故事系列》（2003·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孙幼军的《小济公传》（2004·春风文艺出版社，原名《仙篮奇剑传》），曹志天、赵达枢的《济公传说·济公童年少年故事》（2007·天马出版有限公司），刘魁立、柯玲的《济公传说》（2008·中国社会出版社），杨建新主编，余云安、许周纳辑编的《济公传说》（2009·浙江摄影出版社），徐立新、俞应祥的《济公传说》（2009·北岳文艺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的《山

海经故事丛书·济公的传说》(2009)、罗伟国的《话说济公》(2011·上海书店出版社)、孙明辉主编的《天台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济公传说》(2015·中国社会出版社),赵霞、张芳的《精彩故事360·济公的故事》(2012·天地出版社),吴越的《济公全传》(汉典古籍网),明德的《明德济公研究》(2015·天台济公故居管委会)、《济公与济公故居志》(2016·中国出版集团现代出版社)、《济公禅师度世妙法经释义》(2018·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以及《民间文学》等期刊,与各省(市、县、区)民间文学故事集成等的济公故事登载。

宝岛台湾,也有不少优秀济公小说问世,其中以《济颠大师大传》(萧湘君辑录,萧天石与沙门广定、儒士郑灿审订)、台中圣贤堂的鸾书济公《地狱游记》(1979·圣贤杂志社)、济公《天堂游记》(1981·圣贤杂志社),与台中重生堂的鸾书《原灵园游记》《莲花佛国游记》的济公故事影响较大。

正是济公小说(传说)的各类版本如潮,连著不衰、流布不断。无怪乎,现代著名作家、学者、翻译家、语言学家,新道家代表人物林语堂,在其《人生的盛宴》中如是予以肯定,“受中国民众所爱戴的最伟大的疯和尚无疑是济颠和尚,又名济公,他是一部通俗演义的主人公,这部演义越续越长,其篇幅至今约比《堂吉诃德》多了三倍,看来似乎没有完结。”

(二) 在文化艺术方面

1. 书法、绘画。宋释居简禅师的《湖隐方圆叟舍利铭·济颠》载,济公“信脚半天下,……天台、雁荡、康庐、潜皖,题墨尤隽永”,足见济公的书法造诣颇深。前述福建漳浦梁山下“清泉岩”佛寺石刻林,摹刻济公手书的《心经》,计150字,超凡脱俗,狂放不羁,字中生字,怪中生怪,有的似蛟龙遨游,变幻无穷,有的如挂空藤蔓,错落有“姿”,十三行中竟有六行出现超乎寻常的竖笔长拖,最长超过二米,打破传统的书法格局,历为书法研究学者所注重,临摹不断。

最早济公画像的产生时间,目前很难稽考,但据明沈孟样的《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清天花藏主人的《济颠大师醉菩提全传》所谓,济公当世的某一日,出门闲走,遇一画师扯着他道:“我昨日一时高兴,偶画了一幅喜神在此,你可细看看像哪个?”济公看后大笑道:“丑头怪面,倒像我的嘴脸,我又无钱送你,为何替我画了出来?”画师道:“我感你做人好,故白替你画了,但是需自家题几句在上面方好看。”济公道:“这个容易。”遂提笔写道:“面黄如蜡,骨瘦如柴;这般模样,只好投斋也。也有些儿诧异,谈禅不用安排。”“远看不是,近看不像,费尽许多功夫,画出这般模样。眉如扫帚,一张大口,不会非言,只会吃酒,看看白头,常常赤脚。有色无心,有染无着。醉眠不管江海波,浑身褴褛害风魔。桃花柳叶无心恋,月白风清笑与歌。倒骑驴子归天岭,钓月耕云自琢磨。”这可能是有关济公画像的最早记载。稍后,则是收录清释际祥《净慈寺志》的南宋嘉定十四年(1221)余逢辰的《济颠禅师石刻像》(嘉庆丁巳「1797」朱文藻摹)。再至后来创作的,大多都受济公小说(传说)形象的影响,风格迥异,艺术特点绚丽多彩。如清末四川释竹禅九十八岁时所作的济公像,脸庞丰满,俯首微笑,一副慈悲睿智、关怀众生疾苦的佛相,因之被《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选作“道济”条目的插图,成为某种意义上的济公“标准像”。虚云老和尚重辑、宣化上人增订《佛祖道影》的《五十世济颠道济禅师像》,慈眉善目,方耳

大口，八字胡子，手执芭蕉扇，神情飘洒脱俗。民国二十一年（1932），誉尊近代“菩萨”的王一亭游普陀山所绘，赠龕提庵刻植于山门南侧石室“净土堂”的南屏佛祖（济公）像，阔笔写意，笔墨酣畅，气势雄阔，但又不离实之本色。中国美术学院国画系教授、书画鉴赏研究中心副主任林海钟团队，创作于灵隐寺济公殿的十八幅大型壁画，内容有：济公父亲李茂春施粥百姓，国清寺求子，降龙罗汉佛像坠落；济公降生，乡邻道喜，少年济公，好习佛经；济公灵隐寺剃度出家；济公施智救寻死农夫，帮其赎回女儿；灵鹫飞来；戏弄恶僧广亮；火烧大悲楼；济公化缘重修大悲楼；灵隐寺飞来峰；秦相强拆大悲楼，寺僧遭难；济公大闹相府，寺僧获救，重修大悲楼；净慈寺古井运木；八魔炼济颠；济公圆寂；济公再现六和塔；济公重回国清寺；降龙罗汉回归石梁五百等。可谓集济公的一生圣迹于一殿展示，乃济公绘画之中的精品巨作也。刘锡永、黄大华的连环画《济公斗蟋蟀》（刘画 1956 年·上海新艺术出版社；黄画 2009 年·中国文化出版社），与 2000 年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上海书店联合出版的彩色漫画连环画《济公传奇》，及 2009 年浙江文艺出版社的《济公的传说》，与 2013 年郑勤砚、魏亚西的绘本《民间传说·济公》（21 世纪出版社），2018 年 9 月康华、蔡峰的连环画《济公传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一问世就受到少年儿童的热捧。在济公画艺的创作中，范曾、王金泰、刘庸、戴云辉、王德亮、马哲、艾晓临、潘之、金如槐、李沈斌、陈曾豹的济公画，或寥寥数笔，或长卷写意，或水墨淡彩，各擅胜场，颇为传神，无不蕴含济公形象的逸趣。2001 年 8 月，大连市俄罗斯街出现一位全身古铜色的“济公活佛”，开创济公形象人体彩绘之先河。

作为四大平面印刷收藏品的烟标（烟卡）、火花（火柴盒贴画）、邮票（明信片）、酒标，济公形象、济公故事素来为产品生产商所钟情青睐，并为消费者所喜爱。迄今已发现，民国时期及后，中国德隆烟公司、中国永和烟草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正昌烟草公司、山西德记烟公司、广西柳州卷烟厂、昆仑烟草公司、华品烟公司等，皆有《济公传》烟标、烟卡发行；其中，华品烟公司发行的《济公传》烟卡，不同的济公图像有近百种之多。1985 年游本昌主演的电视连续剧《济公》播出后，常德卷烟厂，发行了《济公》烟标，浙江邮票公司出版了《中国人民邮政明信片·济公》（12 张）。早年，日本的浮士绘（江户时代「1603～1867」兴起的风俗画、版画）火花就有济公的图像出现。誉称“中国火花收藏第一家”之樊瑀的《中国火柴老贴画·解放前》，也收有济公图像的火花。1980～1990 年，上海、天津、南京、长沙、汕头等地相继也有济公图像、济公诗词的火花发行，其中 1988 年南京轻工产品设计室诸辛耕设计的，南京火柴厂发行的《济公传》火花，全套 100 张，首枚为济公手摇破扇的半身像与“济公”名称，余 99 枚皆系“济公诸相图”“火烧大悲楼”“大闹秦相府”“济公斗蟋蟀”“巧断垂金扇”“醉打万珍楼”“怒打铁面佛”“计惩花太岁”“重修净慈寺”等超微型传说故事，并配少量的文字说明，为图像起点睛作用，艺术地展现了一个好打不平，息人之争，救人之死的活佛形象，颇具收藏价值。济公酒标民国时期就已出现，较早有广东万福堂“卫生酒”的济公酒标，继之有河南地方国营南召县酒厂的“济公乐”酒标、辽宁新宾满族自治县酒厂的“济公酒”酒标。济公故里天台，红石梁集团济公家酒坊有限公司、道济酒业有限公司，秉承济公李府的传统酿酒工艺，法以现代科技，以“济公家酒”“道济家酒”为酒标面市的传统酿制黄酒系列，更是任君欣赏，任君品尝、任君收藏。

2. 雕塑、建筑。最为接近真人济公的天然雕像，可谓南宋释居简禅师《北磻集·释签岩

记》所载的，“嘉定二年（1209）春……余登赤城绝顶，浣洗肠井，智浚之，则甘泉源源有乳色，瞰书记岩，临焚稿池，憩释笠岩，周览江山，徘徊不忍去，感昔人嘻难殄瘁之所成就，而光明卓伟如此。”即于济公圆寂之前，居简禅师登天台赤城山时，发现一块颇似济公面容的岩石，称之为“书记岩”。1547年前后成书的明郎英的《七修类稿》、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余》亦载，其时的杭州净慈寺罗汉堂已有济公佛像供奉。万历十五年（1587），山东济南长清灵岩寺千佛殿出现“济颠和尚”的罗汉彩塑；至清，灵隐寺罗汉堂也供奉济公。其后的各种济公像，大体都是传说济公不修边幅、诙谐洒脱、滑稽风趣之形貌。诸如，苏州西园寺罗汉堂清代创作的济公雕像，站在过道中，脸部一半作笑，一半作哭，以一副幽默表相面对人生；天台赤城山济公院一尊济公像，脸部表情更为生动，从左看“春风满面”，从右看“愁眉苦脸”，正面看“嗔喜各半”，充分体现了济公“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哪里不平哪里就有我”的秉性；五台山显通寺的陶瓷济公像，面带微笑，颈挂黑色佛珠，两手分执僧鞋、破扇，襟袖不整，一副形骸放浪、无拘无束的表情；著名表演艺术家、电影《济公》主演游本昌收藏的竹雕济公，通高36.5厘米，上部圆雕济公像开怀大笑，下部则是整竹雕成的大酒瓮，可谓匠心独具；高公博的济公百态，储立之、虞金顺的醉济公陶塑、雕塑，也是春兰秋菊，各有千秋。河北徐水古酒、四川邛崃济公酒，酒瓶皆以济公形象造型，亦是颇有创意。台湾一贯道神威天台山道场的四面济公圣像，慈悲喜舍，眷顾四方；高雄旗山凤山寺，1967年开光的济公像，罗汉造型，右手持扇，左手握酒壶，为全岛最高；嘉义南恩寺的济公像，戴一副墨镜，以挡西晒，为外宣的一大亮点；台南南化乡还有一尊双面济公像，与天台赤城山三相济公像类似，妙趣横生；宜兰一寺庙供奉的济公，其随身法器不但有太阳镜、大哥大（手机）、手表，且还配有一把乌兹冲锋枪，可谓摩登之极。

济公形象与建筑设计互为融合。2004年重光的天台济公故居，在城区赭溪南岸不很宽敞的济公李府遗址上，再现南宋封建仕宦府邸布局的“三进九明堂”。东面的故居陇西园，富济公表相。跨园门而入，葫芦放生池，一泓碧水，涟漪荡漾。池中“钓月亭”、颈处“耕云桥”，皆以济公自题画像中的“倒骑驴子归天岭，钓月耕云自琢磨”之诗句命名，频展济公视功名利禄如云烟水月，禅意浓浓。主体济佛殿，两侧山墙与门窗裙板，分别采用济公传说故事的砖、木浮雕镶嵌装饰。假山“降龙亭”，寓意济公降龙罗汉转世。倚角“醉仙楼”，顶置济公酒葫芦，金光闪闪，隐喻济公喜酒行侠，匡扶正义，抑恶扬善，法力无边。2005年3月，获浙江台州“建设工程括苍杯金奖（优质工程）”。

天台赤城山济公西院为中国工程院齐康院士之设计力作，建筑风格奇特，依势造房，频展济公个性、形象，主要由破袈裟、破帽、酒葫芦、破鞋、破扇等一系列象形建筑“小品”组成，游廊相接，构思奇特。“袈裟台”依山就势建造，柱高13米，从基础直透屋顶，结构酷似破袈裟，四面透风，宛若褴褛飘然，有超凡脱俗之感，屋顶的根根椽条斜插土中，隐喻济公魂归故里，精神永恒；“破帽”屋顶与岩壁间挂有一串环状佛珠，勾勒出一顶济公帽轮廓，主院形似济公的破帽子，名“八盖阁”，隐喻济公帽法力覆盖四面八方，阁内栏杆连椅，可供游人小憩；“葫芦斋”整个建筑形状似一个横放的葫芦，别有一番情趣；“破鞋”建筑形如济公的一只破芒鞋，山门四面敞开，顶上藤蔓缠络，野趣盎然；“破扇”为接待室，雅室数间，结构前宽后窄，形若济公的一把破扇子，寓意深深。1993年获全国“建筑师杯”优秀奖，1996年被评为浙江省风景名胜优秀建筑。与济公西院比肩而立的济公东院，建筑采用天庭院式，坡顶粉墙交替，使人感到典雅、亲切，同时又有一种寻幽访胜的神秘感。

如果说济公西院似一位云游颠僧，则济公东院更像一位端坐、小憩的禅师。

3. 音乐、舞蹈。济公形象深入人心，与济公影视中的乐曲传唱不能分开。人们一提起济公，耳边就会响起游本昌主演的《济公》，由张鸿喜词、金复载曲、何纪光演唱的“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哪里有不平哪有我”的主题曲。歌词紧扣济公的形象特点，突出表现济公的“彰善瘅恶”精神，男女老幼反复传唱，红尘方外皆认成功。再如游本昌主演《济公游记》的童音歌曲《心平歌》《心与莲花随》《心净自成佛》，张默主演《济公新传》的《快快乐乐笑王侯》《观自在看花》，陈浩民主演《济公活佛》的《快乐颂》等，佛理禅意浓郁，平添神秘色彩，充满诗情画意。

约产生在清乾隆年间，流行浙江舟山定海、普陀一带的“跳灶舞”，为海岛渔民喜庆丰收时表演的一种舞蹈，后来发展为农历腊月二十三祭灶的一种仪式，以示送旧迎新，祈求消灾免祸。因其舞姿动作逗趣，酷似跳蚤，民间戏称其为“跳蚤舞”。节目原无人物情节，只有两位舞者跳跃逗趣。民国十一年（1922），定海白泉教书先生章孝善，将传说的“济公斗火神”故事融入其中，始有火神（女角）与“济公”两个人物形象。火神身穿红绿花袄，一手握花伞，一手提香篮，一闪右一闪左躲着“济公”前进，“济公”着僧衣僧帽，腰系草绳，手握破扇，一闪左一闪右阻挡火神行进，构成“驱赶火神，祈求太平”之吉祥意境。新中国成立初，再由双人舞改编为群舞，配上“舟山锣鼓”，以高跷形式展示，成为一种节奏明快，舞步粗犷，诙谐逗趣，充满喜剧氛围的滩头舞蹈；1953年，章孝善弟子何福志将其搬上舞台，1955年2月获浙江首届民间古典音乐舞蹈观摩大会大奖，入编《浙江省民间舞蹈集成》。现普陀展茅等地，仍有它的身影延续。

武义柳城畲族的《花轿迎宾·济公救新娘》一出，两顶花轿，假人抬、真人坐，进退摇摆自如，动静相间，声形并茂，为民众百姓所喜闻乐见。温州鳌江，每当收获季节，都要举行“迎龙”民俗活动，中间伴有《济公跳升平》舞蹈。河北昌黎秧歌《抢亲》，也是根据济公传说，艺术表现济公打抱不平，戏弄恶少，拯救民女的故事。贵州苗族的水鼓舞，也融入济公传说内容，欢乐色彩更为浓郁。

4. 戏剧、曲艺。早于南宋时期，就有陈德武《马头调·醉打山门》的“鲁智深……我出家来这五台，吃的是甚么斋，西天的活佛今何在？那济颠僧，五荤都用他全不戒”的曲词入戏。虽说是段文字把济公的生平向前作了挪移，使其成为与梁山好汉同期的北宋人物，但作为一种反映民众百姓愿望与祈求的戏剧表演，却也感觉自然。

至元，孔学诗以“疯僧扫秦”为内容的《东窗事犯》，与无名氏所作的《东窗记》剧目问世，大略讲：南宋岳飞率岳家军在朱仙镇抗击金兵，朝廷却颁诏班师，回朝后被秦桧以“莫须有”罪名杀害。一日，桧至灵隐寺进香，济公化身风魔和尚“叶守一”，揭露了秦桧夫妇东窗下密谋陷害岳飞之事，并地帚扫秦，痛斥他违天理人心，终究要遭报应。桧哑口无言，派何宗立捉叶。哪知人去楼空，留诗几句。桧又命何去东南第一山追缉，何在阴司看到桧披发戴枷，由鬼吏押着走来，东窗事发。何宗立回转阳世，已过二十年，讲起秦桧在阴司受报之事，大快人心。其中的《满庭芳》曲词流传广泛，曰：

南渡功臣，中兴良将，平金奋志驱兵。太师秦桧主和议，奸罔朝廷，伪诏班师。东窗下与夫人设计，诬陷岳飞父子，屈死非刑，更堪怜堕井银瓶（岳飞次女，闻父兄死，鸣冤不果，投井而死，终年十三岁）。那秦丞相被冤魂迷弄，心疑忌，往灵隐寺斋僧，遇叶守一从头点化，报应甚分明。方显忠良谗佞，千古谩评论。

及至明代，姚牧良在《东窗事犯》《东窗记》的基础上，将其改编为《精忠记》，剧本的情节与思想性得到全面加强，更为贴切地表达了民众百姓的愿望。有资料统计，京剧、川剧、苏剧、汉剧、徽剧、秦腔、同州梆子、河北梆子、桂剧等都有此剧目，足见其影响于一斑。嘉靖二十六年（1547），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余》也载：“杭州男女瞽者（盲人），多学琵琶唱古今小说平话，以觅衣食，谓之陶真。大抵说宋时事，盖汴京遗俗也。……其俗殆与杭，无异若红莲、柳翠、济颠、雷峰塔、双鱼扇坠等记，皆杭州异事，或近世所拟作者也。”明末清初，吴郡张大复（又名彝宣，字心其，号“寒山子”）再新创《醉菩提》一剧，以济公传说为题材，塑造了一个不饬细行、饮酒食肉、市井浮沉，匡扶正义、抱打不平的“颠僧”“侠僧”形象。清末，随京剧戏班入上海戏园表演，由评书《济公传》改编的《赵家楼》《火烧大悲楼》《马家湖》《古天山》《双头案》《白水湖》《慈云观》《八卦炉》《八魔炼济颠》等折子戏，风靡大上海，其后发展为连台本戏《济公佳话》，于光绪四年（1878）献演。光绪六年（1880），又有上海天仙茶园的《济颠拿旱魃》《济公僧戏耍知县》演出。民国初，上海新舞台编演的十八本《济公活佛》，由丑角夏月珊饰演济公，诙谐幽默，配上机关布景和幻灯魔术，舞台效果更为强烈；上世纪40年代老闸戏院上演七十二本《济公传》连台戏，由“三公老生”筱芳锦主演济公，唱腔挺拔清越，表演亦庄亦谐，谓极一时之盛。

1981年，上海昆剧团据济公传说故事，新编了《济公三戏花太岁》一剧，于是年3月5日献演于上海劳动剧场，由此揭开内地济公信仰再度得以恢复的序幕。剧情分《问尸》《拾赃》《救贞》《初戏》《再戏》《三戏》六出，演恶霸花太岁诈取兴隆绸店店主陆应藩钱财，害其性命，又栽赃于陆婿高国泰；济公洞察命案，作法纸人如生，伴随陆女淑贞，几番几次予以保护。最后，在余杭县大堂，揭露并惩罚了互相勾结的花太岁、知县及其狗腿，陆应藩复活，高国泰释放与陆淑贞团圆。游本昌的小品《济公办学》、河南平顶山宝丰的魔术剧《济公》、湖北仙桃沔阳的花鼓戏《济公追踪》等，也是深受民众百姓的欢迎喜爱。

宝岛台湾，清代流行自泉州传入的布袋戏《济公传》，接有皮影济公戏。上世纪下叶，济公电视布袋戏风行；罗兰的《济公传》诗歌剧，将传统艺术与现代表现手法完美结合，全新演绎了济公的艺术形象；明华园的歌舞《济公活佛》，多项获奖，并于1990年至北京参加“十一届亚运艺术节”演出，成为备受瞩目的焦点。在新加坡，也有武侠古装剧《济公活佛》演出。

济公曲艺，是以济公人物、济公事迹、济公传说为题材，通过说、唱、演、评、噱、学等演艺，表现济公的艺术形象。清同治年间（1864~1875），就有东北沈阳有王奎盛等的“十八奎”名嘴讲《济公传》。民国早期，自著名评话演员范玉山自编长篇评话《济公》起，曲艺舞台相继出现了评话《济公》范（玉山）、虞（文伯）、沈（笑梅）、陈（浩然）四大家。范玉山模仿苏州西园寺罗汉堂的济公形象起角色，大小眼睛、高低眉毛、歪嘴、半只面笑、半只面哭，诙谐风趣，常常引起听众捧腹大笑，说演随机应变，撒得开，收得拢，每回书都有“肉里噱”，人称“活济公”。虞文伯仿照无锡“泥人张”的济公造型，舌头往上翻卷，一手敲鼓，一手击钹，滑稽可爱，他丹田充沛，不但有洪亮的阔音，还有独特的尖音，一声“掌心雷”，脆而响，声震梁椽，有“滑稽济公”之誉。沈笑梅塑造的济公，是一个喜欢杯中物的大舌头吃醉济公，他语言俏皮，以面风、眼神、手面表演吃醉的济公另有一功，听众称他为“醉济公”。陈浩然十六岁起说济公，那时还是童声时期，他抓住这个特点，用小

嗓子发音起济公角色，既天真又幽默，引起听众的极大兴趣，人称“小济公”。当代评书艺人辽阳施夔星采集济公逸闻传说，说起书来出神入化、曲尽其妙，也有“活济公”之誉，他的《济公对诗》收入《中国评书精华·志怪卷》；杭州王超堂播讲的评话《济公传》，亦是深受欢迎。流行于浙江温州及毗邻地区的具有代表性意义的曲艺品种——温州鼓词（过去艺人多为盲人，故而又称“瞽词”或“盲词”），济公故事历来是主要的演出剧目之一；2006年5月，“温州鼓词”与天台的“济公传说”一道经国务院批准，列首批公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5. 影视、旅游。民众百姓对济公的尊隆、景仰、爱戴，促进了济公影视事业的不断创作发展。自1926年上海开心电影公司上映《济公活佛》（四集），近百年来，影视界的“济公热”可谓高潮迭起，此起彼伏，接连不断，从未止息。其后播出的济公题材的电影、电视剧主要有：

伊秋水主演的《济公活佛》（1939）、《济公活佛》（1949）、《济公三气华云龙》（1950），洪波主演的《济公传》（1950），梁醒波主演的《济公新传》（1954）、《济公火烧琵琶精》（1958）。新马师曾主演的《济公活佛》（1964）、《济公大闹公堂》（1965）、《济公怒斩白骨精》（1965）、《济公斗八仙》（1966），蒋光超主演的《济公活佛》（1969）。金骅主演的《万家生佛》（1971~1972），岳阳主演的《济公活佛》（1975），野峰主演的《佛跳墙》（1977）、《乌龙济公》（1978）。许不了主演的《新济公活佛》（1982）、《降龙罗汉》（1984），林国雄主演的《济公》（1985）、《济公活佛》（1986），龙冠武、小彬彬主演的《糊涂神仙》（1986），石英、陈子强、澎恰恰主演的《大小济公》（1987），郑平君、佩佩主演的《快乐神仙》（1988）、吕凉主演的《济公外传》（1988），赖慧中主演的《大小济公》（1989）。游本昌主演的《济公》（1985）、《济公活佛》（1989）、《济公游记》（1998）、《济公·古刹风云》（2010）、《济公·茶亦有道》（2010）、《济公游十方之·天台篇》（2012）。顾宝明、游安顺主演的《济公新传》（1991），周星驰主演的《降龙罗汉与济颠》（1993），周明增主演的《济公》（1995），谢韶光主演的《活佛济公》（1996），周明增、林佑星主演的《济公活佛》（1997），梁荣忠主演的《济公》（1997）。麦嘉主演的《济公传奇》（2001），张默、张澜澜、韩雨芹主演的《济公新传》（2006），龙绍华主演的《济公》（2007），韩东岳、韩文青的《济公新传》（2008），陈浩民主演的《活佛济公》（2009）、《活佛济公·2》（2010）、《活佛济公·3》（2013），霍正奇主演的《济公十八嫁》（2011），郑元畅主演《济公之人皇鼎》（2015），郭德纲主演《济公传》（2016）。

而在济公影视系列中，还有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剪纸片《济公斗蟋蟀》（1959），妙趣横生，赢得少年儿童的满堂喝彩。盛世龙吟（前身为杭州奇想动画工作室）2003年制作的三维动画《济公·飞来峰》，社会反响良好，2004年获全国CG动画大奖；2005年推出的3D动画《济公》，艺术地展现了神通广大、云游天下的济公，笑对众生，一把破扇除暴安民，惩治仗势欺人恶霸，戳穿骗子假仁假义，与妖精斗法，与坏人斗智，匡扶正义，替天行道，一双冷眼看透世态炎凉，一副热肠扫除人间不平，由人赞，凭人笑，随人骂，任人嘲，逍遥自在无挂碍，亦颠亦狂亦俗流的为僧形象，颇受少年儿童的青睐、喜爱。2016年6月20日晚19:00时，天台济公故里与央视动画联合打造的动漫《小济公》（52集），于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播出，受到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收视率不断飙升，先后获第三届中国文化

艺术“最佳动漫作品”奖，国产动画发展专项资金项目“二等奖”，浙江省第十三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实现天台历史零的突破。

大略估计，时下两岸四地正热播的济公影视至少也在十部以上，足见济公故事已经成为影视事业发展的重要根基与源泉所在。

随济公影视广泛传播，济公的鲜明个性及其形象特征，早已涵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民众百姓的一种精神理想和幸福追求，极大地促进了旅游产业的发展。已经为国家5A级风景旅游区的天台，乘势以济公的“智慧”“担当”“正义”“神奇”，打出“佛国仙山，济公故里”口号，并经上级台湾事务办公室批准，每年举办“中华济公文化节”，通过“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平台与国际济公祭祀活动，充分展示天台山独特的风土人情和悠久的历史，推进全域旅游发展，进一步提高自身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海南澄迈济公山，原名石栏岭（山猪岭），1993年8月发现一巨石的模样，“歪破的毡帽、高耸的鼻梁、笑眯的眼睛、滑稽的嘴巴、颠荡的身态”，酷似济公活佛而易名，经省地质大队勘测论证，农垦总局批准立项开发济公山旅游度假区，现已发展为具各类景点50多个，景区面积达25平方公里的旅游度假圣地。湖南邵阳的济公岩景区，亦因一石形态诚如济公，结合传说济公曾于此修炼，留下济公岩、济公庙、济公亭，与豪珠岩、僧鞋亭、架袈亭、破帽亭、蒲扇坳等景观、遗迹，并济公曾于一洞内水宫濯足的故事而开发。天台济公故居、赤城山济公院，杭州灵隐寺、净慈寺，与台湾高雄的一贯道神威天台山道场、凤山寺，嘉义的龙隐寺等济公寺庙，也因活佛之名成为旅游观光的首选场所。

（三）在民风习俗方面

1. 名号衍生。随济公信仰、传说故事，与济公形象的不断流布，由此衍生的地名诸多。如济公故里天台的木鱼山和利济桥，讲的就是小西门外，始丰、赭溪两条溪流绕城，交通十分不便，民众纷纷上书，请求县衙牵头组织修桥铺路，谁知杜知县对百姓的要求充耳不闻，一心算计霸占国清寺的金木鱼，结果被济公用破蕉扇扇进溪沟，金木鱼变成了“木鱼山”，挡住恶水，并将杜知县压在底下，木鱼柄随水漂流到小西门外，变成了一座弯月弓桥，百姓遂称之为“利济桥”。

杭州灵隐寺前的飞来峰，是讲四川峨眉山，有一座会飞的山峰。济公掐指算来，某日中午这座奇异山峰，就要飞到杭州灵隐寺前面的村庄上来，届时将要压死很多人，于是五更天起床，进村挨家挨户劝说大家赶紧收拾衣着细软逃生，不料没有一个人相信。眼看中午临近，山峰就要飞来，济公见一户人家娶媳妇的花轿刚到，急中生智，赶忙推开众人，把刚出轿的新娘子往肩上一背，就往村外飞跑。“和尚抢新娘了！”“和尚抢新娘了！”这下把全村的人都给轰动了，不管四邻九舍、亲戚朋友，还是男女老少，全都追了出来。济公这才放下新娘，往地上一坐，人们也刚好追到他的跟前，一声“轰隆隆”的巨响，飞来的山峰刚好压在他们的村庄上。

衢州开化铁佛寺的故事，讲的是一对蛇妖变成人形混进肖山岭寺庙当和尚，正经不念，专干谋财害命勾当。一天，他们假装到徐塘高韩村化缘，看到那里人寿年丰，民风淳朴，顿起害人之念，从身上捉了几只跳蚤丢进水沟，口中念念有词，顿时变成血吸虫寄生钉螺，再乘人下水时，钻进人的身体。不多时，该村的男女劳力都染上了血吸虫病，家家唉声叹气，苦于求医无门。两蛇妖乘机放话：“大肚成畚箕，神仙也难医，用我祖传方，才能病根

除。”许多患者为了解除痛苦，只好跑到肖山岭来求。可这两个家伙黑了心肠，要价极高，一纸处方需银几十两，除了少数财主，民众百姓哪能承受得起？大祸临头，无钱硬撑。死的死，迁的迁，人兴财旺的高韩村很快败落下来，由上千烟灶剩下二三十户。济公听闻这个消息，气得七窍冒烟，专程赶至开化，亲自找这对残害百姓的妖孽算账。那天一早，济公单枪匹马跑来叫阵，蛇妖只好仓促应战，双方就在肖山岭背斗起法来。蛇妖吞云吐雾，搅得天昏地暗，济公抖动破袈裟，来个风卷残云；蛇妖摇动尾巴，引起飞沙走石，济公轻摇破扇，来个晴空霹雳，把沙石扫落一旁。蛇妖的雕虫小技，哪抵得上济公的无边佛法。不到几个回合，蛇妖便原形毕露。济公一手一条将蛇抓起来，往悬崖上狠狠一甩，妖孽也就呜呼哀哉了；再略施小技，从破袈裟里抓出几只大虱子，告诉民众把它放到有血吸虫寄生钉螺的地方，一物降一物，大肚病自然也就减轻、消逝了。当地百姓为纪念济公慈悲惩恶，就把济公斗法的形象铸成铁佛，镇守山门，又把寺庙更名为铁佛寺。

此外，济公与民众百姓亲密无间，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以济公，或以济公俗名修缘、法号道济命名衍生的公司、厂家、商店也是层出不穷，如广东济公保健食品有限公司、潮州济公食品有限公司，东莞修缘饰品有限公司、杭州修缘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台湾修缘钢铁有限公司，北京道济测绘有限公司、浙江道济酒业有限公司、香港道济化妆品有限公司等，及前已述说的火花、烟标、酒标，与济公山旅游度假区、济公岩景区等，可谓数不胜数，无不说明济公信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政治社会背景下，皆具增进经济发展、人民福祉的价值效能。

2. 美食传承。外地人来天台济公故里作客，一提起“饺饼筒”，无不啧啧称奇。一张薄薄的面饼皮，卷进各种荤素菜肴，敷油稍烤，色香味俱佳，既可主食又可下酒，传说就是永宁李府（亦有谓国清寺）预约的客人未到，小济公将剩菜包卷在面饼皮中创制。南宋绍兴年间进士林洪的食谱《山家清供》，在“煨金煮玉”美食的制作说明中，专门辑录了济公《笋疏》的“拖油盘内煨黄金，和米铛中煮白玉”妙句。无锡酱排骨，色泽酱红、咸中带甜、酥烂浓香，传说其秘制方法也是济公对屡次施舍熟猪肉店主的回赠。此外，天台的济公八大碗、杭州虎跑的“济公宴”，以及流传至今的济公狗肉面等美食，不乏也与济公信仰、济公文化的传承、影响联系密切。

3. 教人节俭。不少济公传说在长期的流传中，已经成为后人的口头禅。如南宋嘉泰四年重修净慈寺时，工匠多，斋粮将尽，济公从怀里取出一个小口袋，往千人锅中倒进七粒米，加上八担水，熬成粥，居然能让几百名工匠饱餐一顿，杭州人因之称节俭为“七粒米，八担水”。

4. 辞汇增益。随济公信仰、济公故事的流传，经民众百姓的不断归纳、提炼，不少语句发展成为反映生活经验，或者表达愿望，简练形象，既带文言色彩，又具口语气息、通俗趣味、交流便捷、广泛流行的定型语种——俗语（也称常言、俗语）。如前已述说的“念弥陀，捣蟹酱”，解读就为“惩恶即是扬善”。郭小亭《评演济公传》描述济公回天台时所抒发之“兔走荒台，狐行败叶，俱是当年歌舞之地；露冷黄花，烟迷剩草，亦系旧日征战之场”的感慨，更是成为后人叹怀世事无常，所屡屡引用的妙句佳语。东阳也有“一家不知一家事，和尚不晓大智寺”，寓意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源出济公信脚弘法途中，发现有这么一座古寺坍塌衰败，而由衷发出的叹息。百姓更是期望当政为官，“为民办事像济公，忠诚可靠像关公，公道正派像包公”。济公富有个性化的言行、穿戴，也被民众总结发展为言简意赅，朗

朗朗上口，形象难忘的歇后语，诸如：

- 济公趴梁——没位置；
- 济公装束——衣冠不整；
- 济公走路——疯疯颠颠；
- 济公医病——主动上门；
- 济公救苦——寻声而行；
- 济公当和尚——不吃素；
- 济公破蕉扇——神通广大；
- 济公酒葫芦——法力无边；
- 上吊遇济公——想死死不了；
- 济公过日子——讲吃不讲穿；
- 济公吃狗肉——不管清规戒律。

（四）在民间医学方面

济公医术高超，早于南宋，就有释居简禅师《湖隐方圆叟舍利铭·济颠》的“勇为老病僧办药石”记载；上世纪下叶，又以道家名医入编日本吉元昭治博士的《道教与不老长寿医学》。江苏无锡道院壬遁手录的《坐功秘要·济佛静坐篇》，以扫除妄念，凝神固气为炼养法门，圆融佛道两家于一炉，互证互参，将劝人行善与疾病治疗有机结合，诚具修持炼养特色，为传法弟子、信徒信众和病患所普遍欢迎。台湾圣德杂志社刊行的《圣德治病秘方》，内辑传为济公留下的单方、验方多种。香港康济会同人惯以“济公”的乱方治病，实践中也颇具疗效。

赵达枢收集于天台济公故里的《济公学医》谓，当年济公李府的斜对面，住着一位祖祖辈辈行医的郎中，姓齐名渝，颇有名气。少年济公看到齐郎中医术高超，十分羡慕，来到齐家，要求齐收他为徒。齐郎中知道小济公为对门李茂春员外的少爷，再三推辞，不肯收留，并告小济公，郎中是“下九流”，把行医说得分文不值，地位低贱非常。可是，不管齐郎中怎样贬低行医，小济公还是“缠”着非学不可。齐郎中拗不过小济公，只得瞒着李员外，偷偷教小济公医术。小济公勤奋好学，触类旁通，举一反三，进步很快。父亲李茂春获悉此事，不但没有反对，并且鼓励他要学就要学好。从此，小济公跟着齐郎中，采访四方，遍尝百草，那些药作用什么，如何配伍，都是了若指掌。后来，济公离开天台山，至杭州灵隐寺出家，因之也就有了“勇为老病僧办药石”，与辗转市井、乡间，为民众百姓治病的事迹流传。林语堂先生的《人生的盛宴》因之赞评济公，“是生活于一个魔术、医药、恶作剧和醉酒的世界里”，是中国“最伟大的疯和尚”。

七、济公信仰的圣地打造

“圣地”，汉语释义为神圣的境界，通常指称祖国的土地，或对建国，或对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建设等具重大历史意义、纪念意义的地方（区域）。宗教信仰之圣地，多指与教主、开宗立派祖师的生平、事迹，或与是教发展有重大关系、重大意义的寺庙、处所，为传法弟子、信徒信众的信仰家园与精神故乡，彰显教主、祖师的悲智愿行、殊胜功德的尊

隆。诸如，佛教尊尼泊尔的蓝毗尼（佛祖释迦牟尼诞生地），印度的菩提伽耶（佛祖成地道）、拘尸那迦（佛祖圆寂地）；道教尊江西鹰潭的龙虎山（道祖张道陵天师于此炼丹），四川成都大邑的鹤鸣山（张天师于此创“正一盟威道”，俗称“五斗米道”）、都江堰之青城山（张天师于此飞升）；基督宗教尊耶路撒冷（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存在权属争议，现实为以色列管控），伊斯兰教尊沙特阿拉伯的麦加、麦地那为圣地等。

“祖庭”一词，语出西汉礼学家戴圣辑编的《礼记·檀弓上》，即“小敛于户内，大敛于阼，殡于客位，祖于庭，葬于墓。”唐李端的《代宗挽歌》、李商隐的《重祭外舅司徒公文》也有“祖庭三献罢，严卫百灵朝”，“属纆之夕，不得闻启手之言，祖庭之时，不得在执紼之列”的述说。由此可见，祖庭一词的本义有三：

- 一是指祖庙的中庭；
- 二是指于祖庙之中庭举行祭祀仪式；
- 三是指送殡前于祖庙中庭举行奠祭仪式活动。

汉语发展中，祖庭的外延、内涵已经扩大，如清初诗人、戏曲作家，大成至圣孔子第六十四代孙孔尚任的《与莓垣书》曰：“家门诸务，惟赖吾弟一人调护其间，如波涛柱石，孤立良难。愚虽身处江湖之远，而心仍在祖庭之前。”是处的祖庭，明显是指家里的“祖屋”；“百度”亦释“祖庭”为“祖屋，家族之旧居”，同时也指“佛教宗祖布教传法之处所”。延伸而解之，宗教信仰之祖庭即祖庙，为教主创立宗教，或祖师开宗立派、修行证果、弘法利生、译经传教、传灯续明的发祥道场（寺院、宫观）、处所等。以汉传佛教为例，八大门派祖庭分别为：天台宗祖庭天台山国清寺；净土宗祖庭庐山东林寺，西安悟真寺、香积寺；禅宗祖庭嵩山少林寺；律宗祖庭西安沣德寺、净业寺；唯识宗（又名法相宗、慈恩宗）祖庭西安大慈恩寺、兴教寺；华严宗祖庭西安至相寺、华严寺；三论宗祖庭西安草堂寺；密宗祖庭西安大兴善寺、青龙寺等。传法弟子、信徒信众通过对祖庭这一载体的尊隆景仰、朝觐谒拜，亲身领受教主、祖师的教导与加持，并永远归敬铭记，传承效法。由此足见，祖庭乃一教或一派的法脉延续与弘扬发展的中心，教义研习与合作交流之纽带，具有联通心灵、凝聚共识、增进情谊等的地位与作用。

“圣地”与“祖庭”的词性关系，一般而言，前者外延相对较大，后者较小。不过，二者又可融通使用，如天台山国清寺，既可谓佛教天台宗圣地，也可称佛教天台宗祖庭；又如天台山桐柏宫，既可称道教南宗圣地，亦可谓道教南宗祖庭。

宗教发展中，大凡尊称“祖庭”者，都有自己的经、律、论体系，与相关的教义研发、传承、弘扬的配套机构等，如佛教天台宗祖庭天台山国清寺，根本论著有智顱讲述，门人灌顶笔录的《法华玄义》《法华文句》《摩诃止观》，有教义传承、研发、弘扬的配套机构天台山佛学院（前身为1931年创立的天台山佛学研究所）；道教南宗祖庭天台山桐柏宫，根本论著有祖师张伯端的《悟真篇》《禅宗诗偈》（又名《悟真篇后遗》），与《玉清金笥青华秘文金宝内炼丹诀》，有教义传承、研发、弘扬的配套机构浙江道教学院（2013年12月，经国家宗教局和中国道协批准设立）。同时，作为祖庭通常还应具备各类典仪活动开展的平台、场所，与传法弟子、信度信众的朝觐规模相适应的条件与设施配套。

甚为遗憾的是，济公信仰流传虽近千年，且已成为准国际化的大教，但至今尚无统一公认的信仰圣地、信仰祖庭，相关经文散落不同的教派而没有系统整理，也没有相应的教义传承、研发、弘扬的机构配套，亦无与传法弟子、信度信众朝觐规模相适应，能够开展各项

典仪活动的平台、场所。因此，根生土长天台的“济公”，要统领世界济公信仰大势，必须按照济公信仰圣地、信仰祖庭的要求，统一规划，并化大力气整合、建设，逐步予以完善配套。

（一）济公信仰祖庭的地位确立

天台永宁济公故居谓济公之降生血地，又为济公“罗汉转世”，赭溪芥菜用水救钱塘（今杭州）火灾，拜师学医等传说故事的最早发源之地。小济公于此沐浴着天台山的阳光雨露长大，滋润了天台山之儒释道三教的精华，并于此炼就“自强不息、崇尚气节，勇于闯荡、敢于冒险，粗犷狂野、机智灵活”的天山风骨与硬气。永宁李府灭失^[16]后，民众百姓早于明永乐年间（1403~1429），就在李府遗址建“济佛院”，香火鼎盛。2006年5月，国务院将天台济公传说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予以首批公布；2008年4月，《中国六大传说保护与传承共同宣言》在浙江诸暨发表，天台济公传说与“白蛇”“梁祝”“孟姜女”“董永”“西施”传说一起，列《共同宣言》的保护、传承范围。2012年12月，在“浙江省最具地域特色文化符号（民间故事）网络评选”中，天台济公传说再度获“最具地域特色民间故事奖”。2013年6月21日，在“浙江·台湾合作周天台分会场启动仪式——2013'济公成道祖庭祈福大典”上，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台湾南投县政府、彰化醒义宫专门敬赠济公故居（故居济佛殿）“天下济公，祖在天台”立轴、题匾。2013年12月，浙江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批准天台济公故居为省级“对台交流基地”；2014年7月，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批准天台济公故里为“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因之，将天台济公故居定位为“济公信仰祖庭”，无论是在济公的为人成长，还是在济公信仰、济公传说的传播发源，及大陆内地、台港澳地区，东南亚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济公信仰丛林，与传法弟子、信徒信众的感情心理、至极尊隆上，都是具有唯一性。

再考济公为僧，既未在佛门开宗立派，又未于一寺终老，其中居天台山国清寺时间非常之短，仅仅几天而已，住杭州灵隐寺也未满六载，驻锡净慈寺则不足九年，续佛慧命，信脚天下，弘法布道却长达二十五年，加之其一生儒释道三教圆融同修，皆成正果，亦庸亦圣，亦俗亦佛、亦凡亦仙。因之，很难把相对比较专业、单纯的诸如济公的出家寺庙国清寺、剃度受戒的灵隐寺、驻锡圆寂的净慈寺、舍利塔葬的虎跑寺，及其曾经入住、挂单的佛教寺庙，如东阳大智禅寺等尊为“济公信仰祖庭”，唯明代于天台永宁济公李府遗址建设的“济佛院”，不但围墙有“济公遗址，活佛祖庭”的八字标识，而且事实也为江南济公传法弟子、信徒信众，开展“济公”扶乩，朝觐活佛的丛林中心。此外，元释熙仲的《历朝释氏资鉴》，明沈孟样的《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释大壑的《南屏净慈寺志》，清释际祥的《净慈寺志》也载，济公寂后亦曾作偈云：“脚絣紧系兴无穷，拄杖挑云入乱峰；欲识老僧行履处，天台南岳旧家风。”表明济公本人意愿也是魂归故里，落脚故居。

由此足见，把天台永宁济公故居定位济公信仰祖庭，不但具有历史的延续性，符合时下济公信仰传法弟子、信徒信众的感情现状，且与三教固有传统、汉语发展伦理也不相悖。不顾济公故居的历史唯一性，想当然、拍脑袋，在天台山随意新建或者指定一处寺庙为“济公祖庙”，或者以所谓的“济公文化园”之类的项目建设，充之为济公信仰祖庭，不但不能领军世界济公信仰大势，且也无法取得世界各地的济公信仰教派，及其衍生的济公寺庙、宫观、堂坛、阁社、团体的普遍承认，还有可能引起的济公信仰祖庭的宗教争议，带来不必要的麻

烦。所以，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在天台济公故里零打碎敲的项目落地最多，不过也是增添一时的热闹，扩大扩大济公信仰的影响而已，与打造宗教意义的济公信仰圣地、信仰祖庭的作用意义不大。

（二）济公信仰祖庭的整合改造

以济公故居作为济公信仰祖庭，自应恢复故居本来的历史风貌，各类布展犹要体现济公文化，凸显济公信仰的儒释道三教圆融特色，同时又要按统领世界济公信仰大势的要求，进行必要的硬件改造与软件配套。诚然，目前济公故居的欠缺、不足非常明显，主要表现为：

1. 房屋使用，布局甚不合理

粗略统计，现外单位占用的计 20 多间，故居自行出租的 40 余间；同时，李府、陇西园、观霞阁又有大量的房屋关空（堆放杂物），亦即一面是应当配套开放的展室严重不足，管理人员占用“李府”展室办公，一面却是大量房屋被占用、闲置或作商业经营，在使用上甚不合理，本末倒置。

2. 布展自相矛盾、不当诸多

（1）故居陇西园入口小天井南照墙的《复建济公故居记》第二段，开段载“济公（一一三〇～一二〇九）……弱冠之年皈依佛门”，是即济公降诞于 1130 年（南宋建炎四年），二十岁皈依佛门（西汉戴圣的《礼记》谓：“二十曰弱冠”），圆寂于 1209 年（南宋嘉定二年），段末却又谓济公“嘉定三年五月十四日圆寂于净慈寺”。嘉定三年即 1210 年，段末所载比开段所云增加了一年。

而考相关史籍文献，对济公的出生年份记载，大略有：

①1193 年。明沈孟祥的《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载，济公出生“宋光宗三年十二月初八日一更时分”。宋光宗三年即南宋绍熙三年，是年的十二月初八，公元已为 1193 年初。

②1181 年。清王梦吉的《新镌绣像麴头陀济颠全传》谓：济公出生“孝宗七年，腊月八日三更时分”。孝宗七年即南宋淳熙七年，是年的腊月八日，公元已为 1181 年初。

③约 1150 年、1150 年。《中国大百科全书》载：“道济（1150？～1209）”，释明复的《中国佛学人名辞典》谓：“道济，宋比丘。……以嘉定二年寂，寿六十”，推算济公降生于 1150 年。释慈怡主修、释星云协修的《佛光大辞典》，《台州地区志》、业露华的《佛教小百科·历史》等著之记载，与《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佛学人名辞典》大略相同。

④1149 年。明释大壑的《南屏净慈寺志》谓：“道济，字湖隐，天台李茂春子。母王氏梦吞日光而生，绍兴十八年十二月初八日也。”绍兴十八年十二月初八，公元已为 1149 年初。藏族学者久美却吉多杰编著，曲甘·完玛多杰所译的《藏传佛教神明大全》亦谓：“济公和尚，1149 年生”。《辞海》《天台县志》等著之记载，与《南屏净慈寺志》大略相同。

⑤1137 年。明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余·方外玄踪》谓：“济颠者，本名道济。……年七十三岁端坐而逝。”释明河的《补续高僧传·二颠师传》，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上海集云轩的《济师塔院志》，引清马如龙、杨鼎等的《康熙杭州府志》，魏修的《康熙钱塘县志》等著之所载，大略与《西湖游览志余》相同。据南宋释居简的《湖隐方圆叟舍利铭·济颠》、明释大壑的《南屏净慈寺志》载济公圆寂 1209 年推算，济公出生于 1137 年。

⑥1133 年。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梁同书的《宋道济和尚塔复向碣》载，“和尚名道济，宋绍兴三年降生于台州李氏。”宋绍兴三年，为 1133 年。“中文百科在线”亦谓，济

公降生于“1133年二月初二”。

⑦1134年。民国上海集云轩的《济师塔院志》，引《明德摹济师法象泐石文》，称济公降诞于“绍兴三年十二月初八日”。绍兴三年即1133年，是年的十二月初八，公元已为1134年初。

⑧约1130年。《国清寺志》（1995）载：“道济禅师（约1130~1209）”。

⑨1129年。《辞源》（1991）载：“济颠，公元1129~1202年”。

其它还有称济公为北宋人氏，具体就是南宋末陈德武的《马头调·醉打山门》一剧，有“鲁智深”颂唱的“那济颠僧，五荤都用他全不戒”的曲词出现，据之认为宋江聚众起义始于北宋徽宗宣和元年（1119），失败于宣和三年（1121）五月，而“鲁”为宋江起义的重要参与者之一，既有“鲁智深”颂唱济公的曲词入戏，则称济公为北宋人氏；也有谓济公是元代人氏，依据就是清褚人获的《坚瓠集·济颠赞》载济公为：“元僧道济”；更有台湾台南的《永康乡志》载，“济公活佛系宋朝天台宗僧济颠，亦云唐末僧济颠。”

鉴于史籍、文献对济公的降诞年份表述不一，除个别例如称济公出生于1193年、1181年，即济公的生命年龄仅17岁、29岁，及谓济公为唐末、北宋、元代人氏的，可以直接不予采信的外，其它的皆不能贸然肯定，但也不能随意否定。故在济公的出生年份考证没有关键性突破前，论述济公生年惟以“？”替代为妥，至少也应以“某某年？”指代。

再者，以济公《辞世偈言》的“六十年来狼藉，……如今收拾归来”推衍其生年，也难以自圆其说。问题在于《辞世偈言》本身没有明指“六十年”是僧腊（僧尼受戒后的年岁，或曰僧龄）还是生命年岁，且可能还是个大致概数。以致该《偈言》一问世，后人在解读上就一直没有统一。诸如，明释大壑的《南屏净慈寺志》辑录济公圆寂治丧时，温州江心寺住持全大同长老的《送净慈济书记入龕文》就谓，济公“临行四句偈云，今日与君解释。从前大戒不持，六十年来狼藉，囊无挑药之金，东壁打到西壁。”清梁同书的《宋道济和尚塔复向碣》亦称，济公“往来于灵鹫（灵隐飞来峰）、慧日（净慈慧日峰）两峰间者，且六十年。”清楚可见，全大同长老与梁同书都是以僧腊“六十年”解读《辞世偈言》，如此济公的生命年岁应为僧腊六十年再加出家年龄。诚然，目前已经发现济公的出家年龄，又有“十七说”（萧天石《济颠禅师大传·序》）、“十八说”（释大壑《南屏净慈寺志》）、“二十说”（释明复《中国佛学人名辞典》）、“二十一说”（释圣光《虎跑佛祖藏殿志》）、“二十八说”（喻长霖《台州府志》）等说法多种，不能确定。故以济公的《辞世偈言》推衍，也不能准确得出济公出生何年的结论。

而据南宋释正受的《嘉泰普灯录·瞎堂慧远传》，明吴之鲸的《武林梵志》、沈孟样的《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瞎堂是“乾道乙丑敕居崇先，明年被旨补灵隐”，推算慧远乃1170年奉敕主灵隐寺丈席；济公是于当年的“二月十三日吉”自天台起行杭州，至灵隐拜师瞎堂慧远祝发。前已述说，自元代伊始就有疯僧“叶守一”揭露奸相秦桧与其妻王氏密谋东窗，陷害岳武穆，并以地帚“疯僧扫秦”的故事流传与戏剧献演。事经清梁章钜的《浪迹续谈》、现代徐宏图的《济公戏曲贯古今》等著考证，疯僧“叶守一”是乃济公化名。考奸相秦桧死于1155年，如以释大壑的《南屏净慈寺志》推衍济公降诞1149年初，即桧在世时，济公还是个七岁孩童，尚在天台永宁李府功读、玩耍，又何能至灵隐揭露秦桧与妻密谋东窗，陷害岳飞？又何能为和尚“疯僧扫秦”？如以《辞源》《国清寺志》认定济公出生1129年、1130年，则济公至杭州灵隐拜师剃度的年龄应为41~42岁？则又何来

“弱冠之年皈依佛门”之说？且依当时的宋金战争态势分析，1129~1130年，济公父亲李景逊尚有可能还没有辞官至天台永宁建府定居，则又何能肯定1130年济公已出生永宁故居？可谓采前依后都存在矛盾，无法相互印证，自圆其说。作为济公信仰祖庭的“正史”介绍，相关内容必须实事求是，不能想当然以没有普遍认同的“研究结论”作为定“案”依据，更不能“自相矛盾”，忽悠济公丛林与信徒信众、观光游客。

(2) 祖堂无济公李氏祖先牌位供奉，壁挂祖辈人物像有悖传统。前已述说，济公李氏之世系为：一世祖李渊→李元婴→李修珽→李怀义→李环→李威→李适→李仁让→李守心→李仲耘→李崇矩→李继昌→李遵勳→李端恣→李升→李涓→李景逊→李修缘（即济公）。但是，祖堂仅仅只是壁挂了李崇矩之下的祖先像，不知何故又漏缺了济公曾祖李升，却又把济公高祖李端恣之兄李端懿（济公高大伯祖）、李端愿（济公高二伯祖），与李端愿之子李评（济公堂曾伯祖）之像也插入置挂，显是有悖传统，且又在祖先像前置放“太师椅”，人若坐之，背朝祖先，更是不伦不类。还有，在祖堂展柜陈列南宋释居简的《湖隐方圆叟舍利铭·济颠》，本身已不是十分协调，原因乃济公年轻已出家空门，不宜于故居祖堂布展济公之相关物品，且又不知出于何因？竟然又把居简禅师《舍利铭》的“它日觉（祖觉）死，叟（济公）求予（居简）文祭之”，抄印作“它日觉死，叟予文祭之”，不但文意全变，且也严重违背史实。

(3) 李府展室严重缺位。现在的“济公李府”，仅有一祖堂、二厅堂、济公父母卧房、济公卧房（兼书房）、佛堂、女眷客房、济公奶娘房、管家房，及济公生平与文化交流展室等开发，不但数量严重欠缺，且其中的大多又是明清款式的家具、摆件（饰品）迭放，与当时的客观实际不相符合。所谓的珍宝室（存放友好宫庙、友好人士的馈赠物品等），置设府第东北角二楼，没有对外开放。友人所赠的书画等作品，皆是作为档案收藏，亦未作定期轮换展出。

而据济公小说（传说），李景逊夫妇随宋室南迁，于高祖李遵勳、高祖母万寿长公主之封邑天台建府定居，嗣后亦农亦工生活。农者，即在居地东北面的赭溪两岸购置了大片田地，经营农业；工者，即开办酒坊，酿造黄酒，经营销售。随李府宅邸建设与田地购置、酒坊开张，及景逊夫妇平常敬佛崇道，且与时任国清寺方丈交情甚笃，为人于周边的影响迅速传播，居地百姓遂将村东北面的大部为李氏所有的一片丘陵田地，改称“李家垟”。其中的李氏酒坊，则为今日天台济公家酒坊有限公司、天台平西酒厂拳头产品“济公家酒”“道济家酒”系列之品牌渊源。因之，完全可以推理当年的济公李府，除相应的厅堂、卧房外，必定还有相关的藏经房（清王梦吉《新镌绣像麴头陀济颠全传》载，李府“供五千四百八十三卷内藏真经”）、书房、账房（管家、账房先生办公）、小厨房（济公家人等用餐）、大厨房（管家、账房先生、工友、长工等用餐）、制酒工房、仓房（囤积粮食与酒类产品等）、柴房、厕所，畜舍（牛栏、猪栏）等存在。此外，济公僧传诸多有载，济公舅父王安世（士）夫妻与子王全（泉）、女秀莲，亦随济公父母同居李府，济公是在父母双亡守孝服满，在王安世夫妇操办他与秀莲婚事之时，至国清寺出家。故济公故居的展室布置，必须符合历史风貌，有相应齐全配套的展室展出。

再则，济公乃龙子凤孙，世系显赫，门第高贵，且一生传奇。他不守戒律、颠狂不羁，却道济天下、普度众生；他衣衫褴褛、形骸放浪，却满腹经纶、才思横溢；他地位卑贱、横遭非议，却备受景仰，敕至尊佛称仙，而深受民众百姓、信徒信众、传法弟子的爱戴。因之，完

全有必要于李府开辟展室，衍伸出济公精神、佛学思想，济公李氏世系，父亲李景逖南迁、永宁府居生活，与济公生平、为僧法嗣、济世事迹、修持果位，灵异神通、传说故事等，及大陆内地、台港澳地区、东南亚国家，乃至世界各地的济公信仰状况，并有相对完整的济公文学出版、文化艺术、民风习俗、传统医学诸领域的内容展出，从而成为表里如一、名副其实的“济公文化博物馆”。甚为遗憾的是，故居目前的布展可谓左支右绌、顾此失彼、遗漏甚多；至于其中的明清款式家俱、摆件，更是清泉濯足、花下晒裤、大煞风景，明眼人一看就是“假”得离谱，理应无条件更换。

(4) 观霞阁布展无文化内涵。是阁系据清郭小亭《评演济公传》记载李府的“问心楼”，与济公父亲隐居天台后，敬佛崇道，一年府中所做之事，皆于岁底陈列于账，再撰表章，于“问心楼”祭祀后，焚烧交天，而无一事隐瞒上苍之传说故事，及登是阁可观县城之北的“不与众山同一色，敢于平地拔千仞”的赤城栖霞胜景，而取“观霞阁”之名复建。问题在于，现是阁的济公佛像展出，游客寥寥无几，且在济公信仰祖庭打造与济公文化的弘扬、传播上亦无一文可取。究其原因，主要有二：

①清一色的济公石佛堆放，不是商店恰似商店、不是仓库恰似如仓库，既无视觉美感，亦无济公文化内涵。

②天台城区已是高楼林立，即便登阁也无赤城栖霞胜景可观，且是阁建筑由于先天设计与后天管理原因，三楼环阁走廊（阳台）与阁身连接的榫卯皆出现不同程度的脱开，虽经事后组织加固，但环阁走廊仍被建筑质鉴单位指令关闭，不得对外开放。

有鉴于此，不如早下决心，承继济公小说（传说）文脉，恢复“问心楼”旧称，亦可考虑易名“祭天楼”。以传统的“祭天”文化为背景，两宋时期的祭天典仪为蓝本，在阁供奉昊天上帝、日月星辰、云雨风雷神像、牌位，辅之以是楼由来的解说，定期（不定期）举行济公李氏祭天典仪，由“李茂春”手牵“小济公”主祭，从而成为济公圆融儒道二教的形象渊源所在。

(5) 永宁村、石墙头牌坊介绍欠缺。永宁村牌坊，典故出自济公父亲李景逖隐居天台，先是以汴京开封“驸马府”与浙东“三进九明堂”结合之建筑形制，建设李府宅第；接又在宅第东面建陇西园，作为先祖祖籍陇西成纪之纪念，兼作宅第的配套花园。而随李府宅第与陇西园的落成，及李景逖为人的影响传播，民众百姓遂将居地更名“永宁村”，寓意承继北宋朝廷赐第高祖李遵勖、高祖母万寿长公主开封永宁里驸马府皇恩，兼祈地方永远安宁之意。景逖夫妇为感激地方民众百姓的村名易名，于是处置建“永宁村”牌坊，作为村之地标建筑予以报答。

“石墙头”牌坊，是乃济公李府湮灭后，元末浙江黄岩方国珍首义抗元，曾于李府遗址筑寨屯兵。至正十四年（1354）九月，方攻下台州城后，定都临海称帝建“宋”，随后兵营迁离，留下断壁残垣，俗称“石墙头”。清宣统三年（1911）得中“拔贡”的天台名贤陈甲林辑编的《天台山游览志》亦载：“距跃龙门里许，地名石墙（也称石墙头）。按旧志，元末方国珍（1319年～1374年，又名谷真，浙江台州人，元末浙东农民起义军领袖）曾于城北筑寨，取从化桥之石为城。其故址（方国珍筑寨遗址），当在此。”石墙头牌坊是为纪念方国珍首义抗元筑寨而建，出处时间大在方国珍立“宋”之后，与济公李氏没有文脉上的联系。

鉴于“永宁村”“石墙头”牌坊的文化源流完全不同，有必要于牌坊小广场立碑（或

采其它形式），连同济公李府西北角二楼观景平台的《方国珍抗元攻台筑寨处碑》，一并予以说明、介绍，以不使信徒、游客看后，一头糊水，不晓其来龙去脉。

（6）陇西园济佛殿道场，三教圆融特色不能体现。是道场未曾停办前，除济公圣像外，与之配套的几乎清一色都是佛教神灵的供奉，道场僧人亦系商业性雇佣，唯一只能承接佛教佛事，既无法与历史上的梵天极乐宗、理教、义和团、皈一道、一贯道、同善社、天德教、中国济生会、德教，也不能与现代相关的济公信仰教派协调。因之，有必要考虑将现醉仙楼改为“同源殿（楼）”，供奉始祖神——盘古、女娲、伏羲、黄帝、炎帝（神农）、蚩尤（九黎氏族部落首领），三教教祖——大成至圣孔子、释迦牟尼、太上老君，功德神——济公、观音、吕祖（吕洞宾），英烈神——关帝、岳武穆、李涓（济公祖父）等神灵，使之与当前台港澳地区、东南亚国家，乃至世界各地的一贯道、德教、理教、天德教、轩辕教、天帝教、康济会、圆玄学院、东井圆佛会等教派的神灵供奉有所对接，同时又不失中华传统文化、天台山文化与济公文化的“本土”特色，以显济公信仰祖庭之地位超然。

3. 相关配套设施不足

济公故居之现有食堂系占用消防通道临时搭建，且面积较小，既无法按济公信仰祖庭的教义要求，供奉神佛，举行用斋典仪，也不能对施主供斋；游客、施主车辆基本占用赤城路的非机动车道停放；参加夜间法事活动的施主住宿无法解决。因之，必须下决心“东拓”，实施对东北面二幢公寓式住宅（计 54 户）的拆迁，连同故居复建时预留的一块空地，一体解决济公信仰祖庭的斋堂、客房、停车问题。

4. 济公文化严重失落

现管理济公故居的“天台县济公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为县旅游集团公司下属的一个纯粹的旅游经营实体。人员的济公文化素养总体低下，更无打造济公信仰圣地，创建济公信仰祖庭，引领世界济公信仰大势的精神状态。长期以来，济公信仰的经、律、论研究空白，亦无专业网站与正规期刊（杂志）刊发，济公文化严重失落。所谓的故居济佛殿道场（停办前），不过也就是雇佣了若干名僧人，开展佛教法事活动而已。偶遇“贵宾”需要作故居历史文化“导游”的，介绍内容亦是平庸粗俗，陈旧不堪，错误累迭，与当前济公文化研究的前沿成果完全脱节。已经挂牌的“海峡两岸交流基地”与“天台县济公文化交流协会”，前者与县台湾事务办公室二块牌子一套班子，人员皆是兼职，既无专业济公文化研发人员，也无相应办公场所，每年的工作仅是争取县财政拨点款，筹办一场名义上的“中华济公文化节开幕式”，请几个领导捧捧场、讲讲话，会同济公故居临时拼凑一台“济公祭祀典礼”而已，结束就没下文，亦无具体的日常工作开展；后者虽自 2007 年挂名“成立”，但由于相关手续之不完备，又于 2013 年重新发起申报，至今未曾召开会员大会，会长、副会长、秘书长等皆由几个发起人“自封”，2015 年又接县委组织部通知，国家公务人员未经批准不得兼任协会理事以上职务，相关人员辞职，因而也没有实质性工作可言。所以，要打造济公信仰圣地，创建济公信仰祖庭，亟需对济公故居管理力量实行整合、调整、增添，招募济公文化学者、佛道二教的职事人员，开展全员的济公信仰、济公文化素养培训，在佛教佛事的基础上，增益承接道教法事，并济公信仰的经、律、论整理，创办专业网站、刊发正规期刊，研发“济公”扶乩，一待政策许可，即按要求开展“济公”扶乩试点。通过各个方面的不懈努力，进一步拓展济公信仰、济公文化的交流空间，不断扩大济公信仰祖庭在济公丛林的影响。

5. 无济公慈善活动开展

天台济公故居、故居济佛殿分别自 2004 年 5 月 10 日、2005 年 5 月 10 日重光、开光以来，一直没有组建自己的慈善机构，亦无相应常规的慈善活动开展。《天台济公故居济佛殿章程》规定的“济佛殿全年结余后，提取 20% 作为下一年度活动资金，其余部分上解济公慈善总会”，用于济公慈善事业，实际没有真实贯彻履行，且所谓的“济公慈善总会”牌子又一直增挂于“天台县慈善总会”。2018 年上半年，“济公慈善总会”牌子亦被有关部门注销，加之现故居济佛殿道场因不能取得“宗教场所”的换证登记，且已奉命停办，《济佛殿章程》已成一纸空文，开展济公慈善活动源头断水，无从谈起。这与济公信仰祖庭的地位要求，与近现代中国济生会、天台济公会，与当代一贯道、德教等教派的宗教慈善义举，可谓相距甚远，亟需认真补课，奋起直追。

（三）济公信仰祖庭的广场建设

鉴于天台济公故居是在济公李府的遗址上，为故居的复建而复建，占地北连赭溪路（实际为城市道路）、包括牌坊小广场仅 16.74 亩，其中东面又留空地亩余，实际可用面积不足 14 亩，房屋建筑面积仅 6300 平方米，压根没有考虑济公信仰的朝觐广场配套。故居济佛殿是乃复建过程中，据济公的“有问山僧何处去，天台南岳旧家风”寂后偈，于本来的陇西花园牵强置立。如此狭小的场地，既无法举办大型法会，也不能举办国际性的济公庆典、祭祀活动，即便对东北面二幢公寓式住宅实施拆迁“东拓”，也无法实现相关功能的完整配套。因之，要打造宗教意义上的济公信仰祖庭，必须规划新址建设济公朝觐广场，从而实现一故居、一广场，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珠联璧合的济公信仰祖庭架构。

诚然，建设济公朝觐广场，必须与济公故居保持紧密的文脉衔接，规模应当立足一个“大”字，同时又要兼顾旅游开发、公共集会，市民休闲锻炼等功能之一体发挥，从而招徕、吸引大陆内地、台港澳地区、东南亚国家，乃至世界各地的济公寺庙、宫观、堂坛、阁社、团体的传法弟子、信徒信众，来济公故里朝觐济公、秉承加持、续灯传明，至天台山旅游观光。

根据上述要求，经对近临天台城区周边的山地空间考察，笔者力荐济公朝觐广场，选址城北三角坦柑橘场山“天台山”地标隔路北面的“和合林”山岙，理由有三：

一是和合林山岙与国清景区、赤城景区、旅游集散中心、济公故居互为犄角，其中与国清景区约 2.5 公里、赤城景区约 3.5 公里、旅游集散中心约 2 公里，济公故居约 1 公里，彼此间具有相互的拉动效应。

二是和合林山岙西北面紧邻“李家垟”、永宁村，与济公李氏的历史文脉接近、区间主题突出，又能与济公故居密切照应，风水互为得益，既不与国清景区的佛教天台宗文化，也不与赤城景区的儒释道三教圆融文化产生竞合、冲突。

至于目前天台旅游集团在赤城山东面山岙，规划所谓的以“济公祖庙”为中心的“济公文化园”，一旦实施，将是赤城景区建设上的一大难以挽回败笔。

①赤城山素以古色古香、柳暗花明、诗情惬意、小家碧玉型的三教圆融文化称著于世，再于此落地纯粹旅游观光、休闲娱乐性质的大体量的现代化建筑、设施，任凭如何谋划、布局，必然不能与区间的环境协调、和谐，且与打造济公信仰圣地、创建济公信仰祖庭的意义完全脱节。

②在三教文化中，赤城山已有二处济公院，比例已经超重，再建以“济公祖庙”为中心

的“济公文化园”，较之济公故居，明显有“喧宾夺主”之嫌，加之所谓的“济公祖庙”又是几位领导拍脑袋命名。其“祖”何来？济公为僧，从未于此挂单驻锡、经文创制、修行证果，大陆内地、台港澳地区，乃至世界各地，济公寺庙、宫观、堂坛、阁社比比皆是，尚无一可以称“祖”，惟济公故居为“不二法门”，为济公传法弟子、信徒信众所能膺服而无争议也。

③赤城山环境狭小局促，自西汉茅盈草除以辟地，继之有东汉三国葛玄天师与葛洪追随杖履，晋紫虚元君、南岳仙子魏夫人华存也曾于此炼丹，为中国道教茅山派与葛仙派（灵宝派）、魏仙派之源头圣地之一；又为天台山佛国的奠基者、五百罗汉文化的主要创始人晋代昙猷大师的修持、圆寂圣地，神通感应智者大师至台创建佛教天台宗的定光禅师亦曾于是山弘法，还有高僧昙兰不为金钱所动，弃神献金钱于池；历代骚人墨客更于此留下了弥足珍贵的诗词曲赋、山水游记，还有明建文帝登临度岁、黎元洪大总统褒奖题匾等的历史故事留传，与昔玉京洞外峭壁，本来就建有小巧玲珑的文昌阁等。故赤城山之文化开发，自身已是“负债累累”，犹不能以济公的“一枝独秀”而抑制其它。如考虑将东面山岙，规划建设以“文昌阁”“定光禅师纪念堂”“昙猷大师纪念堂”“茅盈祖师纪念堂”“葛玄天师纪念堂”“紫虚元君纪念堂”等为中心，单体小巧玲珑、古色古香、田园风格的“三教文化园”，到是名至实归，自必千古称颂也。

三是“和合林”山岙之东西两向隔山有相应的山地空间，可以满足与济公信仰祖庭相配套，诸如济公信仰协会、济公文化学院、济公慈善总会，及吃、住、游、购、停等服务性项目建设。

诚然，据济公李氏的历史文脉，于“和合林”山岙建设济公朝觐广场，其功能特色、建筑风格，大略可作大济公广场、大济公牌坊、大济公圣殿、大济公诗廊的框架构想。

1. **大济公广场**。全称可定名“中华天台山济公朝觐广场”（亦可谓“中华天台山济公文化广场”），并依“和合林”山岙之地势由外及里（自北向南）实行二级地平高差建设，规模以考虑同时容纳约 5000~6000 人的祭祀较为适宜，以保证济公故里的国际性朝觐、祭祀济公活动（典仪），有足够的场地开展，兼解天台城区公共集会，市民休闲锻炼场地不足之困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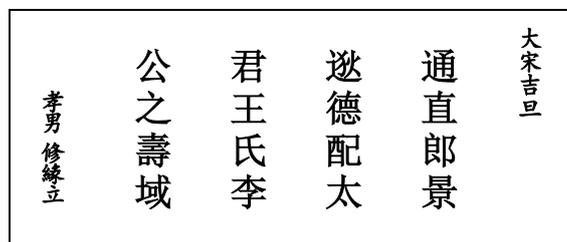
2. **大济公牌坊**。广场入口一级地平立“中华天台山济公朝觐广场”大牌坊，作为朝觐济公之入口地标；二级地平立“慈悲济世”“无我利他”“彰善殛恶”“扬弃创新”四组牌坊，凸显济公精神之崇高、博大，东西二向分立二组六座，即自唐及宋朝廷钦赐济公李氏的“太武”“元靖”“文和”与“猷穆”“恭敏”“忠节”谥号牌坊，并在一、二级地平东西二向的“青龙”“白虎”挡土照墙，采用图文并茂的浮雕方式，介绍济公精神，与济公一世祖李渊大唐开国，赐谥“太武”，太祖李崇矩辅赵建宋，赐谥“元靖”，天祖李遵勖联姻宋太宗七女万寿长公主，赐谥“文和”，长公主赐谥“猷穆”，高祖李端愬帝誉“近世之贤戚”，赐谥“恭敏”；祖父李涓抗金殉国，赐谥“忠节”之显赫、忠烈家世，及济公之生平事迹等。

3. **大济公圣殿**。选址“和合林”南山之北面山腰，置建座南朝北的“济公圣殿”，二侧配建济公弟子雷鸣、陈亮、沙弥、达悟等辅殿，作为平常一般规模的朝觐、祭祀使用。圣殿主坛塑活佛济公、仙真济公、儒圣济公三像，体现济公圆融三教于一身；辅坛置济公十八形态像，与台港澳地区的济公十八化身传说产生联系。殿前设宽约 20 米左右的高挡墙观景平台，并于高挡墙镶塑释道儒济公三像，依山就势作为大型规模的广场朝觐、祭祀、观光使用。

4. **大济公诗廊。**沿济公圣殿两侧自然牵手形成的“青龙”“白虎”山脊至广场一级地平，建设游廊，廊内分置书法名家题写的济公诗碑，与历代名人赞颂济公之刻石，兼作信徒信众朝觐、游客观光的遮日、避雨、观景、赏书、小憩的全天候逸步通道，亦可作为大型广场祭祀，公共集会之观摩平台，与市民休闲锻炼之用。

5. **大济公圣像。**“和合林”南山之巅，雕塑高约 30 米左右的济公释道儒三面容、三衣着圣像，使济公的三教圆融，亦圣亦佛亦仙形象，有具体的实物载体彰显，以外山顶空间开发观景平台。

此外，济公父亲李景逖、母亲王氏夫人之墓到底坐落何处至今无考，但据史籍、文献和济公小说（传说），推理认定其归葬天台，则无任何疑义也。故在规划、建设济公朝觐广场的同时，可以考虑对济公父母墓一并予以复建。结合“和合林”山岙的地形实际，济公父母墓的复建，以距离大济公圣像不远处的山顶平地选址为妥，从而与圣像、圣殿一起，风水兼顾，集聚人气，拉动朝觐祭祀与旅游观光效应。至于济公父母墓的规模、风格，宜采用天台传统的鲁班尺丈二坟径、八尺坟面，以体现济公父母、济公对天台山文化的钟情。联系济公父亲李景逖荫封通直郎，列文官第二十五阶，品秩正八品，与宋时大县知县品秩七品，小县知县品秩八品，是代女性封号有国太夫人、郡太夫人、郡太君、县太君等称，故可以“太君”作为济公母亲王夫人的誉称。再者，济公父亲李景逖、母亲王夫人的住生年份，史籍、文献无载，惟济公是在父母双亡后，方才出家之谓，及济公的出家年龄又是说法多种，故对济公父母往生，与济公为其父母置建坟墓的年份也不能贸然确定，惟依天台传统的置建寿域（生坟）习俗与笼统的大概念，在时间要素上进行模糊处理比较恰当。据此，试撰济公父母墓之主碑文于下：



另在济公父母墓置建中，还要考虑济公出身豪门之家，传法弟子、信徒信众祭祀济公多要同祭济公父母之实际，故济公父母墓的“坟堂”应立麒麟，狮、象、马等的神兽石雕，象征守护，并置供案、香炉等，以显李景逖大唐龙脉嫡系，宋室皇亲戚后之尊贵身份，增加祭祀人员的视觉观感。“坟墓”之周边空地（通道），需考虑 300~500 人左右站立，以确保祭祀活动能够进行，并于适当位置立长方形“济公父母墓简介”碑（地面高度控制 1.5 米左右，不与济公圣像产生视觉冲突），介绍李景逖与夫人王氏因靖康之难，两帝被虏，北国沦陷，随宋室南迁，落脚高祖封邑天台，置建府邸，购置田产，开办酒坊，且为人纯谨厚重，虔诚向佛，慈心好善，修桥补路，排难解纷，冬助棉衣，夏施汤药，地方称道，民众百姓易村名为“永宁”，称村东北面一畝丘陵田地为“李家垵”，及李氏夫妇国清寺求子，罗汉佛像坠落，永宁李府济公降生等史迹、传说。

（四）济公信仰祖庭的体系配套

现济公故居为国有性质的“天台县济公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经营管理的一个旅游景点，人

财物一体纳入天台县旅游集团公司调配，官办现象、商业性质非常显目，而无宗教味、文化味可言，且从体制、层级上也与宗教意义的济公信仰圣地、济公信仰祖庭不相协调。因之，必须加以规划、调整、理顺，使之与统领世界济公信仰大势的外延、内涵相适应。

从长远的定位看，必须成立完全与中国佛教协会、道教协会、伊斯兰教协会、基督教（新教）协会、天主教爱国会（天主教主教团）层级并列的“中华济公信仰协会”，协会的宗旨可以考虑确定为：

以济公为旗帜，以宗教为渠道，以文化为载体，以交流为手段，指导济公信仰活动的开展，弘扬济公精神，传承济公佛学思想，贯彻国家宗教政策，维护信徒信众的合法权益，凝聚、团结信徒信众积极参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平等、尊重、包容、互利，开展同台港澳地区、东南亚国家，乃至世界各地的济公信仰教派，与相关的济公寺庙、宫观、堂坛、阁社、团体，及毗邻宗教派系与寺观会所等的交流联系，增进友谊、促进合作，为祖国统一，世界和平，人类向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历史贡献。

中华济公信仰协会直辖济公信仰祖庭（济公故居+朝觐广场），与济公文化学院、济公慈善总会等的事务管理。其中，济公文化学院纳入国家学历、招生体系，在济公信仰协会与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直接领导、指导下，承担济公信仰、济公文化层面的学术研究，与济公文化人才培养，为把握全球济公信仰的发展方向，引领世界济公信仰大势，提供理论与人才支撑。

从近期的目标看，应当效法当年汉明帝刘庄官办“白马寺”的模式，由天台县人民政府成立正科级事业单位——中华济公信仰协会（筹），从打造济公信仰圣地、济公信仰祖庭入手，做好相关的基础性工作。

①组建项目机构，开展规划、设计，实施济公故居的济公信仰祖庭改造，落实朝觐广场建设。

②组建济公文化研发机构，开展济公信仰祖庭的经文体系、戒律体系、科仪体系整理，与“济公扶乩”研发；建立济公信仰（济公文化）专业网站，刊发正规期刊，报导世界济公信仰动态，开展学术理论交流，并视情以“济公祖庭”名义，于“网”于“刊”发声，掌控全球济公信仰发展方向；恢复济公道场，开展佛道二教法事服务。创办济公文化学校，自短（1~5天）至长（5~10天），小型编班（10~15人左右），邀请、招募境内外济公寺庙、宫观、堂坛、阁社、团体的济公弟子开展济公文化培训，先声夺人抢占世界济公信仰丛林之制高点，为创建济公文化学院奠定基础，树立济公信仰祖庭的“权威”、形象。

③有计划、有目标开展同境内、境外的济公信仰教派，与其衍生的济公寺庙、宫观、堂坛、阁社、团体，及毗邻宗教派系与寺观会所等的济公文化交流，联络感情、增进友谊、促进合作。

④组建济公慈善总会，筹措济公慈善基金，开展济公慈善活动。

诚然，要在天台济公故里打造济公信仰圣地，创建济公信仰祖庭，既要依赖国家政策的支持，与省、市、县三级人民政府的人、财、物投入；又要通过“济公”，号召大陆内地、台港澳地区、东南亚国家，乃至世界各地的济公寺庙、宫观、堂坛、阁社、团体，与传法弟子、信徒信众慷慨解囊。更为重要一点，就是要有高度的思想准备，预计在国家“垄断”确定宗教种类的大环境下，要把济公信仰完全“挤入”宗教行列，要走的路肯定不会平坦，要做的事也不可能一帆风顺。况且早于上世纪30年代，曾有中国济生会、上海集云轩发起

创佛教济公信仰南屏宗，并得九世班禅额尔德尼·曲吉尼玛的支持，最终还是未获成功，与天台曾于2012~2013年间发起创建“中华济公文化交流协会”，亦以失败告终，及2016年6月，县委、县人民政府在思想没有统一，乘举办“中华济公文化节开幕式”之机，仅据个别领导在筹备会上的一句话意见，凭一纸充满现代气息、大体量建筑的草图，就于赤城景区举行所谓的“济公文化园奠基”仪式，时至今日不了了之等，都是值得冷静反思和全面总结。所以，要实现这一功德无量的千秋伟业，思想务必高度统一，意志务必高度集中，更需树立知难而进、持久作战的决心、信心，从规划、协调、沟通入手，以做好各项基础性工作起步，一步一个脚印不懈迈进，最终必然感动济公并以其巨测神功助推，则济公信仰必定成为中华文明、东方智慧的一大亮点，鼎足于世界宗教之林。

【注释】

[15] 永宁济公李府到底因何原因，于何时间灭失，目前尚未见有正史、信史记载，很难予以结论，但参考明清相关话本、小说，及天台永宁村流传之济公故事，其灭失之原因、时间，大略有以下两种说法流布：

一是无人管理，自然坍塌。即济公在父母双亡守孝服满，出家为僧之时，将家中产业交与原随父母同住的舅父王安世（士）、表兄王全（泉）管理。后来，王全功名得中，父亲王安世还原籍。早先几年，王安世还曾来济公李府探望，并视情安排工匠予以补漏、维修等，后王安世病故，王全在外为官，济公李府因无人管理，屋面出现漏水，不着几年，坍塌殆尽，遗基则成为永宁村的公共用地。清香婴居士王梦吉的《新镌绣像龛头陀济颠全传》对坍塌后的李府，也有这样一段文字描述：“一荒落之区，门墙倒坏，屋宇倾颓，虽有几间高房，却是有柱无梁，有梁无瓦”。

二是管家作恶，济公焚毁。即济公舅父王安世、表兄王全在还原籍前，曾至杭州灵隐寺要济公明示李府产业的料理意见。济公特地给管家李仁书信一封，交代其可将家中男使女婢配为夫妇，分给房屋、田地和日常用具，各立门户，安居乐业；余下田产，分赠贫困农户。谁知李仁为人刁钻，李景逃夫妇与王安世父子在时，表现还算循规蹈矩，但在景逃夫妇离世并王氏父子离开后，就一反常态，扣压了济公书信，赶走平常与自己意见不合的佣人，与几个阿谀奉承、趋炎附势的家奴一起，依靠李府的佃租收入，整日花天酒地，无恶不作，变宅第为一座魔窟。恶闻传之灵隐，济公义愤填膺赶回天台，赶走李仁、恶奴，一把火把房屋烧得个殆尽，“李家垟”田地交村悉数分给佃户，自己返回灵隐。清《新镌绣像龛头陀济颠全传》也有济公八至十岁年间，于自家西厅书房攻读，西厅后有平厅三间，内供五千四百八十三卷内藏真经；二年余，济公“看得十分融透，却又悟出许多野狐外道，未免迷惑后人”，“遂将书房放火一把，即刻腾腾烟起，匝地金蛇，内外多人，不能扑救，竟把两层书屋，万卷缥緲，霎时灰烬。修元立在空地，徘徊观望，大是快心。”

以上二种说法，较为一致反映，济公李府在南宋中期已经湮灭。诚然，二者又皆为传说、小说，讲法也不甚相同，不足以作为认定之凭据，但多多少少还是透露了一点济公李府灭失的信息，权且作为日后济公文化研究之线索参考。

八、济公信仰之研究结论

济公信仰是在南宋这一特殊的社会背景下，以天台僧人道济这一特定的历史人物，演变形成的一种宗教信仰形态，是乃儒释道三教交织发展长河中永远不能抹去的机缘凝结。它以

佛教信仰为主体，嫁接道家信仰，圆融儒学文化，通达分布于诸多种类的宗教形态之中，精神主旨在于“慈悲济世、无我利他、彰善瘅恶、扬弃创新”的济公精神，并以济公降鸾扶乩为特色典仪，体系自成，影响力、生命力经久不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政治社会背景下，具有普遍的适用价值；实现两岸“济公”的和谐统一，进而助推祖国和平统一，潜在作用巨大。其宗教地位，历史铸就，民心所向，毋庸置疑，不容否定。

根生土长天台的“济公”，要领军世界济公信仰大势，必须打造济公信仰圣地，创建济公信仰祖庭，抢占济公信仰丛林之制高点。

习近平总书记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天台山文化、龙图腾文化与三祖（黄帝、炎帝、蚩尤）文化，乃中华和合文化的三大源头，济公信仰为天台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为儒释道三教圆融和合的形象代表与精髓结晶。2017年2月26日~3月2日，中共台州市五届一次党代会决定，把“和合圣地”建设作为台州发展的文化定位和战略目标。且自济公故居复建重光以来，天台已先后举办了“2007 海峡两岸济公文化交流活动”“2009 海峡两岸纪念济公圆寂八百周年活动”“2012 海峡两岸济公文化交流活动”“2013 济公成道祖庭祈福大典”，并2014~2018年的“中华济公文化节暨济公祭祀大典”，济公故里在大陆内地、台港澳地区、东南亚国家，乃至世界各地济公信仰丛林的影响陡增，打造济公信仰圣地，创建济公信仰祖庭，条件具备，基础扎实。乘势而上，天时、地利、人和，良机正当，千载难觅。

济公信仰与区域旅游联系密切，但在性质定位上不能本末倒置，是济公信仰可以拉动旅游，而非旅游可以管控济公信仰，离开济公信仰的宗教、文化基础，以纯粹的“旅游”模式，将“济公”作为商品经营，必然为济公信仰、济公文化发展的潮流所淹没、摒弃。

最后语：济公信仰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能量。世界宗教在发展，中国宗教要发展，不能没有济公信仰。对待济公信仰，只能鞭策促进使其弘扬光大，不能暗拉设障致其萎缩到退。

南无济公佛菩萨摩诃萨……

【参考文献】

[1] 南宋释居简《北磻文集—湖隐方圆叟舍利铭·济颠》、《北磻文集—释签岩记》，皆见（《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一二二·别集类，商务印书馆影印本）。

[2] 南宋《破庵祖先禅师语录》（释圆照等编，《续藏经》第一辑第二编第二十六套）。

[3] 南宋《运庵普岩禅师语录》（释元靖等编，《续藏经》第一辑第二编第二十六套）。

[4] 南宋《天童如净禅师语录》（释文素等编，《续藏经》第一辑第二编第二十九套；《卍续藏经》第七十二卷·白马精舍影印本）。

[5] 南宋贾似道《促织经》。

[6] 南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2012·浙江古籍出版社）。

[7] 南宋释法应、元释普会《禅宗颂古联珠通集》（《卍续藏》第一一五册）。

[8] 元释照仲《历朝释氏资鉴》（CBETA 汉文大藏经「在线」，电子佛典集成>卍续藏(X)>第76册>No.1517）。

- [9] 元孟宗宝《洞霄诗集》（民国书林书局出版）。
- [10] 元脱脱《宋史》（1985·中华书局出版）
- [11] 明顾清《正德松江府志》（1990·上海书店出版社）。
- [12] 明聂心汤、虞淳熙《万历钱塘县志》（2016·浙江古籍出版社）。
- [13] 明吴之鲸《武林梵志》（2006·杭州出版社）。
- [14] 明释居顶《续传灯录》。
- [15] 明南石文秀《五灯会元补遗》（《续藏经》第二编乙第十五套）。
- [16] 明释道忞、吴侗《禅灯世谱》（《万续藏》第一四七册、《禅宗全书》第十四册）。
- [17] 明沈周《石田翁客座新闻》（1996·上海古籍出版社）。
- [18] 明郎瑛《七修类稿》（2009·上海书店出版社）。
- [19] 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2012·东方出版社）。
- [20] 明释大壑《南屏净慈寺志》（2006·杭州出版社）。
- [21] 明徐象梅《两浙名贤录》（2012·浙江古籍出版社）。
- [22] 明释传灯《天台山方外志》（1982·新文丰出版公司印行）。
- [23] 明释明河《补续高僧传》（《卍续藏经》第七十七卷·白马精舍影印本）。
- [24] 明张岱《西湖梦寻》（2002·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 [25] 明沈孟梓《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大藏新纂卍续藏经》第六十九卷·白马精舍影印本）。
- [26] 明冯梦龙《三教偶拈·济颠罗汉净慈寺显圣记》。
- [27] 明徐人瑞、程瑶初稿，清徐道、程毓奇续成《历代神仙通鉴》（百度文库·电子书）。
- [28] 清南涧行悦增补《禅宗杂毒海》（《卍续藏》第一一四册、《禅宗全书》第九十三册）。
- [29] 清康熙《天台县志》（2012·天台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校·方志出版社）。
- [30] 清陈鍾祺《天台山文化史》（民国二十六年「1937」铅印本）。
- [31] 清康熙《灵隐寺志》（孙治初辑，徐增重修；2006·杭州出版社）。
- [32] 清雍正《浙江通志》（李卫、嵇曾筠等辑编，2001·中华书局出版）。
- [33] 清康熙始修，道光成书《大清一统志》（2008·上海古籍出版社）。
- [34] 清嘉庆《净慈寺志》（释际祥纂辑，2006·杭州出版社）。
- [35] 清嘉庆《朱泾志》（上海市方志办许洪新校读考证，是书成于清嘉庆十三年「1808」）。
- [36] 清释圣光《虎跑定慧寺志》（2007·杭州出版社）。
- [37] 清聂先《续指月录》（2005·巴蜀书社出版）。
- [38] 清释自融、性磊补辑《南宋元明僧宝传》（《万续藏》第一三七册、《禅宗全书》第十八册）。
- [39] 清释超永《五灯全书》（《卍续藏经》第八十二卷·白马精舍影印本；《万续藏》第一四零～一四二册、《禅宗全书》第二十五～二十七册）。
- [40] 清别庵性统《续灯正统》（《卍续藏经》第八十四卷·白马精舍影印本）。
- [41] 清陆次云《湖壖杂记》。
- [42] 清江西南城上唐《李氏族谱》。
- [43] 清天花藏主人《济颠大师醉菩提全传》。
- [44] 清香婴居士王梦吉《新镌绣像鞠头陀济颠全传》（民国八十五年「1996」三版·三民书局出版）。
- [45] 清郭小亭《评演济公传》（2013·中华书局出版）。
- [46] 民国上海集云轩《济师塔院志》（1939·广陵书社出版）。
- [47] 丁天魁主编天台《国清寺志》（1995·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48] 奚德基、许尚枢主编《济公与济公文化研究》（2006·中国文联出版社）。
- [49] 陈政明、奚德基、许尚枢主编《海峡两岸济公与济公文化研究文荟》（2007·中国文史出版社）。
- [50] 曹志天、赵达枢《济公传说·济公童年少年故事》（2007·天马出版有限公司）。
- [51] 陈日贵主编《天台山济公院志》（2012·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

[52] 杨流昌《天道传奇·一贯道在台湾的传播与影响》（2013.07.03，中评网>网书>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网上开卷）。

[53] 天台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济公传说》（2015·中国社会出版社）。

[54] 明德编著《明德济公研究》（2015·天台济公故居刊行）、《济公与济公故居志》（2016·中国出版集团现代出版社）、《济公禅师度世妙法经释义》（2018年6月·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

[55] 应天书院《史前文明的发现挑战进化论，500 科学家联名指证进化论误导人类发展》（搜狐>科技>正文·动物/人类，2017.06.23—08:59）。

[56] 陈进国《宗教治理如何走出困境?——以济度宗教为例》（《文化纵横》2017·01期）

[57] 索达吉堪布著《佛教科学论》（新浪《盛誉德博客》）。

[58] 陈景熙等著《泰国华人宗教研究》（2018年6月·泰国德教会紫真阁出版）。

附件一：

福建漳浦梁山下宋代石刻林济公所书《心经》摩崖（照片）



附件二：

河北古城正定出土济公和尚塔铭（照片）

